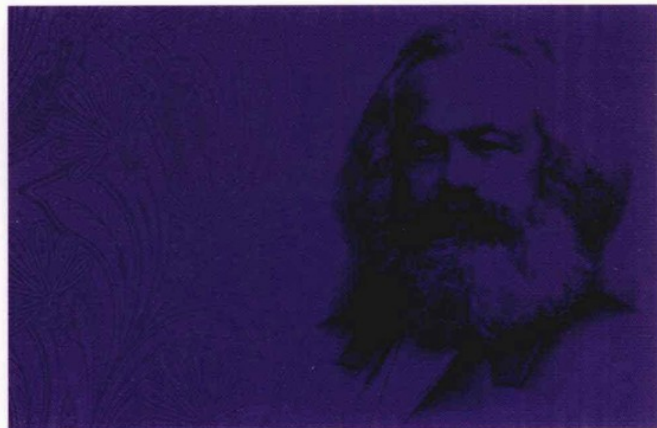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孙文亮
李安增
铁省林
主编

马克思在21世纪

——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MARX@2000:LATE MARXIST PERSPECTIVES

【英】罗纳尔多·蒙克 著
张英魁 王亚栋 张长虹 译 铁省林 梁红光 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马克思在21世纪

——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MARX@2000:LATE MARXIST PERSPECTIVES

【英】罗纳尔多·蒙克 著
张英魁 王亚栋 张长虹 译 铁省林 梁红光 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在 21 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英)
蒙克(Munck, R.)著;张英魁,王亚栋,张长虹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2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214-06630-5

I. ①马… II. ①蒙…②张…③王…④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20 世纪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9990 号

Marx @ 2000: Late Marxist Perspectives

© 2000 Ronaldo Munch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Marx @ 2000 by Ronaldo Munck,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e 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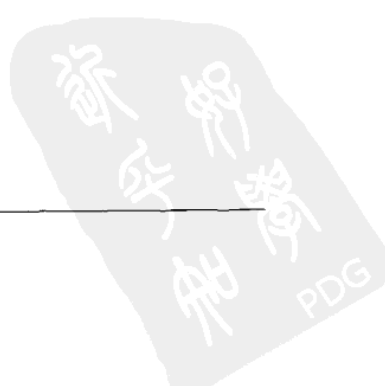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9-466

书 名	马克思在 21 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著 者	[英]罗纳尔多·蒙克
译 者	张英魁 王亚栋 张长虹
责任编辑	花 蕾
装帧设计	王欣竹 芮 玲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304 mm 1/32
印 张	8.375 插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630-5
定 价	30.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总序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套《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的译者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翻译过程中,虽然“信、达、雅”的翻译尺度是不懈的主观追求,但在客观上,译文中还存在着不少应由译者自己负责的舛误与主体认知之二次建构的痕迹。当然,二次建构的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说,依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译介此套丛书的背景,是正值 21 世纪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甚嚣尘上之时。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亦难独善其身,“风景这边独好”的断语,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盲目乐观主义泛滥的表现。从世界范围来看,主张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霸主地位遭遇严冬,马克思主义已经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种轻率预测的阴影。但是,全人类共有天空上的阴霾并未散去,在 21 世纪的第十个年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被放置于一个广域空间中重新慎重审视,人类内部的纷争必须在人类是生存抑或死亡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让步了!经济萧条、全球发展失衡、民族与宗教冲突仍然难以摆脱。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人类自我制造的副产品——自然枷锁又重新禁锢于自身。在需要



人类共同携手应对的生态浩劫面前,我们不仅应该反思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疯狂本质,也应该更为清醒地反省社会主义的自我处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理解社会、自然、宇宙和文明的出发点,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由其所达到的洞见非其他思维方式所能替代。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不惧怕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与挑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不会拒绝任何对之理性探究的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凭借不同文化谱系思考方式之探索,能够发人深省,并获取解决社会问题之道,开启人类生存的崭新空间,以提升我们社会的生活品质与人类的生存境界。

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范式与方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作为思潮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不同文化场域中也相互抵牾,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的有效整合、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与空间等方面,仍具有相当程度上的逻辑一致性。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虽然历经风雨,不断遭到批判和围剿,但在困难与挫折中,它不仅在东方大地得到充实、发展和检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也得到充实、发展,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成为当代全球思想中一股强有力的国际性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复兴、发展、壮大,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从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中挑选出这6本著作,绝非因为作者的名气,关键在于其作品本身的特色与深厚度,以及对中

社会发展的价值与功效考量。当展开书页,进入到另外一种话语体系中去认知马克思主义时,应带有一种虔敬的态度去体悟异文化领域的学者之所思所想。诚然,站在简单化与迷信化的立场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绝难从马克思主义这里获取科学与知识。心智的开启需要诉诸感情上的热爱,但更要诉诸理性之光的照耀。译介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学说,既有助于展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有助于拓展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有助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充满危机却又蕴含契机的时刻,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如果马克思生逢此时,他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做何种指引? 他的理论体系是否会得以做某种程度的修正? 这些疑问是推动出版本译丛之动因所在。世界上未有全知全能者,但人类可借助于前人智慧的累积,去思考与探索消除生存危机之道,走向光明的前路。

这正是此译丛之愿景。

孙文亮 李安增 铁省林

2011年1月

前 言

本书的题目使一个卡尔·马克思的形象呈现于人们脑海之中：他坐在个人电脑前，在网上浏览关于亚洲虎经济模型已经明显崩溃、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爆炸或丹麦的总罢工的最新新闻。在我的想象中他将会是十分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并且他的分析将像以往一样深刻。现在看来，数年前宣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纪”终结变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古怪的古文物收集者将会对此产生兴趣，但他的想法会在一个糟糕的旧书店被久置尘封。但是到现在，尽管仍然存在着以前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的祸害，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能够大胆且自信地宣布：“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因此，本书揭示了一个在21世纪的马克思之所思所想。这将不是一种“马克思学”(Marxology)的实践，通过审视本文将会发现其最终的意义。人们可能会指责我建构了一个“精简的马克思”(Marx lite)去迎合我们肤浅的、消费主义的时代。而我更倾向于把其视为一个“活着的马克思”(Marx live)，一个对于当前骚乱的，甚至混乱的，全球化的后现代时代的各种争议施加影响的马克思。

本书副标题使用“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t)一词，是为了感



谢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Mandel, 1975)。从曼德尔的这本书里,我们学到了太多东西。但是,当人们问曼德尔,晚期(late)是何含意?事实上,当马克思主义者们宣布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时,资本主义才刚刚迈开大步。从历史角度来看,考虑到声称以其基本原则建立的新社会政治体系已经如此不光彩地倒掉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当然能够被视为太过时了(too late)。或许,这种判断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仍为时尚早,因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到足以实施其转变战略的程度。当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时,资本主义似乎变得更加“马克思主义”。我觉得“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术语是一个过于单调,同时过于自信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且也是一个过于老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论好坏,我把“晚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非固定的指称,这个指称适用于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意义。它开启了对我们这变动时代的多重(polyvocal)理解,标志着向其他对立话语的开放。我相信,如果马克思主义坚持去寻求自我“重建”,并且在资本主义的当前问题中寻求安慰而无视其自身的问题,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就太迟了。

这个副标题也使用了“视角”(perspectives),暗指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我们都从不同的主体地位来观察世界,并且普遍主义可能导致压迫。但我们也能够从不同的历史视角来审读马克思。x
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一个解放、平等和公正的时代,这个时代现在似乎已经按常规在发展。正如福柯所言,马克思只是一个19世纪的哲学家。现在,我们也能够适应出现于15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的凝视,并留意它如何适应当今这个时代。确实,即使主流经济学

家此时也正在致力于此。回到马克思，一切都可原谅……或者我们能以一种厌倦的、带有偏见的目光回顾十年前1989年的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为了弥补未见其到来的遗憾，左、右和中间派的分析家却做出了预见性的全面(all round)判断，包括“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这种判断。为了接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混乱和混杂的年代，我的观点并不是去适应任何一种视角，而是拒绝令人窒息的“历史终结”的沮丧和情节剧式的预测，更喜欢接受的观点是：我们生活在混杂与混合的此时。

第一章考察了这个命题：马克思已经“过时”，正如黑格尔与其时代不相关一样，马克思也与我们这个时代不相关。对罗纳德·阿伦森(Ronald Aronson)来说，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终结了”(Aronson, 1995:9)。尽管一个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正遭受着僵化(rigor mortis)，但如果我们把握到马克思的真实精神，就仍能感觉到马克思充满活力。这个说法对马克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继承人来说并不适用，这些继承人中今天已经产生了像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一样的人物。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改良主义变种的历史似乎已经走到了终点。另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变种似乎更为强大，但1989年却轰然倒塌了。这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吗？对于构建一个全球的抉择而言，马克思主义欧洲的根基衰弱了吗？并且，最后，在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统形式的局限被察觉时，为什么晚期马克思主义不能为未来建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一章试图以一种充满希望的、开放的方式，而非以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用的“我告诉你如此”的风格，来探讨这些问题与困境。那些自封



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成党派,以宗教似的正确性自居。这一章设定了一个马克思处理他那个时代和今天关键问题的场景。

所谓的绿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它的立足点是生态良知。第二章考察的问题包括最近从马克思本人含糊的自然学说出发探索自然问题的背景,社会主义国家对可持续性的令人遗憾的缺乏理解以及当前的论争。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的出现。尽管它是一种本质主义理论,但这个思潮已经对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优良生活理念提供了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推动力。当然,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化的环境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推到了前台。从本质上来讲,今天生态问题的表现与解决都是全球性的。无疑,并没有技术环境保护主义(technocratic environmentalism)所建议的简单的解决方案。工业化的北方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南方利益协调也并非易事。有许多方法能使社会主义的红色与环境主义的绿色结合产生一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类型。这一章只不过是提出一些相关的挑战。

对列宁来说,苏维埃加上电气化就等于社会主义。尽管简略,但正如在第三章节中所描述的,这种等式巧妙地抓住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与生产主义偏见。马克思原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已经对最近才为人们认识到的发展研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然而,巨大的矛盾在于马克思预测社会主义将产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但实际上,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即使不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不发达国家发生了。列宁似乎扫除了马克思正统继承者们的欧洲中心主义,但是列宁主义转而在第三世界或多或少地变成了一种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

ism)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在第三世界的变体,比如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对发达与不发达理解的重要贡献。今天,伴随着对全球占优势的资本主义是否能够传达发展的巨大疑问,存在着一种转向“后发展”(post-development)的话语,这种话语似乎是重提马克思主义与前马克思主义(pre-marxist)关于美好社会的乌托邦与愿景。

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它所产生和剥削的工人们。在马克思的话语中,工人阶级呈现出神话的甚至英雄主义的特征。第四章讨论了在马克思自己的概念大厦中工人的角色,强调了马克思对工人的创造力与自我组织能力的自信。俄国革命实际上以布尔什维克政党代替了工人阶级作为历史变迁的主体。在不发达和有广大农村社会的条件下,期望城市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启蒙的先锋引领社会其他部分(人群),是不现实的。然而,这种代替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后来发展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在近几年中,辩论已经转向了关于无产阶级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日益融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实际上,今天新的社会运动已经创造了一种更为多样化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随着工人阶级在理论和实际上中心地位的消失,这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置于何处呢? xii

在不同时期,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已经走到了一起,但任何友好关系都是暂时的。第五章讨论了两种传统“结合”的各种尝试,它们的结合常伴随着令人不快的结果。马克思自己关于女性的著述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探讨,是分散与几乎不令人满意的。但是,正如在社会主义传统中已经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亲密的伙伴——恩格斯,确实重视



“妇女问题”。我们的论述从此开始，到早期苏联在性别问题上的辩论与实践，再到当前流行的问题。在过去的30年中，女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大行于世，“马克思主义问题”并非是这个日程上的唯一问题。“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socialist feminism)意味着什么？我们借助于“后现代女权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要表达什么？这些问题是这一章批判考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并不是唯一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但其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偏见已经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其作为解放全人类的指导者的前景。

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将文化领域归入一种被“经济基础”所决定和支配的“上层建筑”。第六章讨论了还原论图式的影响，展示了上层建筑如何在一个新的文化研究中报仇雪恨。我们的论述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早期苏联建立一种“无产阶级文化”(Proletkult)的尝试开始，到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决定论的决裂和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领域的充分作用。这一章批判考察葛兰西在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t)转向中的枢纽作用。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文化出现在每一个角落，一切都是文化；或者似乎看起来如此。我们似乎已经从对文化的忽视过渡到社会死亡的提前宣告。后现代主义与更为明确的后殖民主义的所作所为，给欧洲文化早期确定无疑的霸权主义打上了一个问号。因此，不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而且其欧洲中心主义也在这些最近的论争中被“修正”。

民族主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弱点之一，不过整个启蒙传统都没有处理好民族主义。第七章追溯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

期在他们称之为“民族问题”上的混乱与矛盾。从这种模棱两可的遗产 xiii出发,列宁继续建构了更为有影响但却仍然矛盾的“民族自决权”(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理论。苏联曾经爆发的民族冲突显示出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研究传统中,除了葛兰西之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此我们考察他的部分贡献。最后,这一章转向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例如,除了必须承认所有的民族现象都是性别现象——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重要的民族学说中共同存在的一个盲点——之外,我们并无简单答案。我们现在至少开始将民族主义理解为自主的话语类型,而非经济过程的“附带现象”。

苏联共产主义在1989年像空中楼阁一样倒塌之后,马克思主义会有什么样的未来?第八章总结了正文内容,检视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人们小心翼翼地称之为“切实活着的社会主义”命运的各种回应。对一些人来说,它导致了一种政治健忘症,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消失于无形。而另一些人,像法国的波旁皇族一样,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并且主张他们那特定的马克思主义教义事实上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我认为,先前的章节可以使我们得出这一结论,即:我们现在是后/过去的正统现代主义—机械主义—马克思主义(post/past orthodox modernist-manicheist-marxism)。但是,什么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postmodern marxism)?我们是否能够设想这样一个混合体?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将是不可想象的。保守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将对此惊诧不已。先前的章节已经开始探索“马克思的幽灵”(如德里达所提出的)与当前和发展、性别和文化等相关的后现代主题之间的关系。最后的一章扩



大了这一议题,并且试图更明确地阐发一种批判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你愿意的话)方法,来更好地理解有关我们的世界。接下来完全围绕第一章关于社会主义轨迹的问题,广泛地讨论后现代社会主义可能是什么样子。

本书写于一个危险的时代,但是我相信,这同时也是一个机会。许多动乱与骚乱甚至混乱,不仅遍布于这个世界,而且存在于我们的主观观念之中。“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①这是一个范式变迁的时代,这里旧的已经死亡,而新的尚未诞生。我不妨承认本书是从一个后现代主义视角来写的,但人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对已接受真理的批判甚至颠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来自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在1998年5月,当时本书已经完成,我情不自禁地去思考的是30年前另一个五月那著名的重大事件。在1968年(在拉丁美洲实际上是1969年),历史飞速向前;文化侵入政治,新社会运动中有解放意义的脉动,尤其是女权运动,开始成为席卷全球的风潮。探索如马克思在21世纪一样的主题,无害于牢记1968年5月的口号(“想象的权力!”),并富于想象地运用它。

罗纳德多·蒙克

^① 语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译者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走出迷宫:马克思主义的轨迹	001
第二章 红与绿:马克思主义与自然	031
第三章 苏维埃加电气化:马克思主义与发展	057
第四章 掘墓人的局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	084
第五章 不幸福的婚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	108
第六章 上层建筑的复仇:马克思主义与文化	138
第七章 艰难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民族	168
第八章 大洪水之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196
参考文献	216
索引	245
译后记	248

第一章 走出迷宫：马克思主义的轨迹

1

多数的评论者都同意，“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已经终结。但是，雅克·德里达，一位后现代、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捍卫者，最近宣称：“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Derrida, 1994: 13）^①。这并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已死，马克思却永远活着”的简单问题。然而自苏联共产主义倒台约十年之后，现在可能比以前会更加清醒地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这一章追踪复杂的马克思主义轨迹中的一些波峰（或波谷）：从它在马克思那里的起源，经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统，到最近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复杂关系。我已经不可避免地简化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和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迷宫。尽管有时似乎迷宫——有自己的围墙、死角和博尔赫斯的逻辑^②——是一

① 中译文见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译者

② 博尔赫斯的逻辑：强调着阅读，静默，思想与灵魂的交流。——译者



些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为自己建立的,或者更为经常的是为他们的追随者建立的。

活着的马克思

乍看起来,我们会把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的自信预言看成是违反直觉的:“在21世纪,人们仍然需要阅读马克思,不但把他作为一种过去的运动,也把他作为一个现代的作者”(Balibar, 1995:1)。就像我们曾经认为马克思已经“过时”(正如他之前的黑格尔)一样,巴利巴尔的看法意味着他似乎正重新焕发生机。马克思主义的计划从卡尔·马克思开始至今,并没有完全达到顶峰。马克思主义的谱系显示出我们现在所知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发展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资本的使用或许表明一个真正信徒的信仰错置。)这也不能简化为“年轻的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的对比,或作为经济学家、哲学家或政治学家的马克思的人为差别。像考茨基和列宁那样认为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清晰的来源: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也是简单化了。这种整体化的类型——在本质上必然是欧洲范围的(Europebound),将不会对一个对今天仍然至关重要的(也是活着的)马克思产生影响。相反,我们必须在马克思努力去把他的革命理论置于一个科学的立场,去反对他那个时代所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过程中,深入探究他的真实世界和检视他所完成的转变、退步与发展。

随着在1847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的政治愿景清晰了。尽管《共产党宣言》经常让人看起来描绘了一个充满活

力的资产阶级的巨大影像，但它也因对一个资本主义即将发生的全面危机的坚定信念而引人注目。这将为无产阶级领导所有被压迫阶级走向一种彻底的民主社会创造前提条件。相应的，这也将为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前提条件。那是一个“不断革命”的时代。工人阶级被视为历史的普世阶级。正如巴利巴尔所说，这“允许马克思从当前现实中看到共产主义革命的来临”（Balibar, 1995: 40）。现代主义主题和浪漫主义主题似乎融合为一体了。马克思现代性的辩证法创建了一种救赎的政治，一种普世的政治。永远发展与历史必然进步是一个大胆的观念。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我们也能看到这些观念的黑暗面。作为现代主义者马克思（Marx-the-modernist）的崇拜者，马歇尔·伯曼（Marshal Berman）写道，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也能够明白，为了团结一致，共产主义怎样可能压制那些使之存在的活跃的、充满活力的和发展的力量，怎样可能背叛一些值得为之奋斗的希望以及怎样可能在一个新名义之下重新制造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与不平等”（Berman, 1983: 105）。

事实证明，历史的转向表明其并非总是向好的一面发展。1848年至1849年的欧洲革命，本应是《共产党宣言》的贯彻落实，但是，到1850年却被挫败了。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工人阶级成为普世阶级，都被证明只不过是一个海市蜃楼或一厢情愿的想法。不断革命的概念已经告吹了，马克思被迫去与民族主义及宗教理念的力量搏斗。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不会一帆风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转向去寻求对抗反革命的策略，去寻求一种弥补在他开始称之为自在的



3 阶级(class in itself)和自为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二者之间断裂的策略。资本主义不会魔法般地团结工人阶级,这种团结必须从政治上建构起来。马克思也(再次)转到了他雄心勃勃的资本主义研究计划,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研究计划随着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而结出果实。资本主义不得不遭遇崩溃和全面危机的失败,结果,这使马克思去揭示掩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秘密、动力来源与矛盾本质。

当然,在其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第四卷中,马克思《资本论》的复杂论证结构是他最为持久和系统的遗产。然而仅在这一层面上,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可能被人们视为“二流的后李嘉图派成员”。如果我们转而从政治上来阅读《资本论》,这种看法就会改变。正如哈里·克利弗(Harry Cleaver)所说:“这部书远离了一切超然的解释和抽象的说教,而是仅仅在具体的斗争总体性中把握概念。斗争的决心就是由这些概念确定的”(1979: 11)。随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几乎)遍及全球,回到《资本论》似乎是恰当的。当然,多年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产生的许多问题,今天似乎(并且可能)是晦涩难解的。然而,策略性地阅读《资本论》,依然能有助于从概念上深刻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正如齐格蒙·鲍曼(Zygmund Bauman)所说,随着资本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仍旧可以提供“一个完全批判的乌托邦,揭露资本主义价值的历史相对性,揭示它们的历史局限性,并且因此防止它们冻结成一种无边界常识”(Bauman, 1976: 99)。如果批判性地阅读,在形成我们新时代的一种新常识的过程中,马克思仍然有话可说。

1870年至1871年的事件,像1848年至1849年的那些事件一样,也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综合的影响。1870年的普法战争,

接下来的伟大但悲剧性的巴黎公社运动，进一步打击了乐观主义的历史观。尽管马克思可能为巴黎公社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而欢呼，但他仍然震惊于革命并没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英格兰爆发。那时，巴黎工人阶级被无情地镇压，使工人阶级真切感受到统治阶级真实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这里将不存在简单的、自然演进的达到共产主义的路径。真实的政治打击着发展中的马克思范式。历史再一次没有朝向“好的方面”发展，正如被1872年第一国际的解散所证明的一样。如巴利巴尔所写的，1871年之后，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工作，但从那一刻起他确定将不能完成他的工作，不可能得出结论”（Balibar, 1995: 103）。马克思的话语变得更为开放，具有较少的宿命论与更多的“政治性”。在马克思那里，这导致了“过渡”（transition）观念的产生，过渡阶段是工人阶级废除国家机器的前共产主义阶段。这种“修正”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1871年的震荡之后，马克思再一次中断了他的研究计划，这次他是为了学习俄语，并且修正了他的社会进化理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不可阻挡的发展及其进化形象，已经破灭了。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却很难回答，这加速了其认识论的断裂。早期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即众所周知的“民粹主义者”，在1888年探寻马克思的主张，即农村公社是否能够成为预示共产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源头。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论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881年,马克思在他写给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的信中就清楚地表达道,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去运用《资本论》所说的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资本主义发展不再是一种单线的路径,而是在世界不同的地区,体现为复杂、多样和十分具体的发展路径。特奥·沙宁(Teodor Shanin)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了马克思关于俄国的著作。在他看来:“他最后的十年是一个概念飞跃的时期,最后随着他的死亡而突然停止。马克思是一位才智过人、对社会正义富有激情的人,一位偏爱革命者而非教条主义追随者的革命家”(Shanin [ed.], 1983:33)。

当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成为他的遗稿保管人,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知名人士一道,恩格斯系统化或者说简化了马克思的思想,并且使马克思活跃的思想机械化了。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资本论》各卷中,在他自己的经典文本如《反杜林论》中,以及在他对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中,都能感受到他决定性的影响。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在分析马克思去世后对马克思的批判性吸收时竟然说,“恩格斯的学说很少或根本没有能够归于马克思的,尽管他称马克思是他的良师益友”(1991:41)。也许这种观点过于极端,但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化成国家意识形态开始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工作,这决非巧合。与恩格斯和其他人对马克思的一切科学解读相反,我们应当记住,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到“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当然也没有苏联产生的怪胎“辩证唯物主义”。当然,正是斯大林1938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牢固确立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帮其转变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管制方法。这一切并非必然,像托马斯指出的,“没

有充足的根据去假定马克思认为自己是一个预言家，能为焦虑的后世子孙提供一个永恒的真理”(1991:42)。

我们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拒绝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在他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史》中试图让父亲为他的孩子们所犯的罪去负责的全部努力。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置于历史的背景之下，并且确实研读他当时在那种危机之下所写的东西的话，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就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马克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可以免受批判；尤其是作为一个现代主义思想家，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清醒地思考福柯的警告：“宣称逃脱当前现实的体系，以便能够产生另一个社会的、另一种思考方式的、另一种文化的、另一种世界愿景的整体规划，只会导致最危险传统的复归”(1984:46)。马克思可能对这种自负感到内疚，但《资本论》并没有无情地通向古拉格集中营(the Gulag)^①，正像一些更不坦率的“新哲学”(nouveaux philosophes)试图告诉我们的一样(参见 Glucksmann, 1980)。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即使福柯避开任何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的东西，他也被视为始终处于与马克思主义幽灵的交战中，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

为什么我们设想马克思的思想或许在今天是有价值的？在一篇后来斯大林主义强盛时期遭到否定的文章中，卢卡奇(Lukács)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研究结果……恰恰相反，正统观念专指方法”(1971:1)。尽管马克思的思想仍

① 前苏联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i Solzhenitsyn)曾出版《古拉格群岛》一书。“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象征苏联的劳动改造制度。——译者



是一个“真正信仰者”的圣经,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是明智的。马克思的方法是根本的批判方法,具有固有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能力。如果“辩证唯物主义”是斯大林极权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反而有助于认识论上的所有极端倾向:从女权主义到解构主义。在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中,存在着永恒的创新、适应与自我批判的反思。马克思的思想过去和现在都像它所阐释的社会一样充满活力,过去和现在都是旨在实现社会正义。人们似乎已达成共识的是,马克思更有理由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而不是一个新社会的创造者。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同意马歇尔·伯曼的观点,他说:“在我看来,(马克思)今天能够给予我们的……伟大的礼物,不是摆脱现代生活矛盾的方法,而是更可靠、更深入的进入这些矛盾的方法”(1983:129)。

如果马克思探求一种科学,他不也同时创造了一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吗?当然,在他许多著作中,我们能发现一种强烈的反乌托邦的情绪,但就其完整含义来讲,共产主义仍然是一种乌托邦。有许多种声音主张再思考马克思的这种乌托邦因素。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约翰·格雷(John Gray)来说,“在批判的兴趣和客观知识中去压制那些解释其诉求的神话冲动”是将其降低为“一种神秘的和几乎不可理解的迷信”(1995:232)。在解释马克思的自我背景中,雅克·德里达同样但更为积极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然地带着,并且必须带着一种弥塞亚的来世论,尽管有那么多现代或后现代的否认”(Derrida, 1995: 59)。这事实上本是一个非常简化的、“冷”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远离了一切人类的积极努力。乌托邦政治能够被根植于但并不是必然会堕落为极权主义的梦想。也许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更为清晰地提到了

被很多人视为可以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掘墓人——无产阶级相比的新社会运动的变革因子。

松开发条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充满激情地上紧发条的社会主义的时钟(或炸弹?)被他后来的追随者缓慢但确定无疑地松开了,成为它的前身苍白无力的影像(甚至是背叛)。第二国际或社会主义国际在1889年建立,比恩格斯逝世的1895年早几年。对这一新国际机构将继承和发扬第一国际的遗产,人们抱有着很大的希望。科拉科夫斯基几乎没有夸张地宣称:1889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期”(1981:1)。然而,由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这场大灾难中支持他们民族的国家与军队。社会主义之国际主义的巨大希望被粉碎了,因为它的组成部分屈从于大国沙文主义,并且虽然不是完全心甘情愿,但也跳上了各自民族国家的战争机器。这个马克思主义观念和实践历史的分水岭将导引出一股新的、更强劲的支流: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共产主义。我们将在下节考察这一点。但我们首先必须详细地考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它的不情愿的创立者卡尔·马克思去世后的认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作为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教皇”,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对这个学说进行了有机系统化,塑造了其后来的发展。尽管列宁认为考茨基是“大叛徒”,但他也赞扬考茨基在发展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在农业问题上的作用。根据科拉科夫斯基的观点,“在恩格斯之后,考茨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自然主义、达尔文主义进



化决定论等因素的主要倡导者”(1981:51)。考茨基还对工人运动与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造就的复杂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考茨基深知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民主的重要性。他对出现在社会、国家与政党之间新型关系的分析,预示着后来葛兰西对此进一步的发展。他对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非民主本质的反对,直至今天都被人们关注。最后,考茨基是反对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等人“修正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守卫者。伯恩斯坦等人试图完全修正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以适应他们设想的稳定的、不断繁荣和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新条件。

在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家的圈子里,伯恩斯坦的观点比考茨基的观点遭到的谴责甚至更多。他的那种平稳的、非暴力发展达到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费边主义的观点,大受嘲弄。人们故意嘲讽他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什么也不是,运动(社会民主)就是一切”的格言。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s of Socialism*, 1993)为总标题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因为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崩溃。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似乎并不引人注目。在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中,民主的进步似乎暗示着这种可能性:工人阶级政党能够借助于议会发展社会主义的事业。或许通过立法、体制改革、渐进的社会工程,能够达到一种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伯恩斯坦极其敏锐地意识到,一方面后期的恩格斯在追求社会主义过程中倡导严格守法,另一方面恩格斯又对革命雄辩有挥之不去的情感,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尽管考茨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坚持“正统”,但伯恩斯坦却变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革中一位

更为开放的拥护者。

考茨基和伯恩斯坦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之间的桥梁。在这两位思想家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直接进入了现时代,并且摆脱了其大部分的浪漫主义遗产。正如贝尔哈兹(Beilharz)写道,“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牧歌缺乏耐性,这决非偶然”(1992:118)。一种现实主义的气息渐渐进入社会主义的话语之中,而乌托邦因素则逐渐消失了。现代认同(identity)概念与某种田园牧歌式的劳工乌托邦景象不能和平共处。这是马克斯·韦伯的时代,而黑格尔则更多地属于过去的时代。资本主义积累和社会分化产生了一种不能归结为一个简单辩证模式的复杂社会。贝尔哈兹有个令人关注的观点,即“社会民主党把这个断裂的过程推向最远处,结果是最现代的或潜在的‘后现代’的劳工乌托邦”(1992:118)。一种过分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目的论的幻想被消除了,并且它作为一个固定和完善的体系的自我信仰被严重动摇了。然而,在这个现代的时代,众所周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样子)同样是目的论的,并且不会修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缺点。

1914年的创伤和后来的事件——诸如社会民主党1918年以后在德国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完全改变了社会民主党的话语。其一,国家变成了所有社会民主策略毫无争议的母体。因而,从议会中获得更多的议会席位,是获得国家权力与决策权的途径。马塞尔·莱布曼(Marcel Leibman)接着说道:“结果,改良主义逐渐被重新定义。其渐进主义与和平的守法主义现在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不需要详细解释”(1986:4)。正如俄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新的英



雄篇章，西欧社会民主党党员歌颂这种平凡的美德，并且对即使温和的改良主义措施的可行性也漠不关心。过去，即使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准备去支持大众行动甚至是获得利益的革命雄辩，而现在，许多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开始惧怕被动员起来的大众。社会民主党人正在变成力图掌握国家权力的“有责任的”野心家，所以他们反对任何对抗国家的企图，必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即使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也开始被看作十分危险的激进主张。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结束为止，社会民主主义已经突变成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几乎不能把它的历史追溯到马克思那里。凯恩斯(Keynes)把考茨基重新定位成重要人物，而且一种广泛的、无阶级的诉求已经取代了传统上对劳工和工会的依赖。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中央集权借以实施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信念也备受质疑。这种转折在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巴特戈特斯贝格纲领(Bad Godesberg programme)中被象征性地批准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共识被加入到福利国家与政治自由主义之中。这种新型的混合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一种特别稳定的意识形态形式。如帕吉特和帕特森(Padgett and Patterson)指出：“试图重新定义社会民主主义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政党进入了一个意识形态混乱的时期。社会民主党共识的崩溃强化了意识形态的裂变，这种意识形态的裂变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基本特征”(1991:2)。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指南针沦为(主要是)象征或神学功能，但它现在已经被抛进了大海，一种新的变异的政治话语已经创造出来。

到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解释

或发展,有 100 年历史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走到了终点。本质上,在如今全球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中,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被自由主义所同化。伴随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与最终的崩溃,社会民主主义甚至不能摆出坚决反对激进主义的姿态,或者也不能摆出“带有人类面孔”(with a human face)的社会主义的姿态。在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的“密特朗试验”(Mitterand experiment)见证了社会民主主义话语如何在新自由主义分配政策和严酷的全球化之下快速地消失这一历史。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化已经被现代化和自由主义化所取代。最为显著的是,激进主义的标签现在更经常地被右派抓住。社会民主主义甚至丢掉了那思想上或政治上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在战后因其与激进主义和改革相协作而获得的。无论距马克思如何遥远,无论与他如何联姻,民主领域都不再被认为是这些后裔无人竞争的势力范围。

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盲点常常是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当在与殖民地的他者(the colonial Other)打交道时,一种暗含的、甚至明显的对欧洲帝国主义的赞同,伴随着尤其恶意的欧洲中心主义。例如,我们发现,乔治·莱希海姆(George Leichteim)在他的社会主义“古典”历史中,致力于解剖第三世界。其中,他指出了“列宁思想的初期的模仿,即毛主义”和“天真朴素的毛主义形态”(1970:282—283)。不用说,即使该作者不同意欧洲思想家的观点,他也没有把如此贬损的语言运用于他们身上。当然,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自其创始人开始,殖民主义¹⁰就是一个问题。马克思可能很好地把握了俄国发展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政治,但他仍然认为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做了一件好事,并且认为“精力充沛的”美国佬应比懒惰的墨西哥人明显占有优势(见第三章)。



但在最近几十年中，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很大程度上丢失了马克思主义遗产的一种政治潮流，已经在一些第三世界地区呈现出一种不断增长的干涉主义姿态。也许，它将在那里焕发生机，因为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命周期似乎已渐近结束。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社会民主主义确实获得了繁荣和发展。似乎这种欧洲传统可以成功地移植到美洲。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是西班牙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成功地使佛朗哥(Franco)专制政权过渡到议会民主。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性的推动，它支持乃至促成了拉丁美洲社会民主党反抗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霸权。因此，一种决定因素将有助于建立西欧投资的地区安全，并且通过预防性改革以阻止任何叛乱的可能性。然而，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①在全球经济政治关系中寻求南半球与北半球之间更为缓和关系的传统，不再是纯粹自私自利的。以下事实也是如此：社会民主党传统有或至少曾经有某种最低限度的信条——诸如工人组织起来的权利，不可剥夺的自由需要权，民主选举权和对国家公共利益的责任——在从军事统治的长夜中摆脱出来的拉丁美洲，这是一种真正的变革。

今天，社会民主主义在发展中世界正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欧洲中心主义已经被克服，并且在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混合分支。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考虑到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① 前德国总理。——译者

Cardoso)看到的那些挑战。对于卡多佐来说,对巴西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挑战,围绕着三个主要议题:

1. 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的关系,它一度被视为国家的救星(saviour),但现在服从于自由主义私有化的驱动;

2. 社会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模棱两可的关系,现在被全球化的进展所明确质疑;

11

3. 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完成现代化的强大执行力的需要和议会系统的防御之间的棘手关系。(Cardoso, 1993b: 403—413)

社会民主主义是否能够解决这些紧张关系,是一个尚未定论的问题。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改良主义是否能够提供解决发展中国家紧迫社会问题的方案,更是一个尚未定论的问题。当然,那些仍旧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似乎也并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答案。

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

当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在1917年夺取政权,似乎德国和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在1914年的耻辱已被抹去。事实上,一个新的有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混合体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然而,从历史上看,短暂的70年后,这个运动已经明确破产了。本节追溯共产主义思想与国家的兴起与衰落。但我们首先必须谨记:在世界政治史上,1917年正是一个里程碑。如阿瑞吉、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Arrighi, Hopkins and



Wallerstein)写道：“1917年成为如此重大的一个象征，因为它是首次国家权力策略支持者的引人注目的胜利……1917年证实这是可能的”（1989:99）。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无产阶级将如何获得政治权力的清晰概念，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已经阐发了一种改良主义的通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情愿）开拓了掌握国家权力的革命道路。在继承雅各宾派传统方面，布尔什维克是在中国、墨西哥以及在不同背景下的德国发生的更广泛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话语的创建者毫无疑问是列宁，他正当地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核心之一。

列宁力图填补马克思在政治策略上遗留的裂隙。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本质，或者像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被列宁的政治、组织和国家的特定愿景所改变。列宁认识论的突破性进展始于1903年召开的全俄社会民主工党（the All-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个关于确定会员资格的似乎微不足道的争执，导致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布尔什维克实践与态度的整体风格进入到政治词汇表中。“职业革命家”（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y）¹²作为一个政治范畴首次亮相。理论中的独断论或“原则”，与表里不一相接近的策略上的灵活性相结合。列宁主义的机器——政党——走到前台，或者如费里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指出，“基本的能指（fundamental signifiers），重要的职位，在那时进入历史”（1984:190）。为了评估其重要性，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卢卡奇：对他而言，列宁的“令人敬佩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持续不断地运用……于社会主义问题”（1971:73）；而且需要考虑如波郎（A. J. Polan）一样的人的严

峻裁定：对他来说，在一个共谋反对人类自由的专制主义话语中，列宁把政治排除在外，并且试图“把天启本体论化”（1984：204）。

作为仅仅寻求马克思主义实用化的现实政治的代理人，列宁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列宁完全是致力于合理性和带有普遍愿望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构成部分。事实上，把列宁视为一个信仰权力理论的教条主义者的缩影或墓志铭，将更有道理。这就是我们需要至少区分两个列宁的地方。一个是直接民主的列宁，双重权力的设计师和“所有权力归苏维埃”的倡导者；这一个是逝世前几年的列宁，当时他已经生病。他对党一国体制煞费思量，很快变成了一个对无产阶级的独裁者（而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独裁者）。但实际上，开创列宁主义的列宁是先锋政党的创建者、泰勒工作方法的赞赏者和公司经济与政治纪律的坚定信仰者。正如众所周知的，在20世纪早期的俄国，在经济困难，社会和政治倒退的条件下，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的列宁有一个“客观”基础。因此，在许多无法避免的方面，列宁主义变成了落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对1918年的德国来说，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看起来充满希望，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爆发革命，将给他们饱受磨难的事业带来一些安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国际主义者，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信社会主义只能通过资本主义产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并没有接受马克思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信中很少提出必然论的发展设想。最终，世界革命的总部将保留在俄国，因为欧洲革命的希望逐步破灭了。乐观主义依然存在，正如列宁在1919年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成立大会上宣布的那样：“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胜利。”



13 然而,这种新革命浪潮的颜色不再是原始的红色。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指导下,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日益成为反对国际资本主义运动的主体部分。在1921年的西部人民大会(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West)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人要求进行一场反对英格兰和法国帝国主义的圣战(Jihad, holy war)。共产主义把目标转向东方(20世纪初的“南部”)并且朝向民族主义。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只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希望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信仰,到目前这种理论,是一条漫漫长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个被围困的反资本主义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越南、北朝鲜和古巴加入了这个反资本主义的俱乐部。尽管迫于俄罗斯的武力,大多数东欧国家也落入了亲苏政府的统治之下,然而这些革命主要是民族主义革命,它们的舞台主要是农业区域(除了东欧的一些地区)。这一阶段很少有观察者怀疑已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离马克思甚至列宁所设计的一切都很远。关于“苏联本质”的争论损害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苏联的本质是拜占廷式的或神学式的。尽管或多或少的非资本主义的但也绝非社会主义的政体的主要支持者寻求缓和的因素,但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对共产主义的妖魔充满愤怒。

明确的是,苏联在列宁去世后开始了一个在斯大林统治之下的专制主义现代化和集权主义的政治过程。在现代史上,几乎没有与这一过程相似者。在中国,毛泽东的继承者能够从这样一个过程的控制之下退却,而斯大林的继任者发现制度减压是一个更加困难的管理过程。然而,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苏联这块巨石不再像看上去的那

么坚固。经济模式的不断中央集权化无助于效率或者技术革新。政治参与实质上的缺乏,意味着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没有自我矫正机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社会或个体层面上,政治体制只是失去了人民的一致同意;这将最终导致其腐坏或瓦解。在40年中,1917年灿烂而光明的希望已经被玷污了。民族主义的元素被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实践所保留、加强,当然,其惰性也是如此。一个动荡的恶性循环挫败了改革,并且衰败最终导致了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治体制重建(perestroika)。重建的曲调变成了葬礼的进行曲。博格斯(Carl Boggs)指出:“现代性以其多种多样的表现(经济的复杂性,技术,都市化,教育水平的增加)最终摧毁了后斯大林秩序的天空,并且现在存在以任何形式侵蚀共产主义统治的威胁”(1995: 89)。然而这个过程并非必然如此——如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与一体化理论(convergence theories)主张的那样——这一过程被大众起义、劳工组织和人权运动加强的政治斗争所调解。

不久,人们对强加于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开始爆发了。东德在1953年,匈牙利在1956年,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起义,尽管最终被挫败。后者(匈牙利起义)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里程碑。后来,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波兰在1979年至1981年,甚至出现了给人更为深刻印象的人民反对官僚体制统治的运动。这些官僚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比其表现得更为脆弱。面对这些并不能引人注目的选择性的社会模式,西方共产党人开始发展一种“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t)的混合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晚期,共产主义传统本质上开始占领被社会民主党占领的领域。现在,葛兰西—陶里亚蒂



(Gramsci-Togliatti)传统的继承人和考茨基—伯恩斯坦(Kautsky-Bernstein)传统的继承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距离。议会成为政治转型的特权焦点,社会主义被放置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微不足道的位置上。然而,这些令人尊敬的改良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并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90年,“在地中海地区或其他别的地区,欧洲共产主义不再作为一个社会变革的工具存在,更不用说去实现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宏伟构想了”(Boggs,1995:129)。

与令人痛苦的、内向型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争论相反,更广大社会主义世界中的事件被证明是同等的重要。中国革命已经成为继俄罗斯1917年革命之后的第二次伟大行动。如果无产阶级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起义,那么也许“乡村的世界”(world of the country)(农业的或第三世界国家)将会包围和吞没“城市的世界”(world of the city)(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一些激进分子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众所周知的第三世界。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胜利革命巩固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传奇。萨特(Jean-Paul Sartre)通过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的书^①严厉斥责都会马克思主义(metropolitan marxism)的软弱无力。解放已经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找到了另一条出路,而许多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为其呐喊助威。后来,切·格瓦拉(Che Guevara)死后,在1967年,卡斯特罗支持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现实政治再一次粉碎了乌托邦的愿

^① 法农1961年生于加勒比海法属马提尼克岛,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曾为其著作《世界上受苦的人》撰写前言。——译者

景。甚至1975年越南人民革命长时间期待的胜利,也令人失望。中印¹⁵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乘船出海的越南难民(the ‘boat people’),最终埋葬了作为一种进步话语的“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现在,如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一样,资本主义作为经济转型的进步代表再一次出现了。

在1989年,划分东德和西德的柏林墙倒塌了,这象征着苏东共产主义时代的终结。在实践和话语的层面上,1989年的事件成为全球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作为使旧体制消亡的事件,1917年的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是相当的。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不久后提出的:“我们所见的不是一种运动、体制或经济类型的危机,而是终结。相信十月革命是通向世界历史未来的大门的那些人,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1991:117)。没有办法逃避这种结论,即马克思主义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几乎在他所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中都是如此。作为一种极权话语和社会变革的特权路径的社会主义观念已经消失。但是佛瑞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可以把1989年的事件理解为拥有“以剧烈的形式,重申政治生活中最被忽视的方面……即巨大人群发动突然、迅速和新颖的政治行动的能力”(1991:78)。于是,恰恰在作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政府的马克思主义将要到达终点的时候,东欧反抗的人民正在实行一些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行动非常相似的行动。

在几乎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崩溃之后产生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在那些极度兴奋的情绪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阐发了“历史终结”的论题(1992)。当然,资本主义在其所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式上,似乎是“唯一的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西方获得



了胜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和议会民主拥有了一个清晰的领域。事实已经证明了米沙·格兰尼(Misha Glenny)的裁断：“历史获得了新生，远非终结”(1990: 183)。或许稍微被那种氛围冲昏了头脑，格兰尼把1989年在“中欧”(Central Europe)的革命(像其后来成为的)解读为理性战胜非理性、民主战胜极权的胜利。所有作为理论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在此不再是如此清晰明了了。大家都记得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在1898年也诊断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从那场危机中诞生了导向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场世纪末的危机(尽管看起来很长久的样子)将会令人信服地导致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吗？救赎政治的终结将会导致一种反对我们周围复兴的资本主义世界之激进民主的再生吗？这些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并且也是这导言性的一章之最后一节的背景。

晚期马克思主义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是当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皇”。在1977年由意大利共产主义分裂运动(breakaway movement)喉舌《宣言》(*II Manifesto*)在威尼斯组织的一个会议上，阿尔都塞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主要归因于官方共产党当时开始走向了它们自己分裂道路的危机。更准确宣布的任务留给了罗萨娜·卢桑达(Rossana Rossanda)，她宣布：实际上存在的社会主义已经导致了质疑“不是作为一般渴望，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理论**，一种人类存在的不同组织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的观念”(II Manifesto, 1979: 9)。事实上，到1977年，这只是一个对始于十年前的共

产主义传统进程的迟来的承认。因为正是“1968年”(1967年至1969年),象征着旧左派的死亡和新左派的开端。新左派将成为众所周知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后马克思主义因其强调“后”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程度而形态各异。1968年前后的事件导致了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全部前提的质疑:“它的话语的普遍性,它对单一阶级和政党的认同,它的单纯代表(经济)利益的前提,它看不到多种统治形式,它在一个生态限制的世界中不受约束的生产主义”(Boggs, 1995: 182)。

我们可以把1968年法国的五月事件、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与1969年阿根廷的哥多华索事件(Cordobazo),作为同一历史时刻的构成部分。老的官僚主义的、独裁的中央经济集权方式已经面临挑战。事实上,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和我们思考它的方式。尽管在军事意义上这是一种失败,但它使有效埋葬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的新社会运动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其进行了乐观的理解,对他来说,“不受官僚化的党所控制的革命群众之重新出现,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阶级的实践再度统一,有了潜在的可能”(1976: 95)^①。这个结论立足于一种假定,即确实存在一种未堕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旦斯大林主义死亡,它就马上复兴;但托洛茨基(Trotsky)的后继者到来得太迟了。事实上,1968年的意义将在文化层面被证明更为重要。这一领域,

^① 中译文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译者



作为被首要的经济基础支配的“上层建筑”，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如此长的时间（见第六章）。正是葛兰西传统，为新老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纽带。

- 17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主要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发展了作为文化批判的社会主义观念。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开创了对传统或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持续批判的局面。企图去捕获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权威的复杂本质，显示出在维护体制过程中，同意与强迫是同等重要的。葛兰西的暗示性分析（即使零散），不仅拒绝了还原性诱惑，而且企图把握多样性的社会现实。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人们对葛兰西的著作中有一种日益浓厚的兴趣，这种情况远远不仅局限于西欧。一个例子是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个人的或联合的工作。他们不仅沿着葛兰西的足迹发展了一种后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十分熟悉如福柯与德里达一样的后结构主义者。他们坚持的一点是，需要抛弃渴望总体性的传统社会主义。在拒绝一切本质主义的先验论时，他们主张：“每个总体的不完整的特征必然导致我们放弃分析领域中作为被缝合并且自我规定的总体‘社会’这一前提。‘社会’不是有效的话语对象。不存在单一根本原则的固定——而且因此组成整个差别领域”（1985：111）^①。

如果葛兰西启发的“开放”马克思主义是 1968 年的一个结果，那么

^① 中译文见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2—123 页。——译者

也有许多幻想破灭了,并转向了非理性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工人们回家了,学生们变成了雇员,共产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我们从现代主义的千禧年说转到新哲学的保守朴素之上。后者,主要是前毛主义的“1968年的孩子”,因为他们过分指责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俄罗斯古拉格劳动集中营的哲学而变得声名狼藉。作为这一学派的重要人物,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在《人情面孔的野蛮》(*La barbarie à visage humain*, Lévy, 1977)中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理论,而赞成一种观念,其中权力“无处不在,可是也无处可寻”。对于列维来说,教训是明确的:解放是不可能的,美好的社会只是一个梦想。政治斗争介于统治、服从等虚无理论与热爱自由之间。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界线充其量是模糊不清的。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一度是阿尔都塞主义者,他的著作《主要的思想家》(*The Master Thinkers*, 1980)充满仇恨。在该书中,他把马克思视为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的缩影;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借助“全体的和最终的革命的迷信”与“为了集体利益制造恐怖的国家”,隐藏在社会主义制度释放所有压迫的背后。

我们可以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学术生涯中看到“1968年”的整个歧义,而利奥塔主要体现为一个偶像或魔鬼。首先,值得记住的是:许多年来,利奥塔是《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①政治—知识分子团体中的一员。这个团体致

① 《社会主义或野蛮》是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勒福尔等人创办的一份后现代派的杂志,围绕着该杂志形成了一个后现代派的小团体。——译者



力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内在”(internal)批判,它包括一些左派主要思想家,比如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和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利奥塔对马克思主义不抱幻想,源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在那里,他不仅目睹了共产党的妥协和1968年5月的事件,并且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利奥塔远不是仅作为一个简单的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都市思想者。他与马克思主义断绝关系最为清楚地表现在他1974年的著作《利比多经济学》(*Libidinal Economy*, 1993)——他自己后来称之为“邪恶的书”中。——在该书中,他阐发了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念背道而驰的利比多经济学观念。马克思主义对利奥塔没有效用,他转向了“对元叙事的怀疑”。他1979年的书《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1984)逐渐成为后现代信徒的圣经,但重点是它正好在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利奥塔并非是唯一生活在马克思阴影下的政治思想家。尽管他强烈地批判马克思甚至否认与马克思的关系,但他却不能否定他的历史。

在过去数十年,正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可能最大地影响了进步的思想进程。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不真正清晰。一方面,他自己告诉我们,“自1968以来发生的事件,并且可以说使1968年事件成为可能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1980: 57)。福柯的主题毫无疑问与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内容相对立,但把“1968年事件”(或福柯)视为“反”(与“后”相对)马克思主义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也从皮埃尔·马修莱(Pierre Macherey)那里得知,正是福柯抛弃了他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解释了为什么福柯“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开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切”(引自Balibar, 1992: 39)。另一方

面,我们已经有了更为新近的解释,例如阿尔都塞以前的合作者艾蒂安·巴利巴尔所作的解释。对巴利巴尔来说,“可以依据与马克思的真正斗争来看待福柯的整个工作,而且也可以把这个斗争看作福柯丰富成就的动力之一”(Balibar, 1992: 39)。沿着这一探究线索,我们可以认为福柯是一个进行马克思批判的杠杆,一个有助于发展更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根本动力的晚期马克思主义之优越(即使是异端的)制高点。

福柯曾经称自己是一个“尼采式共产主义者”(Nietzschean Communist),而且他似乎对这种异端的概念很满意。对于福柯来说,在其追求科学性与接受其权力结构时,马克思主义(一个以大写字母 M 开头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不可避免地与统治(domination)关系密切。众所周知,福柯阐发了一种“微观”权力论,聚焦于“微观”权力的规训机制。尽管与许多中央集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意见不一致,但它很容易地适合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诸如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最后的著作(1980)。正如阿卜杜尔·简穆罕默德(Abdul Janmohamed)指出:“福柯自己知道这些问题:它们不仅包含在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合并中,而且包含在他匆忙地避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权力功能观中”(1996: 34)。我认为,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福柯的思想中是一个积极的参考点。我们也同意,需要分析多样性的权力,不能把权力归结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阶级和政党的三位一体。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在对权力关系的复杂性的研究中,福柯很可能对任何希望与教条主义、统治结构决裂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和挑衅)。



我们现在转向德里达。德里达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运动和责备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但他最近承认他(和我们)欠马克思的债。德里达十分清楚地表明:“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的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Derrida, 1994: 88)。① 德里达关注的焦点在于本质的马克思主义特性,并把其作为反对僵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苏维埃教条的批判尺度。众所周知,德里达提出了一种以解构主义著称的学说。解构主义以一种尼采式的精神,“产生了一种极其严格的怀疑和修辞的自我意识的话语”(Norris, 1991: 75)。也许鲜为人知的是,德里达最近试图使这种学说更多地符合马克思主义。现在,对于德里达而言:“至少在我看来,除了作为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主义从来没有任何意义或重要性。这也就是说,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精神中,解构主义没有任何意义或重要性。另外,也存在这种称之为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激进化企图”(1995: 92)。尽管人们可能对此有不同意见,但对于所有拥有激进愿望的知识分子来说,这至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持久吸引力。

这不是讨论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两者之间关系的地方(见第八章),但我们应该理解,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是多么重大。与福柯一样,德里达常把自己视为一个固执地“反对事实上

① 中译文见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译者

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苏联、共产国际以及由它们引发的一切东西,也就是说这许许多多的东西……)”(1994: 14)^①。现在,随着“教条机器”(dogma machine)的死亡,德里达已没有借口继续回避马克思。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斯大林主义的高压手段,已经对整个一代会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活力的政治知识分子产生了隔离与疏远的影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的终点,这个时代已经被德里达称之为“马克思的准父亲形象”(the quasi-paternal figure of Marx)所统治,以至于现在我们能够对他的**关键遗产**重新赋予新的活力。回顾以往,也许并不奇怪,这种航程已经经由尼采绕了一个圈子。尼采提供了一种大量需求的解神秘化的批判武器。通过德里达大胆(即使不合时宜的)断言马克思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和解构理论的迷宫现在可能分别得到了某种澄清。

尽管我将在第八章中更详细地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我愿意在此提出一些初步意见。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是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与男性主导是不可分的(见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生产主义是不可分的(见第二章)。当然,这些稍稍夸大的命题将需要进一步说明。然而,后现代主义或其各发展线索,似乎已经发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弱点。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已经沉迷于这些弱点,并且发展了一种世纪末的虚无主义政治学。但其他人企图复兴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动力,作为我们超越现代性的批判。新社会运

^① 中译文见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译者



动,如女权主义,已经如此积极地(当然也是批判性的)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意外。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主张,后现代主义真正标志的“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中,现代性成为自我反思的,它更充分地意识到自身和批判自身,更批判性地意识到其承诺与实践两者之间的差异性”(1994: 9)。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社会主义”将由一种类似的精神所引导。这似乎是一条理智和冷静的途径,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解构主义与

21 建构主义,并帮助我们走出迷宫。

第二章 红与绿:马克思主义与自然

21

马克思主义探索自然的历史是非常奇特的。它充满遗憾的叙事,例如恩格斯和他的“自然辩证法”,李森科(Lyssenko)在生物学上的“无产阶级的科学”。然而,对于一个在21世纪仍然充满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红色与绿色政治的融合无疑将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回首审视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关于自然问题不甚明确的遗产,我们会发现对今天的争论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在总结了背景之后,本章将继续探讨随之而来的由不同理论家对发展社会主义与新生态政治学相互结合的多种尝试。根本的问题是,在关于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 approach)与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c approach)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三节探索女权主义与生态学之间一些有趣的相遇,包括一种激进的(即使是有争议的)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概念的发展。最后,在结尾的一部分,本章思考围绕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争论的当前状态。正如后面大部分章节一样,本章的重点不仅考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而且也使经典马克思主义以批判介入的精神去直面当前的热点问题。



分化的马克思

马克思本人坚定地反对“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①，坚信人类能够支配自然。尽管无疑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精神气质(a Promethean ethos)贯穿于许多马克思关于自然的零散的著述中，但其中也有相当多的歧义。去设法发现一个“绿色的马克思”(green Marx, 一个生态主义的前卫术语)，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成效，但统一马克思的自然观并否认其存在歧义，将是错误的。同时，我们应该了解施密特(Alfred Schmidt)提到的“技术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误解，即马克思在掌控自然的现存形态中，仅仅关注取得数量的增长”(1971: 12)。尽管，马克思确实不断地提到“控制自然”，但他主要倾向于从由社会成员掌握社会需要的方面来设想这一点。马克思处理的更广泛的问题是区分“必然王国”(realm of necessity)与“自由王国”(realm of freedom)。对马克思来说，自然是作为人类实践的一部分存在的。马克思在“经济学与哲学手稿”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975: 398)^②。

对于马克思来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Marx,

① 语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1973: 706)①。这是被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义传统(见第三章)所接纳的马克思,这种发展主义抱有自信的、傲慢自大的人类支配自然的观点。然而,当马克思描述了城乡之间的壁垒分明和如此典型的增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他能够批判地指出这种壁垒已经扰乱了“人类与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即重新恢复被人类以食物和衣服的形式消费的土地成分,因此,破坏了维持土地持久肥力的永久自然条件”(Marx, 1973: 505)。马克思可能会因此充分理解在当今时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影响。对马克思来说,事实上存在着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另外,去区分转型的劳动过程与其他过程,比如在农业中,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劳动被运用于促进自然增长过程,这可能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

马克思的确嘲笑那个时代的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我们能够发现,对自然的崇拜仅限于一个小城镇居民的星期天散步,这些居民如孩子般幼稚地对布谷鸟在另一种鸟巢里产蛋感到惊奇,对有意设计的以保持眼睛表面湿润的眼泪感到惊奇,诸如此类”(引自 Grundmann, 1991: 110)。因为多梅尔(Daumer)浪漫的信念希望看到“人类为自然牺牲”,所以马克思接着向多梅尔先生解释道,现代科学已经彻底改变了整个自然界。对马克思来说,如果自然是一个被控制的对象,然而,他确实已经意识到这一过程的限制。这种自然的限制并非纯粹的“自然”,而是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因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坚决主张的,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总是辩证

23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9 页。



的,与自然既和谐相处同时又相互斗争:“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Parsons [ed.], 1977: 160)^①。

最近出现了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和它为今天留下来的进步力量的遗产的令人关注的争论。一方面,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致力于捍卫马克思的功绩,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潜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1991: 52)。马克思被视为主张现代的自然概念,这一概念可追溯到黑格尔和尼采,直至培根。关于自然的生态中心主义观点被视为是不一致的,因为它回避了谁将定义生态问题本身的问题。为了反对一个毫无疑问的生态主义的污染概念,格伦德曼引用了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观点。道格拉斯认为,“不清洁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Douglas, 1966: 106)。这意味着污染是一个文化上的特定现象。最重要的是,格伦德曼维护马克思的人类必须努力支配自然的观点。对格伦德曼来说,这并不比他企图“支配”他的小提琴有更多的问题。他与绿党(Greens)并无太多共鸣,因为绿党批评这种对自然的独创性的态度。他拒斥绿党诉求“一种与自然的新的和谐关系”,他视这种诉求是探寻“一种世界的返魅”(a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神秘运动的组成部分(Grundmann, 1991: 120)。

在与格伦德曼的论战中,泰德·本顿(Ted Benton)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采取了一种独立的更多批判的立场。对本顿来说,“(对自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7页。

的)无限驾驭的观念,‘控制所有自然与社会进程’的计划,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它是不可理解的”(1992: 67)。马克思完全专注于一个通过科学发展与对自然的工业支配的19世纪的进步概念。拒绝“支配”自然的计划,并不是陷入朴素的自然崇拜和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之中。本顿正确地关注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处理围绕人类发展的自然局限问题的政治背景。尤其是他们和马尔萨斯的论战(马尔萨斯把人口和资源短缺视为限制增长的因素,因此需要社会改革),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受着这些争论的政治学所驱使,怀疑所有自然界限的论点”²⁴ Benton, 1992: 56)。最后,本顿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十分矛盾的,并经常²⁴在人类生活与其自然条件联系的方式上存在着矛盾。现代主义的、无情的“控制者”的马克思,可以与更为绿色、浪漫,甚至田园风情的马克思相对应,后者拥有一个人类前途的乌托邦理想。

在马克思多种自然观之间去寻求一种平衡或一种调和,可能不是一个难题。在这一点上,最好记住由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得出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寒流”与“暖流”的区别(1970)。这可能是一种比“两个马克思”——一个是科学的,一个是乌托邦的——更为精确的表述。在第一章中,我已经指出了,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当今时代更可能得到捍卫。在自然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被19世纪60年代的科学话语所束缚: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进化论和宇宙统一概念提供了理解所有现象的钥匙。像科拉科夫斯基指出的:“这一天的到来指日可待:隐藏在大量的混乱的多样性之后的自然的统一性,将暴露在人们的眼前”(1978: 376)。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几乎不能在科学方法论



的指引下，像马克思敌视马尔萨斯那样敌视绿色。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是进化论的，但在本质上是保守的。

如果说马克思留给了我们的是歧义，那么恩格斯则留给了我们一个通常困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然辩证法》文本。对恩格斯来说，自然是辩证法的证明：“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应，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Marx and Engels, 1987: 492）^①。恩格斯从当前自然科学中导出的辩证法的规律有三个：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在某种意义上，恩格斯寻求的是普遍因果关系的基础。从他自学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机械学和数学研究中，恩格斯希望获得最终的科学方法。他从其所构想的一种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再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嘲笑恩格斯这本相当奇特的书，不是一件难事。只要说这种自然主义的进化论与马克思的观念不一致就足够了。尤其是，马克思从未提出过自然本身无论如何是辩证的观点；至多，他想象有一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达尔文主义似乎已经使其通过这条路进入到马克思主义。

25 就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地位（position）来说，评价恩格斯的自然观并不是简单的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的观点，两个人的劳动存在着分工：“因为马克思全神贯注于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正是恩格斯承担了解决自然科学发展的整个过程提出的新理论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务”(Marx and Engels, 1987: xx)。其他人极不情愿地把《自然辩证法》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产品。施密特最系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概念的著作推断,“与他[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对费尔巴哈的论战所达到的立场相比,[自然辩证法]代表了一种朴素实在论的倒退”(1971: 195)。正是从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中,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出了它的辩证法的奇怪“规律”。它也无情地导致了苏联在遗传学和农业上的李森科事件(Lysenko affair)。在这个事件中,政府推广荒唐的“无产阶级科学”来打击“资产阶级科学”。李森科主义及其改造自然的浮夸计划承诺用技术解决农业问题,成为斯大林政策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基础(见 Lecourt, 1976)。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后来的思想家总能遇到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考茨基在发展稍微带有达尔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主张人类史来自于自然史,其运动规律是生物法则的反映,人类史变成了自然规律的一个方面。而卢卡奇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主张:“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自然的形式、内容、范围和客观性都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1971: 234)。对卢卡奇那黑格尔色调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自然是溶于形而上学设想的“精神”之中。当然,我们不能把自然消解于社会中,也不能把社会消解于自然中的。科尔施(Karl Korsch)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他能更好地理解自然与人类历史的复杂辩证法。他主张:“既不是自然或者有机自然与其一般意义上的发展史,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起点。所有早期的社会历史形式都可由此得到唯物主义的理解”(引自 Schmidt, 1971: 47)。



26 无论如何谈论马克思主义自然学说中的鸿沟和矛盾性，它们都一定会统一在其人类中心主义的旗帜下。就是说，关于自然的讨论总会被人类解放的视角所框定。反过来，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学说也可以支持人类解放的计划，但这种学说将在一个承认非人类世界道德立场的广泛概念内展开。这样，权利概念就能够被拓展至动物和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中。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本来应该鄙视以权利为基础的理论”（1991：85）。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仍希望囊括各种生态忧虑，如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的。目前，我们可以接受埃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组成部分）描述为对自然采取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这种取向中，“非人类世界被归结为资源的仓库，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就是说，仅就其作为服务于人的目的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来说，它是有价值的”（1992：26）。在这个基础上去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生态学，从表面上判断似乎是困难的。

社会主义者与生态

在思考社会主义者与生态学的当前结合之前，我们需要提及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在新苏维埃革命起初的强烈热情中，在各种议题上都存在着激进立场，包括生态问题。精力充沛的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i Lunacharsky），在发展一个有影响力的环境保护运动上倾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并且他鼓励把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发展。正如道格拉斯·韦纳（Douglas Weiner）在一个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前沿性研究中揭示的，“令许多人惊讶的是，在20世纪30年

代早期,苏联就处于环保理论与实践的前沿”(1988: x)。苏联是第一个为生态社区研究而设置保护区的国家,它早期在社区生态学方面的进步和改造退化土地景观的努力,仍然具有研究价值。尽管这种环保取向可能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绿色保护主义”,但它确实反应了早期苏维埃已经意识到了在人类需要和自然之间需要一定的平衡。

然而,众所周知,苏联执行了一项方针,旨在加速工业化,而丝毫不关注其对环境的影响。不久,就不再有环保运动或任何其他作为强大发展驱动力的抵制力量了。咸海(Aral Sea)的命运并非是这个可怕过程的唯一例证。曾经如爱尔兰岛大小的咸海因为其支流改道,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干涸。如大卫·戴克(David Dyker)指出:“照目前的趋势,它将在21世纪前几十年就会完全干涸。水蒸发掉了,这导致在咸海地区有害的盐类释放进入大气层,这些有害的盐类能产生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其结果类似于核辐射”(1992: 127—128)。当然,这是苏联发展战略引起国内环境破坏的例子之一,东欧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受到了影响。社会主义对许多人来说成了污染发展的别称。毫不奇怪的是,当苏联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放之时,许多蓬勃发展的环保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主化。²⁷

如果有一个事件能够代表潜在于苏联发展范式中的生态灾难,那么这个事件就是1985年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意外事故”。席卷西欧部分地区的放射性气体,使人们深刻意识到生态问题的跨国性质。像卡米莱里和福尔克(Camilleri and Falk)断言:“切尔诺贝利意外事件,生动地说明了物质环境与人类技术在真正的全球规模上怎样紧密结合在一起”(1992: 178)。这是我将在本章的下一节探讨的全球化与



可持续发展的议题。现在我们应该把切尔诺贝利事件作为苏联发展主义者缺乏对环境关注的象征和症状。恐怖的切尔诺贝利反应堆泄露的后果同样意义重大。在苏联政治的转折点上,开始试图控制新闻造成了孤立无助。看到未做防护的工人们去处理放射后果和做清洁工作,立刻感觉他们既是英勇的,也是可怜的。“支配”自然的计划回到了起点,我们亲眼目睹了其严重而恐怖的后果。

非正统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家,比如欧内斯特·曼德尔,在20世纪60年代勉强承认了生态的主题。然而,这种承认仍然被强烈反对马尔萨斯主义的看似不重要其实后果严重的“自然限制”的论点所影响。巴里·康门勒(Barry Commoner)把曼德尔看作一个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生态主义者。按照康门勒的说法:“我们能从自然中学到基本的经验:除非在更大的、全球的整体中成为相互协作的组成部分,否则一切都不能幸存”(1973: 299)。取代直线的、自我毁灭的发展过程的,就是康门勒所说的“闭合的圆”(closing the circle),它通过循环利用和其他的设计方式去完成巨大的生态循环。使这种观点具有社会主义并且不仅是生态的愿景的是:康门勒把贫穷、极端歧视以及战争带入生态这个综合体中,把它们作为解决环境危机计划的障碍。对环境所欠下的债已经展示给了人类,并且以一种罗莎·卢森堡著名的“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 or barbarism)的现代视野给予显现。康门勒认为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或者是理性的、社会的组织去使用和分配地球资源,或者是一种新的野蛮状态”(1973: 296)。

另一个早期具有生态观念的社会主义者是恩岑斯伯格(Hans-Magnus Enzensberger)。《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编辑们在

他的《政治生态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1974年版导言中说,这是“超越纯粹地打压或拒绝环境保护论的首次马克思主义尝试之一”(Enzensberger, 1974: 1)。然而,恩岑斯伯格仍然主张,“劳动阶级几乎不怎么关心一般的环境问题是易于理解的”,并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生态是关系中产阶级的事情”(同上: 10)。似乎此处是一种李森科把资产阶级科学与无产阶级科学作鲜明区分的微弱重现。生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引起的,这将成为社会主义者付诸精力的关注焦点,而不是被中产阶级自由派所关注的不幸的副作用。对恩岑斯伯格来说,“对生态危机的全神贯注表现为完全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现象——即资产阶级社会衰落的一种表现”(同上: 17)。似乎这样一种还原论者的观点显示出,社会主义者将会因为恩岑斯伯格所指责的生态主义者的“盲目和幼稚”而受到惩罚。

毫无疑问,把红色与绿色结合在一起的两种最成熟和最有影响力的尝试属于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和格尔茨(André Gorz),我们会依次对之进行考察。巴罗最早是因为他与东德当局不同政见的纲领——《东欧的选择》(*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Bahro, 1978)而崭露头角。后来,巴罗流亡于西德,他加入了绿党(Green Party)并致力于生态问题。他以一种假定开始:“马克思从来不去追问地球是否有限度,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根本看不到限度”(Bahro, 1984: 143)。现在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愿景不再是简单的乌托邦:“我们已经达到极限。自然界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东西,它开始反击了”(同上: 184)。当巴罗变得越来越“绿”时,他开始注意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主张中少有的优点。巴罗把工会视为社会上最重视环保的力量之一,特别



29 是在与和平和生态运动相比之下,尤其如此。这都是发生于1968年的巨大文化转变的构成部分,巴罗随后接受了这种转变。尽管巴罗并没有否认他思想中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因素,但他断言:“我是‘绿色的’而非‘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与工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同上:235)。

当坚持原则的原教旨主义者和希望把原则运用于实践的现实主义者产生的冲突十分严重时,巴罗最终离开了德国绿党。巴罗不能接受现实主义者转向议会政治,他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为“监狱体制”。反而,巴罗鼓吹停留在国家的城墙之外,建构与之平行的机构如公民议会。对巴罗而言,整个工业体系注定会消亡,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去建立一种“二元权力”(dual power),这种权力类似于列宁所鼓吹的在他那个时代致力对付的腐朽资本主义的权力。巴罗,作为后工业时代的乌托邦主义者,仍然倾向于按照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范畴来思考。他也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他几乎看不到第三世界受压迫人民在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巴罗公开承认他在发展一个合乎逻辑的生态社会主义方面的局限:“我已经从科学社会主义转回到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我已经从阶级维度的取向转向了平民的取向”(同上:220)。尽管这是一个可以站得住脚的政治立场,但并没有使我们在研究绿色与红色政治二者之间的兼容性上走得更远。

当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寻求相似的生态观时,比起巴罗来,格尔茨似乎是一个更为折衷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行为者。格尔茨的出发点是:“以增长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已经灭亡。十分接近于它的以增长为

导向的社会主义,反映的是我们关于过去的扭曲影像,而不是我们的未来”(1980: 11)。如果这种观点是陈旧的,那么生态学就是新的。格尔茨把这种新视角视为与资本主义及专制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互不相容。然而,他主张生态学与他所拥护的自由主义的或民主的社会主义是相容的。格尔茨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严重依赖于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的学说,尤其是可以视为生态良性的社会所必需的劳动力概念。这个稍显矛盾的后工业的乌托邦,与一种自动化、计算机化的温和观点和一种把国家作为中立的技术管理者的观点密切相关。毫不奇怪,激进的生态主义者主张:“在尝试中央计划与地方自主性、工人的自我管理的结合中,格尔茨技术专家统治的后工业乌托邦充斥着悖论”(Eckersley, 1992: 135)。

30

格尔茨不能摆脱社会主义运动自产生以来面临的困境——诸如国家、计划和民主的问题。他以一种大胆的方式研究生态问题,正像他早期研究新技术问题一样。然而,最终他思想中的折衷主义似乎导致了矛盾。我们真的能够使技术和“小的即是美的”、国家计划和地方控制、高端技术和伊里奇的“交际工具”(convivial tools)和谐相处吗?弗兰克尔(Frankel)称格尔茨的愿景是“令人困惑与充满悖论的”(1987: 58)。生态无政府主义者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总结了格尔茨的生态乌托邦是“一个幼稚的‘自由的’的迪斯尼乐园”(1980 —1: 188)。这并不是说,不能设想一个更为合乎逻辑的生态社会主义。这种设想将基于“政治的多元化、公众的问责制与在经济计划中的广泛参与”(Eckersley, 1992: 136)。生态与社会公正的目标无疑是相容的。尽管切实可行的政治体制并不容易形成,“生态社会主义”对从开始就困扰



着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的困境也并无简单的答案。

如果我们在探究生态问题时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的矛盾之上,就不应该假定生态是不存在问题的。持生态中心主义观点者不会自动地采用一种“超越左和右”的话语,这是民粹主义者长久以来的一种幻想。努力把红色与绿色话语结合在一起并非折衷派的特权。正如大卫·佩珀(David Pepper)在他对英国绿党的意识形态进行仔细解析之后所揭示的,绿党的意识形态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因素:一方面它把理想社会看作既是绿色的又是公共的,另一方面把自由主义(个人自由)的根本要素与少许无政府共产主义、生态法西斯主义、非生态中心的‘客观科学’至上的信仰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1993: 58)。毫不奇怪,面对这种奇特的混合,许多社会主义的生态积极分子试图发展一种更为清晰的视角。然而,在转向这些更为近期的关于全球化时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女权主义和生态问题的关系。

女权主义与生态

31 如果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成功地与生态问题结合,那么女权主义,至少就这种运动的一些潮流来说,已经发展了两种话语的有影响的互利关系。坚定的生态女权主义开创了一个新的聚焦点或学科。因此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宣传者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写道:“女性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们的统治与解放也同样相连。女权运动与生态运动因此是一体的,而且主要是一种针对男权统治的不正常发展的反动趋势”(1989:47)。女性与生态运动之间不仅存在着利益的交汇点,而且它们也被视为同一事物,因为它们面对相同的敌人。生态女

权主义,无论其包含着怎样的细微差别,都导源于一个二元对立式的自然/文化对立的前提。生态女权主义不赞同自然可能由文化构建的观点。女性等同于自然,并且自然被看作是具有女性特质的。如此女性/自然与男性/文化的对抗,被看作代替了被视为出奇过时与不相干的所有左与右的政治之间的分歧。

到目前为止,生态女权主义最有影响的阐释体现在范达娜·希瓦的著作《活着》(*Staying Alive*, Shiva, 1988)中。希瓦在一个启蒙运动的广泛视域中论证了她的生态女权主义。她的生态女权主义与进步和发展的观点密切相关,这种观点“在没有任何评估这个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有多少在消失、消失得有多快的情况下,开始去毁灭生命”(同上: xiv)。科学被看作是造成自然转变成人类的原材料资源的原因。希瓦认为女性是具有“保护作为人类生存条件的自然”特权的斗士(同上: xviii)。反抗自然的人类暴力导致生态危机,男人暴力侵害女性导致镇压与剥削,这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似,甚至相等。对希瓦来说,女性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一个层面上,自然作为体现女性原则的象征;在另一个层面,自然被女性原则所滋养着,孕育生命,提供食物”(同上: 38)。女性和自然分享了一种与男性和科学不同的哲学:一个以养育和合作为基础,而另一个只能说统治的语言。

生态女权主义的政治规划对其具有广泛的解放作用。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女性,被认为有接受生存专业技能的特权。对于希瓦来说:“她们思考与实践的生态范畴能够成为解放一切的范畴,解放男人和女人、西方和非西方、人类和非人类等地球上的各种要素”(同上: 224)。生态女权主义因此主张一种扎根于和谐、可持续与多样性原则的生态中心



- 32 哲学。在印度,抱树运动(Chiipko)的女性们被卷入了以一种被希瓦看作是范式的方式保护她们森林的斗争。这些女性用代表着强大力量的动作,即抱住树木,以阻止伐木工人把它们砍倒:

拥抱我们的树
避免它们被砍倒
我们山中的财富
保护它们不被劫掠

(引自 Shiva, 1988: 73)

生态女权主义是一种整体论的自然学说,一些人可能说它是精神性的。它在国际环境运动中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然而,对生态女权主义的批判是毁灭性的。生态女权主义以一种对自然与文化两者间高度可疑的分离和对立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是19世纪浪漫主义话语,这导致生态女权主义者赞扬反对现代性的进步、工业化和发展的自然美德(这种美德有时是想象的)。正如莫利纽克斯和斯坦伯格(Molyneux and Steinberg)指出的一样,生态女权主义建立在理解(误解)“二元论和还原论的科学思想本质,以及在同时科学所破坏的东西的浪漫化”基础之上(1995: 89)。这种观点基于一种过度还原论的科学观,仿佛作为所有进步的载体和动力的科学的良性观点已经头足倒置了。此外,这种科学观似乎忽略了在女权主义和认识论中长期存在的关于科学本质的论争。希瓦和如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一样的其他作者的生态女权主义观点(参见 Mies and Shiva, 1993),把生

生态女权主义与科学的本质主义结合成为一项宏大的事业。科学不能被完全自动和天然地还原为一种男人的事业。在生态女权主义中,这似乎不只是微不足道的还原论。

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弱点可能是把生态与女性等同起来。尼采(Nietzsche)曾经说过,“女性比男性更为紧密地与自然相联系,并且在所有主要方面她都始终如一。文化对她而言总是外在的东西……”(1964: 23)。在所有方面,女权主义都反击这种连接女人与自然的本质论。仍然有一些生态女权主义者依旧跟随玛丽·戴利(Mary Daly, 1979)和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 1978)的脚步,坚持女性与自然的特殊关系。像伊丽莎白·卡拉赛(Elizabeth Carlassare)所指出的,³³这种本质论“指的是这种假定,即一个主体(例如,一个“妇女”)是由前社会固有的、恒久不变的品质构成的”(1994: 52)。所谓的自然—女权主义者力图赞美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特别关系,赞颂她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改变自我意识以使自己与自然更为协调。简而言之,就合作与生态敏感性而言,女性的“天生的”能力推动了反抗男权统治社会的进程。无论在连接女性与自然去反抗男人与文化的这些尝试背后的动机如何,明显的是,从尼采以来的这类立场常常用来压迫女性。而且,它对生态政治的贡献也是值得商榷的。

生态女权主义的本质论批判是强有力的,但是,这并不一定使之成为一种无效的政治观。如戴利和格里芬一样的女权主义作家根本上旨在表达一种压迫女性的立场,似乎是不可能的。她们的自然—女权主义的批评似乎同等地重视内容和风格——通常是诗意的和含蓄的。这种当前的批判带有唯科学主义和不宽容的色彩,尤其是涉及到自然—



女权主义者和文化生态女权主义者的“非理性主义”的时候。也不只是因为不符合一种可接受的政治实践的西方标准,这种话语就是“无政治意义的”。如卡拉萨雷(Carlassare)主张:“然而,在此基础上不考虑文化女权主义排除了向此种立场学习的可能性,掩盖了依附于生态女权主义大伞之下的各种立场和话语形式的合法性”(1994: 65)。当然,毋庸置疑生态女权主义者的论点与政策的活力和创造性。她们似乎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转型政治学作出了真正贡献。她们把女权主义与生态问题和运动结合起来的尝试必定是一种积极的行动。

基本上,生态女权主义的批判一直是它的“文化上”的变体与潮流的批判;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者不一定会遭受同样的批判。这种潮流拒绝所有本质主义的女性观,转而主张性别在当代社会的社会和物质建构。她们认为并不存在女性的不可改变的本质,这种本质可使女性比男性或其他事物更接近自然。这需要承认女性经验的多样性,而不是试图在一个共同的标签下使之均质化。这尤其会引领我们去区分第三世界的女性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之间完全不同的利益。我们不能停留于此,因为“第三世界女性”的范畴本身是本质论的形式,34 这种本质论拒绝承认多样性。在这个基础上,想象这样一种生态女权主义是可能的:它不受本质论的困扰,提倡一种新的普遍主义以及被视为一种生态—弥撒亚信仰形式。在这一节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详细探讨这种生态女权主义可能包含的一些意义。

像塞西尔·杰克逊(Cecile Jackson)总结的,值得记住的是:“技术环境保护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性别盲的(gender-blind),或者因为其根本不承认性别差异,或者女性在那里被视为一个截然不同的类别,因为盛

行的是性别的刻板印象,而家庭一直被当成一个单位来对待”(1994: 123)。正如马克思主义一样,如果我们讨论的话语大体上(本质上)是性别盲的(见第五章),那么生态女权主义则扮演了一种积极的角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它一直在探寻民主等价物(democratic equivalent),这种民主等价物会联合各种斗争形式分别反对性别压迫与环境恶化。这已经显示出一种敏锐意识,即意识到我们和非人类世界及其问题的本质的关系。当生态女权主义被看作是一场政治运动时,它所显示出的历史本质论的标志是更可以理解的。在女权主义和环境保护论之间寻求共同点,并在它们之间去寻求更多的合作,已经是一种思想趋势的首要目标,这种思想已经对激进的环境话语作出了一些最独创性的贡献。

生态女权主义的一种更为社会或物质的发展将可能聚焦于性别而不是女性。正如在女性与发展领域中,近年来已经发生了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关注的焦点在性别与发展之上。因此重点在于发展的性别关系(在这种情形中,也可说是环境问题),而不在于把女性作为问题或者解决方案。关注女性并不构成一种性别分析,性别分析需要关注性别差异的社会角色与身份认同。这将转而引导我们批判地考察家庭而不是假定其不存在问题。家庭现在远非被理解成一个单一的现象,它似乎被看作是受制于阶层(class)或其他社会划分——主要包括性别划分。从生态角度来说,如塞西尔·杰克逊所说的,我们必须理解,“家庭中的个人将拥有不同的目标和生活策略”(1994: 122)。这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对待诸如可持续的农业与林业保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能够发现特定的物质和社会原因,解释为什么女性对与环境



相关的问题有特别的观点和实践。

35

作为一种政治学,生态女权主义在局部的和经验的维度上与“后现代取向”一致。它把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看作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身体的生态灭绝”(ecocide of the body)观念在社会形态的生态女权主义中居于中心地位,并且凸显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影响。受福柯影响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指引我们走向一种新的解放政治学。这假定了一种女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生态的取向。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新的真理/权力关系,比当前的权力关系较少压迫性。生态女权主义指向一种新的体制,性别和环境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中是更为平等的。如瓦尔·普兰伍德(Val Plumwood)指出的,在人类历史的这一阶段,我们需要“一种对人类两性理想的解释,这种解释承认与男权主义相关的对自然的统治不受欢迎”(1988: 22)。这需要批判所有形式的二元论,不管是男性与女性,心与身,自然与文化,理性与情感,还是公众与个人。

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里,生态论争从一种“美好生活”(good life)的自由主义概念转向关注地球的生存。地球上的资源被看成是有限的,“有限增长”被人们普遍接受,关于人类生存的冷静清醒的前景突显出来。争论的第一阶段关注与人口增长相关的物质短缺和食物的匮乏。到20世纪80年代末,关注增长的极限已经转向了诸如空气污染和水质这样的问题。在先进的工业化社会中,环境议程很大程度上被人民及相关机构所设定,同时“南部”或“第三世界”问题仍然是

发展议程的主题。《1991年世界保护战略》(1991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的数据点明了人类这两大集团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Benton and Redclift, 1994:15)。数据显示,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或北方,消耗着80%的全世界生产的物质能源,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生活在南方的人,仅消耗20%的世界物质能源。从20世纪80年代起,围绕环境的辩论过程中,变得越发清晰的是,生态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灾难,使人们明白国家边界与生态现象是如何互相渗透的。如金瑞利与福尔克(Camilleri and Falk)认为:“关于被严密分割成各主权国家的世界的传统描述,碰到了作为一个更为致命的单一统一的整体出现的生物界”(1992:177)。由于“温室气体”排放³⁶进生物圈,“全球变暖”的危险加重了这种现象。正如地球两极的臭氧层破坏或变薄一样,这是一个被人类的经济行为打破天然平衡的自然过程。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峰会表明,某些政府对解决这些问题有承诺,但并没有真正的联合行动。现在所出现的情况是,对“地球太空船”(spaceship Earth)——这是整个人类共同的船——命运的更为焦虑的关注。然而,像恩岑斯伯格提醒我们的,地球太空船的理念倾向于忽视“桥梁和发动机室”二者之间的差异性(1974:15)。对于贫穷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把大部分环境问题看作是对他们社会经济利益事实上也是生存的一种直接威胁。

里约热内卢峰会把围绕着所谓的共同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利益冲突公开化了。因为这种峰会未能以任何方式对资本主义市场的神圣原则进行质疑,所以它不可能真正解决关于环境与发展的潜在的连锁问题。



尼古拉斯·希尔德亚德(Nicholas Hildyard)解释说,他们的目标是“生物多样性公约而非自由贸易公约,森林而非农业问题公约,气候而非汽车工业公约”(1993: 22—23)。因而,尽管富裕国家达到了自己的大量目标,但贫穷国家却很难实现它们的诉求。正如在里约热内卢峰会所讨论的,“环境管理”没有得到与对环境恶化的同等强烈的关注。并不用花费多长时间去消除共同关注的神秘雄辩言辞,因为已经十分清楚的是:强大和富有的国家将不断以他们管理全球经济的相同方式去“管理”环境。我们需要详细考察是,随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政治上是否更有活力与更切实可行。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已经被称之为“发展的公理”(development truism)(Redclift, 1987: 3)和一面“便利的旗子”(flag of convenience)(Adams, 1993: 218)。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流动的、易变的概念和一个我们能够根据语境的不同而赋予不同含意的话语。关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一个基本文件是《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 Brundtland, 1987),它所效法的是一系列有影响的带有多边主义北—南策略的(multilateralist North-South approach)《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s)。通过应用全球化的凯恩斯主义,这种策略诉诸看来比较开明的利己的“北方”政治家们允许“南方”
37 某种程度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在挪威首相协调这一问题之后,该文也被称为《勃兰特报告》)试图把可持续发展的议题放回到国际发展战略的环境中加以考量。它承认了环境与贫穷之间的联系,贫穷被视为“一个全球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与结果”(同上: 9)。它视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满足“基本需求”和被技术与社会组织所确立的环境限制(en-

vironmental limits)观念的基础之上。《我们共同的未来》要求一种走向综合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增长的新形式,这种综合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其效果上将更为公正”(同上:52)。

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概念稳固地建立在发展的现代化方法之上。其愿景明确地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更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更大的技术转移……和显著的大量资本流动”(Brundtland, 1987: 89)。在这一议程中,几乎没有把《我们共同的未来》与国际上占优势地位和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区别开来。至于“可持续性”的构成部分,似乎只是一种虔诚的愿望而已。这个报告(缺乏相应的基础和证据)主张,有可能“在尊重环境限制的同时,国际经济的增长必然会促进世界的发展”(同上:89)。伴随着第三世界统治阶级急切的发展需要,似乎“可持续发展”已经在北方引发了确定的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可持续性”概念根本没有以一种严格的方式来解决。经济行为如何能够以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不可再生资源问题的认识和这种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的方式来实施,解决得仍然不是十分充分。

新生态管理方法已经模糊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把它重新归入了现代化理论的正统观点之中。像沃尔夫冈·萨克斯(Wolfgang Sachs)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借助于吸收其进入‘发展’的空壳(empty shell)之中来削弱环境的挑战”(1993: 9)。这是一个完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策略,它最终忽视了当前生态平衡所遭受的威胁,延续了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方式。世界的贫困作为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进入到了全球阶段(global stage),贫困国家已经被置于“拯救星球”(save the planet)的框架之中。环境的全球管理总是以一种排斥贫困的方式来进行。全



38 球(全局)的资本控制,需要在其运作中消除所有地方的、国家(民族)的和国际的限制。实际上,全球环境问题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概念。像希瓦指出的,这个概念之“建构方式隐瞒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地方的全球化要为环境的破坏负责,这种环境滋养着被征服的当地的民族”(1993: 151)。尽管北方在“地球太空船”的整个范围内建构了它的领域,但南方民族还生活在经济萧条、贫瘠和环境恶化的地方。

在发展其他的“全球社会学”学说的过程中,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主张:“假设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与全球生存的矛盾,看起来……有初步的合理性”(1994: 220)。在这个推测中,我们能够把“可持续发展”运动看作是旨在革新一种反对文化生存主义观念的发展观念。现在将有许多人会认为,地球不能够“负担”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跨国商业阶级中“绿色”的阶层(例如:世界工业环境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s World Industry Council for the Environment])也对相同的压力和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的环境意识作出了反应。无论可能与否,如果跨国资本家要解决发展与生存之间的矛盾,他们必须有所行动。考虑到这些需要,非常可能的是,像其他国家将承担“旅游天堂”的作用一样,第三世界国家将继续扮演“污染避难所”的角色,扮演着西方国家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垃圾堆积场的角色。对于全球生态来说,这很可能会被列为一种“再循环”(recycling)。

毫无疑问的情况是,如今生态已经变成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争论中心。如阿兰·利比兹(Alain Lipietz)指出:“生态,以前处在经济的‘外围’,今天已经成为问题的核心所在”(1992: 55)。福特主义是一种

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其在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大行其道。我们现在正处于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旧的做事方式不再切实可行。福特主义建立在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基础之上。它是量的哲学而不是质的哲学。对于一种生态危机的知觉,无论我们是否关心去界定它,它都挑战着在有条不紊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中生产与消费的本质主义的逻辑。在全球化时代,生态是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有部分互联性的清晰的例子。无论什么发展模式替代现已死亡的福特生产主义模式,它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当然,这种发展模式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社会的和生态的模式。

近来,也有一些链接生态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尝试。当然,许多生态主义者应当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所阐述的其他启蒙意识形态打开大门。在唯物主义的生产主义的批判和主观知识的赞颂中存在着共同点。然而,阿伦·盖勒(Arran Gare)以一种少许不同的方式主张:“后现代主义是‘以生态为中心’。它与赞赏非西方社会和文化,赞赏少数派先前被压制的观念……和赞赏非人的生命形式相联系”(1995: 87)。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已经更进一步,支持尼采在反自然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思想的批判。后现代主义会把进步的自然人性化观念看作另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形式。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现代/现代主义文化破碎的时代。后现代主义至少潜在地打开了一个辩论的区域,一种新的、更为民主的世界秩序将会在这一区域内成形。如同后福特主义一样,这个新的世界将必须在所有层面上达成一个生态上的平衡分配体制。

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在生态的竞技场上,马克思的现代追随者们试



图将后现代主义置于困境之中。因此,在一个关于英国生态政治学的非常有价值的评论中,大卫·佩珀考察了他认为正在发生的问题,因为,“至少,不像多数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生态主义经常向后现代主义暗送秋波”(1993: 57)。后现代生态主义遭到文化相对主义的批判,它贬低普遍道德标准的观念,并把消费者视为政治行为的核心。因为反对这种只能导致“自然神秘主义”的“政治的折衷派”,后现代生态主义者应该“像社会主义者的做法一样”,承认“在已经完全控制了我们对自然的关系的意义上,解放应该是一种我们人类‘统治’自然其余部分的一种状态”(同上: 57)。我只能说,在这类还原论与专横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将不能形成一种进步的生态立场。然而,本章已经揭示了存在着许多像生态女权主义一样的进步潮流,这些潮流已经拒绝简单地重申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至上的主题。

第三章 苏维埃加电气化：马克思主义与发展 40

发展经常被视为人类生存状况的整体需要。像其他大多数思想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正视发展问题。实际上，不管是资本主义形态还是社会主义形态的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事业的核心。本章批判性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与发展的话语之间的某些主要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本人的发展观也是不甚明晰的，例如，他早期对进步问题的相当机械或直线发展的观点与更加细致的关于俄国的著作相比，观点差异就很大。列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新趋向，这一新趋向在很多方面成为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种关于发展的意识形态。接下来的部分来探讨社会主义与落后（不发达）这一非常关键的问题，事实上大多数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主导的国家。最后，本章转向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后马克思主义以更为批判性的态度来理解发展问题，实际上把它作为一种虚假之人的善拒斥掉了。



马克思与发展

对马克思而言,发展与资本主义几乎是同义语。马克思对于发展的愿景也都集中于现代性的时代。生产正变得日益国际化,资本也日益集中起来。资本主义正以更加疯狂的速度前进,发展在全球扩散。这个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主义”(Manifesto Marxism)的远见是非常正确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⁴¹ (Marx, 1973:71)^①。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些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同上:70)^②。这种令人兴奋的现代化的过山车是马克思的发展概念的本质。随着资产阶级时代登上历史舞台,它将扫除所有旧秩序并以它自己的设想来改变一切。发达国家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欠发达国家能够瞥见自己的未来。

对于《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资本主义时代是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之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② 同上书,第274页。

大”(Marx, 1973:72)①。自然界受人类支配,化学应用于工业和农业,铁路和电报使通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资本主义发展的永不满足的推动力扫清了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市场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侵蚀其他所有关系,生产力突飞猛进。《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现代主义的演说,正如马歇尔·伯曼雄辩地提醒我们:

来自它对增长和进步所施加的无情的和贪得无厌的压力;它扩展了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使之超越了地区、民族和道德的界限;它要求人们不但利用他们的同胞,还利用他们自己;在世界市场的动荡中它所有的价值观变得无恒常性和无限多样,它无情地毁掉了一切它所不能利用的人与物……以及它利用危机和混乱作为谋求更大发展,以及在自我毁灭时满足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的跳板。(Berman, 1983:121)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止于他对资产阶级及其对人类社会革命性发展作用的赞扬。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也创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随着资产阶级——也就是资本——的发展,劳动者阶级也一同发展起来,这些劳动者把他们的劳动作为商品,出卖给这一贪婪的新的生产方式。使社会发生革命性变革的这一过程同时也创造了革命的阶级,这个革命阶级将推翻新的秩序。在这样的视角下,资本主义将被它自身炽热能量的产物所吞噬。当代无资

42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本的社会发展可以说辩证地产生了它自身优越性的基础。从纵向来看,这个有机的过程是分散的工人最初联合成工会,后来联合成工人政党。像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一样,资本主义也将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高潮部分所写的一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Marx, 1973: 87)①。这是一个宣言,但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展翅飞翔。

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含糊的观点,体现在他(公认的新闻报道性的)关于印度的著述中。在这些著名的段落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在殖民地所扮演的进步角色表示赞赏:“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Avineri [ed], 1969: 137)②。现代工业和铁路系统将瓦解旧的劳动分工,打破印度乡村的“惰性”,把这个国家拖入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洪流之中。当然,“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Avineri [ed.], 1969: 137)③。尽管那些段落可以作为西方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② 同上书,第 768 页。

③ 同上书,第 771—772 页。

对东方摆脱愚昧野蛮状态而达到文明开化结果的一种支持来解读,但事实上,马克思关于印度的描述,尽管有些片面、过时并缺乏足够根据,但其与《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是相符合的。资本主义是革命性的力量,但它也是其自身最终衰落的原因。

马克思开始转变其先前关于发展的机械论/现代主义的观点,是与俄国有关联的。1881年,马克思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起草了一封给查苏利奇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性质的回信。马克思自从1861年——即“农奴解放”的那年——起就一直研究俄国。问题在于,公社是俄国社会一切都太陈旧的征兆,抑或是一个进步的“共产主义”未来的前兆?马克思对这种争论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他预见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渗透并摧毁公社。第二种可能性则是公社将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Shanin [ed.], 1983:124)。伴随着“俄国革命”的爆发,公社将成为寻求一种新形式社会组织的跳板,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将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莫斯科档案保管员们在1917年革命后发现了马克思的这些信件,他们被信件的非传统性所震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信件中发现的“民粹主义偏差”(populist deviation),被归因于马克思的衰老(当时他63岁),或者按照另一种说法,是由于他的这样一种策略性愿望,即不要过多地打击当时的俄国革命家。 43

马克思探索俄国革命之前事物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建立在俄国情形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即把他在《资本论》中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分析变成一种历史必然性的框架。这对任何发展理论而言都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从表面上看,这与他早先发表的



“关于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发达国家的发展来洞见自己的未来”的观点相矛盾。从马克思给其另一个俄国追随者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马克思后来所主张的是，“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引自 Shanin [ed], 1983:59）^①。这里否定了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任何决定论的、总括的运用。事实上，马克思以非常“现代”的术语描述发展的综合与不平衡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版的前言中，预见到了俄国革命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因此两者将“彼此相辅相成”。

众所周知，马克思从来没有创造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理论本身。然而，他的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理论，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共产党宣言》已经就资产阶级的任务进行了雄辩的说明：“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Marx, 1973:71）^②。马克思知道，在旧社会结构的瓦解过程中，什么将能够取代旧社会结构，取决于旧生产方式自身的特点。为此目的，他创造了一种粗略的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古典时代的奴隶制社会，以农奴制为特征的封建社会以及在某些论述中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3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6 页。

说的一种“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参见 Bailey and Llobera [eds], 1981)。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讲,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所有生产方式都仅仅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史前史的一部分。关于生产方式争论的结构主义死胡同是目的论的(即使不能说是神学的)马克思主义诸多没有成效的分支之一。

马克思对今天我们所指称的第三世界并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观点。他的确意识到了殖民掠夺在推动工业革命车轮中所起到的作用,然而,在分析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时,马克思不容置疑地将内部因素置于首要地位。投入到帝国主义和依附问题讨论中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这个次序颠倒了过来,把外部因素视为解释“为何资本主义出现于世界的这部分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原因。安东尼·布鲁尔(Anthony Brewer)正确地指出:“强调外部因素与这种资本主义的图景是相一致的。在此图景中,世界范围内中心—边缘的划分是一种定义性特征,但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在马克思那里却是没有的”(1980:44)。当然,例如在他关于爱尔兰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意识到了殖民主义对发展所产生的引人注目的影响。不过,他的理论著述而非新闻报道的要点,是关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内部发展以及它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整个世界的欲望。

在发展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留给了我们一笔充满歧义的遗产。他可能会同意杰弗里·凯伊(Geffrey kay)所持的异端说法:“资本主义创造了不发展(落后),并非因为它剥削了不发达世界,而是因为它剥削得还不够”(Kay, 1975: x)。这种观点与绝大多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发达和不发达的理论是完全相悖的。当然,像马克思从印度和爱



尔兰了解到的一样,这不是一种资本主义和谐发展的观点,并且它不排斥对于剥削的强调。马克思并未建议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能等到资本主义发展能使他们的国家足够“成熟”才去发动革命。马克思主张的关键在于:随着以前各种形式的资本(如商人资本)的破坏和掠夺,工业资本也在破坏掉旧生产方式的同时,自身发生了改变。简略地扫视今天的印度或巴西,可能会发现对马克思所持的关于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的支持。民族中心主义的/西方主义的/现代主义的盛行或加⁴⁵强,或许不应该损害这个关于马克思最初研究和预言的根本确证。

至于恩格斯,我们发现他对“发展”问题明确得多,他主张一个更为坚定的直线性的“现代化”概念。马克思拒绝尝试使他的资本主义理论成为历史“进行时”的概括,而恩格斯却的确在朝向这一方面努力。在恩格斯 1875 年的文章《俄国社会关系》中清晰地表述了他的进化思想。他总结道:“只有在生产力确实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增加足够的产量来消除阶级分化,以实现真正的进步,而且在这种社会生产方式下,不产生停滞或衰退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生存”(引自 Bideleux, 1985: 23)。到 1892 年,恩格斯更为坚定地坚持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性,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俄国追随者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资本主义展示了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看看它在西方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没有对历史进步的补偿,就没有巨大的历史罪恶”(同上:27)。恩格斯以这种方式使机械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成为法典,它极大地使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机械进步成为宿命,使相伴而来的“社会副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变得顽固。

列宁主义与发展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的历史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列宁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俄国公社问题时,他隐晦地反对马克思关于该问题的观点。列宁对俄国农民阶级的看法是极其消极的,强调的是农民的个人主义性质。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基于一种纯粹虚构的观点,即农民经济是一种特殊的集体制度”,幼稚地相信农民的“共产主义的本能”(引自:Bideleux, 1985: 71)。列宁提出“民粹主义”标签来批评那些试图以某种方式经由公社来绕开资本主义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列宁追随着恩格斯而非马克思的脚步,认为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无论它多么弱小)才可以发动革命:“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水平,产生大规模的机器工业,才能创造出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开启朝向‘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政治斗争”(引自同上:73)。这里我们看到的46的是一个相当直线且机械的发展概念。对农民公社的消极观点的确是有争议的,在政治方面,这解释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在农民阶级中普遍缺乏支持的原因。

列宁在其世纪之交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Lenin, 1967)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许多人认为这是关于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产生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之一。在该书中,列宁的主题似乎是从技术角度探讨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如何形成的。他的任务是证明商品经济是如何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得以建立的,以及资本主义是如何支配劳动分工的。与“民粹主义者”的消费不足的观点相反,列宁令人信服地指出,



资本主义在俄国为自己创造了国内市场。列宁的资本主义发展概念是围绕社会差别展开的，他对农村人口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应当指出的是，他明显夸大了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的作用，把“马克思明确描述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当作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Harding, 1977: 87）。列宁承认，他早期的著述“高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发展程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列宁早期的发展概念完全专注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内部发展。

列宁或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更负盛名。依据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有积极作用的观点以及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自己的分析，帝国主义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详细建构的理论中是一道分水岭。正像比尔·华伦（Bill Warren）所阐释的，以下表述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夸张：“通过有效地颠覆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帝国主义扩张特征的观点，列宁推动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过程，它消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的任何痕迹：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里，资本主义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工具”（1980: 48）。从此时开始，马克思主义传统开始将世界体系视为是中心-边缘的结构，并将帝国主义视为发展的障碍。当然，很容易理解，决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贫穷和受压迫的人们中获取支持的政治行动，将会发现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很困难的，比如在印度即是如此。尽管马克思从未忽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消极影响，但他不容置疑地强调了它对生产力的积极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期望和不确定的时期，高尚的、超然的观察似乎是不合时宜的。

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不是也不打算成为主要的或者创新的

研究。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人的著作,比如马克思主义者布哈林(Bakharin)及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Hobson)。其概述了他所观察到的那段时期内某些关键趋势,例如资本集中,资本向“不发达”国家的输出以及金融资本(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混合物)的支配地位。列宁的政治目标是反击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这种理论意指列强相当平稳和平地瓜分世界。相反,列宁试图指明,日益增强的世界范围的竞争意味着导致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列宁并非真正关心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在殖民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他确实承认:“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Lenin, 1970: 718)^①。然而,列宁也转向了他曾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批判过的消费不足的观点。尤其是,他认为帝国主义将成为发展的羁绊或制动器,“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同上: 745)^②。这种观点使他成了新马克思主义不发达学派(巴兰[Baran]、法兰克[Frank]等等)的先驱。

逐渐地,这后一种趋势,把帝国主义及垄断资本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最高或最后阶段,占据了上风。不但如此,帝国主义正成为发展的主要障碍的观点也颇为盛行。到1928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时候,所有分歧都消失了。在这次会议上,一项关键决议说到:“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时代……资本主义体系整体上正在接近它最后的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

② 同上书,第661页。



崩溃”(引自 Claudin, 1975:600)。这是一般性的诊断,不过——尤其涉及到殖民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现在开始将它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结合放在了首要地位之上。正是这个政治权威,解释了决议明确无歧义地把帝国主义描述为经济上的倒退,并指出外国资本投资不仅是对民族尊严的冒犯,更是一种民族资源的单纯流失。自此以后,发展与民族发展是同义的。某种程度上资本具有了政治色彩,以至于同样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民族资本主义控制下被看作是健康的,而在国际或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被看作是剥削的。后来的“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学派(Frank)在此有其思想和政治根源。

在俄国自己内部,随着 1917 年革命胜利以及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人们开始认真地争论替代性的经济发展策略。这种争论也是去发现谁、什么政策将会在列宁于 1924 年逝世后获胜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争论的焦点从计划的技术方面延伸至工业与农业二者谁居优先地位这类中观问题,以及“一国社会主义”能否根本实现这一大的政治问题。随着国家从内战的毁坏中复苏,在苏维埃 20 世纪 20 年代的争论中,许多有关过去 50 年来发展经济的核心问题首先提了出来。对于摩西·莱文(Moshe Lewin)来说,这些争论本质上是支持或反对新发展模式确立的斗争:“由一个单一国家政党掌握的完全或几乎完全的国有化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使整个制度变成了一种政党国家”(1975:xiv)。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实验室:测试自己的发展方法,处置落后的现实,并调整其理论宗旨以适应他们现在管理的真实世界。

尼古拉·布哈林是一个被忽视了的人物,他在这些论争期间形成了一个条理明晰的渐进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见 Cohen, 1980)。布哈

林比列宁对农民持有一种更为积极的(或中立的)观点,并以一种更为长远的方式构想了1921年的调和的新经济纲领(New Economic Programme)。布哈林认为需要一种有机发展的模式和政治上的稳定。正如罗伯特·比德勒克斯(Robert Bideleux)概括的,这需要:“通过对城乡提供积极的经济刺激……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推动平衡的、互相促进的、大体上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1985: 84)。如果这是右派的立场,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vgeny Preobrazhensky, 1979)也条理清晰地论证了左派的立场。在他的设想中,新苏维埃国家需要优先发展强大的国有工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最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简言之,即福特主义——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去融资,也包括对“个人资本收益”和农民经济的榨取。关于渐进主义的积累模式与强制的工业化之间的争论,是一种关于谁来支配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支配(即使以不同的形式)发展的争论。

当然,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中,最有名的争论是在“一 49
国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one country)和“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两种不同主张之间展开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大问题掩盖了一些列宁死后两位领导人之间更为具体的争论。托洛茨基和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v)(以“康德拉季耶夫波”[Kondratiev waves]^①闻名)主张一种最小成本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以新苏维

① 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必然经历繁荣和衰退相循环的周期。这种周期循环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西方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实。这种经济(或商业)周期循环称之为“康德拉季耶夫波”。——译者



埃国家不断增长的国际之间的一体化、强有力的工业计划和一种平衡的城乡交换为基础。这是一种乐观的、现代主义的发展模式。相反，斯大林则主张自给自足，因为他开启了一种看起来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主义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他主张大规模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建立在持续不断的不利于农民的贸易条件上。一系列“紧急措施”打击了农民，后来一种完全的恐怖留给了大约 500 万农民，他们或者失去土地，或者被囚禁在劳动集中营里。斯大林统治之下的苏维埃的发展模式，不仅歪曲了马克思或列宁曾经倡导的发展事业，而且也远远超越了 20 世纪 20 年代左与右之间的争论——斯大林权威主义必然超越的方面。

随着苏联的巩固强大和斯大林主义对社会控制的加强，列宁主义很快转变为第三世界关于发展的真正的意识形态。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东方变成了农民动员的意识形态，之后在南方变成了现代化的精英的意识形态。大卫·莱因(David Lane)坦率地指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准则”(1974: 31)。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判断是片面的，但它确实抓住了某种列宁主义国家形式的轨迹。官僚-权威主义的苏维埃国家中净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作为那个时代新工业化国家(NIC)的合法面具。这种列宁主义与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接近。不出所料，斯大林清楚地论述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使大规模的工业主要是重工业发展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它成为基于先进机器技术的整个国家经济重组

的关键，它保证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了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时国家技术和经济的独立性和防御能力。（Stalin, 1973: 351）

不管这个论述在发展理论方面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它确实与《共产党宣言》相去甚远了。 50

当然，随着列宁在1920年给共产主义所下的著名定义——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他自己就开创了这种生产主义的-经济主义的-发展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但是，毋庸置疑，这是列宁主义作为发展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十分典型的表述。我们在这里并不关注谴责它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工业化，我们关注的仅是列宁主义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更为现代的发展理论——从现代化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激进的依附理论——之间的桥梁。对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一整个历史阶段来说，在第三世界国家范围内，虽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要求成为社会主义，但苏维埃的发展模式成了支配性的发展模式。苏维埃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创造了一个特别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理论，以此作为西方模式和马克思主义模式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而对第三世界实际情况来说，马克思主义模式被看作是一种乌托邦。在许多权威主义或民粹主义的第三世界工业化体制的合法化过程中，这种特殊的“列宁主义”的混合物有助于稳定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统治，并且使帝国主义颠覆了一些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殖民主义的许多特征。



社会主义与不发达

时至今日,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即尽管马克思主义预计社会主义将会在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和繁荣,但多数的社会主义革命却在相对或绝对不发达的条件下爆发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似乎与社会主义理论相矛盾。从一个层面看,这个事实是不可争辩的,它解释了为什么在世界的许多地区,社会主义与发展或者可以说是同义的。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在不发达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也许会把社会主义当作潜在的解放,这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论中提出了这种观点,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在它“最薄弱的环节”上断裂。这指向了一种对革命的现实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不受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目的论的束缚。根据这种解释,一系列政治、战略与意识形态因素,可以为革命创造一个“成熟”的环境。这并不是说,只有等待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成熟”的程度。

51

无论这是一个悖论,抑或一个不均衡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伴生物,社会主义制度几乎总是继承了不发达的遗产。这对羽翼未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约束性是强大的。它不但必须去寻求一种更为平均的收入分配方式,而且也需要去创造一种经济发展上的更大进步。斯大林的“伟人症”(gigantomania)不仅仅是他狂热想象力和强烈权力欲的产物。这些国家将更有可能被内部或外部战争所毁坏。这些国家里可能会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工业基础和一个不发达的内部市场。可能拥有自然资源但并不能好好地直接利用。拥有人力资源,但整体上并没有被很好地培训和教育。这些加起来也几乎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充分

条件。毫不奇怪,保罗·巴兰(Paul Baran)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落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将成为落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大趋势”(1968: viii)。

生产力的不发达也意味着工人阶级的不强大,而工人阶级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纲领中改造世界的承担者。人们可以发现通常认为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比如在中国。通常,“工人的党”代表了实际参与革命斗争的工人的全体。关键的一点仍然是,很难想象社会主义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苦难的社会化常常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即使对非洲社会主义前景相对乐观的看法,就像门吉斯提比(Kidane Mengisteab)一样也承认:“然而,在这种条件下,尽管夺取政权可以是革命性的,但发展社会主义只能是进步性的”(Mengisteab, 1992: 86)。情况可能是这样:社会主义在不发达的条件下能够取得的最好成就是在稍微多一些民主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发展。然而,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主导的国际政治背景,甚至这种情况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不发达的遗产,还必须加上社会主义制度自从1917年起一直面对的怀有敌意的国际环境。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这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但紧接着一定会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犯。俄罗斯、古巴、越南和安哥拉就是例证。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民族自决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有了自己的位置。战争、抵制、外部侵略和封锁都是大多数成功革命所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因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由国际政治体系中的诸种主导条件“多元决定的”(over-determined)。这种局势只能使业已处于困境的内部民主的发展处境更难,



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了。民主转型与重建之间的内部动力平衡,不可避免地向后者倾斜。尽管在短时期内,革命后外部侵略虽然可能促使社会关系发生转变,但从长期来看,持续的外来侵略会对改革计划产生致命打击,或者使它走上专制的军国主义道路,就像在尼加拉瓜所发生的一样。

经济不发达和外来侵略这对孪生的限制因素促使许多胜利了的革命走向自力更生——即使不是自给自足的话。建立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基础之上的激进的依附理论,主张某种形式的从世界经济中的“脱钩”(de-linking),以作为对不发达的补救措施。民族解放,无论如何规定它的内涵,变成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制度的中心目标(见第七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并没有以马克思所理解的方式导向社会主义。无需考察缅甸或柬埔寨的经验,我们也能明白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自给自足的可怕代价。我们甚至可以质疑作为一种提升自力更生和民族独立手段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最终结果。比德勒克斯用一种沉重但归根结底是现实主义的语调评论道:

实际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苏联资助的燃料、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援助和贷款;它们相对低劣的滞销产品越来越依赖于苏联市场的慈善的优惠政策;它们越来越依赖于西方的技术和资金。(1985: 152)

现在很明显的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多的是存在于“必然王国”而非承诺的“自由王国”。根据本章的主题,这意味着当社会主义确实

变成现实时,必须首先面对不发达的问题。正如肯恩·鲍斯特和菲尔·莱特(Ken Post and Phil Wright)指出的,所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是(或曾经是),它们的经济是“资源制约型经济”(resourceconstrained economies)。这种经济的根本特征“是持续的再生产短缺,或换句话说,持续生产不足,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形成鲜明对比”(1989: 72)。在这种局面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例如工业与农业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或者是军用与民用支出之间的分配冲突。社会主义国家缺乏足够的社会化资源,不能消除个体利益的不合理,也没有有待激活的良性循环。当然很容易看到,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趋势:所有新兴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充分融入世界市场,以避免它们面对的严重的资源制约。 53

我们发现,资源制约型经济很难逃脱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制约,很难启动被认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所必需的计划体制。这种计划体制的设想是,国家必须充分控制生产资料和分配,以便充当与市场规律相抗衡的力量。在实现对经济的社会控制中,中央计划被视为关键因素。在考虑到尼加拉瓜的情况时,菲茨杰拉德(E. V. K. Fitzgerald)甚至指出:“通过服从于中央计划来实现经济企业部分有效的社会化进步……这种进步比更大规模的、更发达的经济带来的进步更为迅速”(1986: 44)。这种思想是指:可以通过中央决策权力的经济计算,而不借助于市场内部力量来确定价格。实际上,这种模式并不成功,并且国际资本主义市场证实,任何国家控制经济杠杆力量的尝试是完全具有腐蚀性的。这种中央计划被证明是一种像自力更生一样的幻想。后革命国家与经济“美元化”(dollarization)的分裂,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怀有



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强加的必然结果。

经济改革面临着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引发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在本质上是不能实现其预定目标的。就像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解释的：“斯大林主义的经典社会主义是专制的、低效的，但它构成了一个连贯的体系。当它开始改革自己的时候，其连贯性在减弱，而内在矛盾在增强”(1992: xxv)。根据科尔奈以大量经验和详细历史资料所支持的这一论点，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内在地进行自我更新，所以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鉴于资本主义几乎有无限能力来自我改革和转型，它甚至(尤其是)有借助于危机来自我更新的本领，这无疑是他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优越性”所在。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20年前看起来饶有趣味，但现在看起来却十分古怪了。自从1989年以来，在俄国发生的革命性变革仅仅是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即零碎的变化和改革的修补是如何没能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从长远上变得切实可行。

54 社会主义的资产负债表与不发达或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资产负债表，不可避免地混为一体。艾德里安·莱夫特韦治(Adrian Leftwitch)认为，在中国、古巴和朝鲜等已经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在革命前存在的最严重的压迫、不平等、疾病和贫困已经被消除了；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步；社会人口平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有了明显改善，开始接近工业化社会的基本水平”(1992: 38)。像安哥拉、莫桑比克、也门和阿富汗等诸多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传统社会发展指标方面，做得并不好。人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质问，例如古巴，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现，是否真正可以比在依赖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做得更好。举例来说，处在革命前夕的古巴，不仅在人均

收入方面,而且根据健康指数,都可列入拉丁美洲富足国家之列。当然,这种反事实比较类型的有效性是存在局限性的,但确实古巴没有提供一种依附理论原本所希望的可替代性的发展模式。

社会主义曾经一度被看成“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好方式。在1936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①对许多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领袖发言时宣称:“消除贫困、解决大批失业人口和印度人民的退化与臣属问题,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之外,我认为别无他途。”在若干年后,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仍然能够略带自信地谈论“赶超”西方,因为苏联已经实现了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和利用联合收割机来收获庄稼。然而,在尼赫鲁不顾一切转变其信仰的50年后,已经非常明显的是,“社会主义发展”只是苍白地模仿了它的资本主义前辈,而且自身沾染了不良的特征和低效。戈登·怀特(Gordon White)的言论几乎没有正当的理由。在1989年巨大的反社会主义的大众反叛之前,几乎还不到五年,怀特还认为:对那些拥有合理资源基础和“一位坚定的领导和一种相对单一的人口”的中等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苏联模式作为一种战略选择是不能打折扣的”(White, 1983: 13)。北朝鲜很难成为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力例证。

后马克思主义与发展

如果到现在我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对“发展”概念本身想当然的

^①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译者



55 话,那么现在我们必须追索其含意。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一个所谓的批判视角来假定,发展是一种共同的人类之善。最近对发展话语解构的尝试有助于突出的决不是其良性作用。古斯塔夫·埃斯特瓦(Gustavo Esteva)指出了—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尽管“发展占据着一个极为强大的语义群的中心……但同时,极少的词能像‘发展’一样软弱、脆弱和缺乏把内容和意义赋予思想与行为的能力”(1992: 8)。发展表现为一种自明之理,其开放式意义致使其几乎是无意义的。然而它概念上的膨胀已经导致其掌控了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应对策略。发展似乎是西方道路的一个隐喻;这个词代表了以自己的形象建构的一个世界。所有的政治趋势都同意,发展决非一个有益的、健康的目标。在福柯思想的意义上,发展已经开始表现为一种规训机制(disciplinary mechanism)。

福柯已经对西方社会中权力与知识的动力学提供了某些根本的洞见。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能把发展想象为现代主义的规训与正常化机制对非西方世界的延伸。一个话语场域已经在发展的保护伞下建立起来,这个保护伞已经限定哪些问题可以去质询而哪些不能。发展是运用权力/知识解决“不发达”问题,这与用精神病学治疗“疯癫”相类似。在这一点上,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已经强有力地指出:“发展不但大大有助于维持统治和经济剥削,而且如果‘第三世界’国家想要追求一种不同的发展类型,那么这一话语体系本身也必须被拆分”(Escobar, 1984/5: 378)。从这种观点来看,可以说,谈论“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或“内生发展”来限定发展就变得毫无意义。虽然发展仿佛是一种进步,但对发展的这些限定看起来只是阻止挑战西

方统治地位与联合抵制的一种方式。

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超越了这种类型的批判。毕竟,马克思主义很难与作为发展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等同。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现代主义范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则是现代主义范式的缩影。实际上,可以把发展视为整个马克思思想的中轴线。作为一种精神展开的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与达尔文的进化观念,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念中融合并交织在一起。正如在上文所见,马克思主义流露出对历史的向前发展和发展的不可阻挡的进步的信任。人类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阶段——一系列的生产方式——充满了发展的现代主义观念。因此,从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我们需要与这种观念确立临界距离。马克思主义在其各种理论与政治的展现中,不管包含了什么矛盾,它都明显地充满了启蒙的精神与发展的观念。说明这一论点的方式,就是将借助于一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和依附理论的详细讨论来实现。

这里不是探讨依附概念谱系的地方(参见 Kay, 1989)。重点在于依附学说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它是作为一种所谓对正统的、保守的现代化理论的彻底批判而出现的。它的全部宗旨就是推翻主流话语的论点。现代化理论看到的是进步遍布于全球,而依附学说则仅仅看到“不发达地区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一些人认为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是发展的唯一途径,而其他人则认为与世界经济脱钩才是发展的关键。一些人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将平稳地通向民主,而另一些人则仅看到资本主义不可阻挡地走向独裁或法西斯主义。30年后,现代化似乎已经很容易地在观念之战中获胜。“在发



展中改革”这种说法,现在已经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理论有着同样的含义,这里曾一度魔术般地出现了农业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这些影像。依附学说甚至已经被它以前的创造者所否定了,他们认为它幼稚、过于简单,并最终会误入歧途。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下,为什么依附学说激进的承诺会失败得如此惨烈呢?

基本上,我们必须指出,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有着同样的论域。就这点而言,参考德里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概念是十分有益的。这种理论是指:当在处理比如男人/女人、西方/非西方、现代/传统等等此类对立事物的时候,存在一种等级化的西方倾向。正如凯特·曼佐(Kate Manzo)所主张的,在批判性地理解发展理论方面,这个概念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证明甚至最为激进的批判话语是如何轻易地滑入了恰恰是它寻求的质疑的形式、逻辑以及隐含的假设之中”(1991: 8)。因此,依附理论认可了主流发展理论的多数假设,仅仅是寻求实现其目标的不同方式。制造一种较小理论的镜像仍然需要对之有崇敬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形态中,依附理论几乎不能走出发展的意义的范围。依附理论对发展主义的挑战至多能够被视为仅仅部分地反现代主义,而决不是积极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

如果在一个层面来看,现代化和依附理论仅仅是彼此的镜像,那么是什么打破了二者在发展理论上的僵局呢?从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女权主义和生态学看起来都是颇具吸引力的供选方案。发展理论“性别”(engendering)研究的各种尝试,如女性与发展(发展中的女性)、性别与发展等等,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一研究领域。然而,在理论上,像本质论这种对发展理论的批判,同样也能够被应用于女权主义,

至少在后结构女权主义出现之前是如此。至于生态学,我们现在看到了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激进的/改革主义的正统观念,这个观念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都为这些观点灌输了“母性与苹果馅饼”(motherhood and apple pie)的温暖光芒。像第二章指出的那样,现在也有一种混合的形式,把两种话语以“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的形式合二为一。尽管这些新的批判性学说已经占据了发展实践的边缘区域,但技术统治论的/西方中心论的/进化论的现代化理论观点所控制的主流仍然继续,现代化理论甚至仍然在一些以前的依附理论家统治之下。

后现代主义也将把自己视为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无结果的相反立场(观点)的决裂,把这二者视为一种不足信的现代主义范式或“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从这种观点来看,发展理论遵循着传统现代主义的程序:“一种在地点和主题二者之间等级化的倾向,一种对起源的怀念以及一种趋向基础主义的哲学素质——这种素质提供了一种独立于解释的、规范的或优势的立场”(Watts, 1995: 53)。比如,这种批判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定位依附理论——批判总是预设了一种假定的“非依附”的二元对立面,而这种对立面是一种完全神秘的起源状态。至于发展的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享有特权的优势立场,我们正是在这里准确地看到了发展主义的自负,它认为人类庄严的态度已经陷入泥沼之中了。激进的依附理论家也假定了一种全知全能的观点,假定为全体居民的所有阶层说话,并且提供了最不可能的拯救,也就是说古巴的状况,甚至在变成像一个社会主义的主题公园扩展到迈阿密迪士尼乐园一样的事物之前,它也不是一片乐土。



后殖民理论在不久前试图在发展问题上阐发一个新颖的途径。在其途径上它更多的是“第三世界主义”，这突出了第三世界国家殖民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在理论上它与后现代主义有关，但它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而现代主义在西方地域上几乎是排他性的。后殖民主义是对发展理论中欧洲中心论的普遍主义的批判，它否定了矛盾心态、相异性(alterity)和异质性以及对其他声音的压制。它批判了话语的均质化(discursive homogenization)，甚至像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非常明显的激进话语也逃脱了均质化的命运。在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 1988)的批判中，对西方女权主义来说，这种范畴是一种自恋的他者，是家长化统治(paternalizing)的一部分，是针对殖民地本土的殖民计划。后殖民主义比后现代主义更具政治性，尽管后殖民主义起源于文化研究，并且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后殖民主义把第三世界的声音带到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而不是去告诉那些没有享受(遭受)现代主义的人们一个后现代时代现在已经到来。

在发展问题上，试图发展一种新的后马克思主义综合体，可能徒劳无益。从女权主义、生态和其他“新的”社会运动中，我们能够吸取对主流观念的批判。从正在兴起的“反发展”(anti-development)学派(见Sachs [ed.], 1993)中，我们能够吸取对发展主义话语的严格解构和对其自信的毁灭。但这一学派的反现代主义几乎不能使我们“超越”现代主义或者甚至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谈论追求非物质价值与回避物质需求基本问题的“另一种”发展，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自负。后现代的航向是不同的，并且至少其已经有效实现了欧洲白种男人的去中心化

(decentring)。欧洲白种男人在殖民主义鼎盛时期,编造了发展来应用于世界的其余地区。针对进步的元叙事的怀疑主义新时代已经来到我们身边,我们更多地强调自我反思(self-reflexivity),并且我们比在发展理论鼎盛时期更加开放地对待差异性和地方性知识。

总之,记住发展与不发达问题仍旧伴随着我们可能是有益的,不管我们进行怎样的理论变换。当然,这解释了即使当有人在宣称“发展已经死亡”时,为什么一种“发展工业”仍会持续存在。关于这一点,阿图罗·埃斯柯瓦尔写道:“发展(作为话语)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形式,尽管它是围绕着一个虚构的构想(“不发达”)并且基于一定的物质性(即命名为“不发达”的某种生活条件)表达出来。我们必须寻求以不同种方式使之概念化”(1984: 389)。很久以前,冈德·弗兰克(Gunder Frank)指出,根本没有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这回事,只有未发展(*undevelopment*)。我们现在需要去做的,是超越这种区分,质询发展本身是否包含着一些积极的或进步的内涵。从一种具有马克思“精神”的批判视角来看,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破坏性社会影响的再包装或再命名的所有尝试,必定都是值得怀疑的。



第四章 掘墓人的局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

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事业的核心。存在着一个以无产阶级概念为中心建构起来的虚构的马克思主义神话。劳动者被看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中心，而工人阶级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本章首先检视马克思本人如何构想工人阶级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概念大厦中的角色；然后思考工人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毕竟，这是工人阶级首次有机会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去建构一个新社会；接下来论述各种各样随之而来的关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中的作用的讨论，比如新工人阶级的辩论。最后，本章转向一些重新思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观的后马克思主义主题，主张当前对新技术与全球化的关注与马克思自己更为积极的预见相衔接。

马克思的神话

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失去的只是锁链。这种劳动者阶级“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

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1973: 73)^①。无产阶级是被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并且被塞进了这个时代喧嚣的工业化城市之中。他们生存的条件导致他们不屈不挠地走向“联合”,继之而来的是罢工和起义。尽管他们一无所有——没有地位、没有财产——但他们也是作为反对其面对的具有特殊利益的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的一种新的普遍承担者。简而言之,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一定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普遍阶级。他们出现在新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缺陷或者矛盾的反映。这个新阶级,追溯其祖先的话,可以一直追溯到罗马的奴隶时代甚至更远时期,它在其本身的范畴内包含了一种新的合作式生产方式,这预示了一个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新型无阶级社会。

《共产党宣言》满怀感情地叙述了无产阶级的由来:“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Marx, 1973: 77)^②。无产者组织成为一个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同上: 76)^③。因此“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同上: 75)^④开始组织起来反对现行统治秩序。资本的扩张需要雇佣劳动者,而首先工人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② 同上书,第282页。

③ 同上书,第281页。

④ 同上书,第280页。



间的竞争阻止了他们的联合。逐渐地这种情况结束了,大工业促进了雇佣工人之间的联合。现代工业的发展播种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宣言》的著名段落写道:“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同上:79)①。

这种转变的政治代理人是一个政党,但是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党。对马克思来说:“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973:79)②。共产党人并不是给曾经只有黑暗之所带来光明的启蒙知识分子。它们[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同上:80)③。他们试图组织无产者形成一个阶级并推翻资产阶级的秩序。但是马克思不断重复说:“工人阶级的解放一定是工人阶级自身的行动。”当资本主义至高无上的权力被战胜,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民主斗争将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将运用阶级的力量去扫除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另一著名段落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87)④。

62 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下马克思认为的无产阶级构成成分问题。一方面,对于那些为了生存而努力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在马克思论述法国的著作中,他把那些在斗争中支持工业无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② 同上书,第285页。

③ 同上书,第285页。

④ 同上书,第294页。

级的诸如服装工人(garment workers)和建筑工人,归入了工厂中的工业工人阶级之中。然而,马克思给出了新的普遍救世主阶级,即他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在宣言中,马克思提到,“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Marx, 1973: 77)^①。在他后来的著作中,马克思继续去区分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并且不将非生产性劳动者看成是无产阶级的构成部分。这种区分后面还要提及,但这里的重点在于马克思开启了一个称之为阶级归属并作为预测阶级行为的“客观”标准的区分传统。

目前,科恩(G. A. Cohen)继续主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客观主义定义。例如,对他来说:“一个人的阶级仅仅是由他在所有制关系网中的所处的客观地位所建立的,不管清楚地分辨出这种地位是何等困难”(Cohen, 1978: 73)。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文化、政治和意识与阶级地位的定义无关。它是一种结构性的阶级概念,与汤普森(E. P. Thompson)的一个工人阶级的行动概念完全不同,这个阶级体现在自己的“形成”中(Thompson, 1970)。汤普森反对客观主义的和本质上经济主义的工人阶级定义,主张这并非马克思的本意;更确实地说,“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经历……感觉到并明确表达出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并且反对与他们的利益不同的人时,阶级就产生了”(同上: 9)。两种解释——一种是结构性的,一种是以行动为基础或经验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的——都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十分清晰的是，工人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多么重要。近年来，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在试图反驳所有卷入“放弃阶级”(the retreat from class)的那些人中，强有力地重新阐述了正统观念。对她来说：“工人阶级是潜在的革命阶级的命题不是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而是一个……唯物主义原则的延伸。这表明，考虑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生产与开发的中心性……其他一些命题也会随之出现”(1981: 14)。这些命题将包括了如下观点：在资本主义统
63 治之下，工人阶级遭受到了最为“直接的”压迫形式，并且它有最直接的“客观”利益和能力来推翻资本主义。处于资本主义机器核心的无产阶级是实现其解放转型的主要动力。关于这个愿景问题，将在本章后一节中来讨论。在这个部分，我们仅仅揭示在工人的中心性问题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什么。

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我们得到的主要是对工人阶级中心性的哲学解释或辩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自身的逻辑发展而被替代的图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似乎要求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交易的普遍化、商品生产的大众化和新的普遍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出现，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一样：

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

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1976a: 87)①

伴随无产阶级的出现,劳动分工同样达到了顶点;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共产主义是天生的。正如巴利巴尔所评述的:“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的论点……允许马克思从当前共产主义革命的危急中轻易地读出来”(1995: 40)。

在这个阶段上,审视马克思对一个实际的工人运动即英国宪章运动(Chartists)的分析,可能是有助益的。对马克思来说,这个充满生气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一定会产生一种有活力的、激进的工人运动。1838年《人民宪章》(the People's Charter)要求普遍的男性选举权和其他民主改革以及更短的工作时间。恩格斯甚至提议这个宪章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法律”,以此代替中产阶级的法律。如艾伦·吉尔伯特(Alan Gilbert)所说,对于马克思而言,宪章主义各个方面可浓缩为:“联合、形成一个激进政党,通过合法的规则和投票为缩短工作周而战,最终,社会主义革命——进入到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策略中”(1981: 53)。其他马克思主义解释也遵循这种类型的解释,包括汤普森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70)中的解释也是如此。尽管他的观点已经与简单的还原论决裂,但汤普森仍然假定了在宪章主义形成过程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很多当前宪章主义的研究者,如斯蒂曼·琼斯(Stedman Jones), 64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已经与这一马克思主义传统决裂了，并且帮助我们以一种新方式去认识工人阶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批判恩格斯等人，批判他们一方面考查不满的原因，例如失业和贫穷的原因；另一方面考查宪章派话语中阶级对抗的证据。琼斯认为，问题在于，“这两种类型的证据连接在一起的方式”（Stedman Jones, 1983: 19）。工人阶级的不满和宪章主义的政治运动两者之间的直观联系，不能以诸如“经验”或“意识”这样的简单术语为基础。琼斯以一种新颖的、但却有说服力的方式，反对传统观念，主张“不是意识（意识形态）产生了政治，而是政治产生了意识”（同上：19）。作为一个研究方案，这意味着对宪章主义语言给予新的强调，这种强调以一种非指涉的（non-referential）方式，“而不是设置特定命题与一个这些命题要表达的想象的经验事实直接相关”（同上：21）。

概括而言，马克思创造了一个真正的神话：无产阶级作为普遍历史主体和一种新型合作的最终是无阶级社会秩序的先驱。马克思热衷于描绘“蓝图”，但对细节论述不足。和马克思遗产中常有的情况一样，他在这个领域中是不明确的。尽管无疑地马克思倾向于决定论的、结构主义的和经济主义的思考工人阶级的方式，但他也强调工人的自主活动。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政治观中，既没有替代主义（substitutionism）的迹象，也没有宗派性。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创造力与自我组织能力的强调，鼓舞了劳动者积极分子 150 多年。然而，马克思更为教条的追随者，突出了他的学说的神学层面，并阻碍了对新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识。但是，马克思的苏联追随者在创造一种新的代理者——政党一方面走得最远，政党将替代大众的自主活动，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教士中真理与谬误的仲裁人。

列宁、苏维埃和工人

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早期俄国工人运动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正如常被提到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到达了俄国。⁶⁵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之下,如奥斯卡·安韦勒(Oskar Anweiler)描写的:“新生的俄国劳工运动被马克思主义知识阶层完全掌控,这赋予了无产阶级在它的拯救的革命计划中的救世主角色”(1974: 27—28)。因此,与预期相反,在俄国而非德国,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激发的工人运动在革命的动荡中起到了一种关键的作用。从1905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到1917年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运动都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俄国资本主义特别不均衡的发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这场革命成功地建立了著名的“工人阶级的国家”。但是,简言之,这场实验结束以来,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中劳动工人的命运是什么呢?

当1917年2月沙皇政府垮台之时,工厂中的工人开始采取行动。终结所有压迫的各种不切实际的、甚至是乌托邦的思想大行其道。无政府共产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话语与正统的孟什维克甚至布尔什维克更为古板的马克思主义展开积极的竞争。在初始的即使是半自发的趋向由工人控制的运动中,工厂委员会接手了许多车间的管理。经济混乱与计划破产起了推动作用,并加剧了劳动群体日益增长的激进化程度。尽管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他们包括国家全面控制生产在内的统一计划,但工厂中的工人们仍要求直接掌权与自我治理。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早期运动,这场运动可能没有致力于新的半民主民族国家的经济现实。然而,这的确迫使布尔什维克在关键性的几年里



勉强支持“工人阶级掌权”的口号。

苏联人重新结成了一个更广泛的、相互联系的阵线(特别是包括工人和士兵在内)管理新秩序。作为一种有活力的、半永久性的工人与士兵的联盟,彼得格勒苏维埃是这个领域的领头羊。在这一混乱联盟中的马克思主义参加者无疑被唤起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记忆。逐渐地,确立了秩序,委派了代表,委员会开始了日常工作。在几个月内,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拥有处理“紧急事件”政治决策权的小办事处(*small Bureau*)被建立起来。正如安韦勒指出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因此从一个临时革命机构转变成为一个组织完善的行政管理机器”(同上:108)。

66 无疑这是十分必要的,这不应该归因于官僚化的一些“铁律”,但是它的确导致了这个以及类似团体与工人群体的疏远。

苏维埃组织的混乱与工人的执政运动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范围内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列宁无可争议地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但在1917年他也没有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真正概念。尽管他热衷于在工人阶级中激发起草根(*grass-roots*)行动,但他在相当有限的方面设想自我管理。对列宁而言,社会主义将通过布尔什维克政党而非工人阶级控制生产资料来实现工人阶级统治国家。至1919年,处于成长阶段的工人掌权运动已经被一种中央集权的工业行政管理体制,一种无所不包的国有化(运动)果断地替代了。列宁在其1918年《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的呼吁证明了一种新情绪:“劳动时无条件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Lenin, 1970: 680)^①。计件工作,

^①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泰勒主义和根据结果付酬,是新苏维埃的方法。对列宁来说,任何对此的抵制,都只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的结果。

工会将是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到现实世界这一回归的天然受益者。到1919年,俄国工会事实上已经扩大了自身范围,与政府机构联合来管理工业。然而,如罗伯特·丹尼尔斯(Robert Daniels)所说的,“工会行政管理特权的反面,是他们维持劳动纪律和劳动生产率的职责,是防止而不是实施罢工的职责”(1969:120)。工人掌权的话语正让位于“效率”和泰勒主义劳动过程的话语。工会正在成为劳动群众中“工人阶级政党”的“传送带”。如果这个新的劳动纪律并不充足,那么托洛茨基认为在1920年提倡完全军事化的劳动是恰当的:

如果我们严肃地谈论计划经济——从中央获得统一目标,当劳动力依照经济计划配置……那么劳动群众就不能在全俄国随意游荡。他们必须被投放到这里或那里,被指派,或被命令,就像士兵一样。(引自 Daniels, 1969: 121)

在所有这些辩论过程中,这一史无前例的攻击主体,将可能成为新秩序的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正在破灭。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是1918年至1921年帝国主义干预,并伴随着布尔什维克与其敌人之间的灾难性内战。苏联工业工人的人数从1917年的300万,降低到1918年的250万,1920年的150万,最后到1921年的不足125万人(Furedi, 1986: 16)。工人阶级的社会分解过程是否迫使布尔什维克以自己的利益来行事,这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



即推动工人民主背后的社会力量正处于解体的严重危险之中。不断增长的失业与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正在损坏着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曾经充满活力的工人运动。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苏维埃工人们作为一个阶级以任何方式行动的能力、团结一致行动的能力,都被粉碎了。

关于 1917 年早熟的工人阶级国家的“衰退”,有许多故事。从本书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注意在这个被其领袖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国家中分配给工人的附属角色。被第二国际和(某种程度上)新兴的第三国际共有的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本质上是生产至上的。政治权力和合理计划的控制本身足够开创一片乐土。正如卡门·西里安尼(Carmen Sirianni)指出:“列宁把自我管理问题延迟至遥远的未来,也就是到全体人民接受了完整全面的教育以承担经济管理任务的时候(才能实现自我管理)”(1982: 260)。同时,马克思一本简略的进化论著作中论及:生产力的发展,将优先于生产关系的改造。列宁把车间设想成为一个物质生产的地点,而不是社会关系冲突的场所;而社会关系的改造处于马克思原初的改造蓝图的核心。

拟订一个粗略的俄国革命的反事实的蓝图,借此,所有的流血和冲突都可以在共产主义的和谐发展中避免,这不是一个问题。对史密斯(S. A. Smith)而言,布尔什维克在 1918 年正面临着一种“残酷的两难困境”:“他们决心要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但他们不得不优先考虑生产力的重建,特别是劳动纪律的复苏”(1983: 264)。我们可能质疑这种困境的必要性,但它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这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一党统治,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取代工人阶级自主活动却不仅仅只是一种困难而勉强的选择。即使接受一种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

劳动纪律和劳动强度在短期内是无法避免的,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 68
包括列宁,也几乎没有意识到从长期来看这与社会主义建设不相融。
接下来的问题是,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是否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

在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中,有各种各样反对的倾向,并伴随着不同程度的一致性。然而,左翼共产主义领导人奥辛斯基(Osinsky)能够在《共产党人》(*Kommunist*)杂志中提醒列宁马克思的被忘记了的原则:“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身的行为。”在一系列著名的文章中,奥辛斯基从一个明显事实开始即国有化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说出了一些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本应熟悉的逆耳忠言:没有民主,工人阶级掌权,结果可能仅仅是官僚集权;“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作组织或者由无产阶级自己建立,或者根本不要建立”(引自 Sirrianni, 1982: 149)。奥辛斯基明白,泰勒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缩影,将会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他明白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基础的安全,但他谴责列宁混淆了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列宁并没有真正回应这种详细的批判。

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在这一阶段,我们能够指出一种其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对工人阶级的自主活动持有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和安东尼奥·葛兰西把它称为“反对资本的革命”(Gramsci, 1977)。事实上,葛兰西借此意指,俄国民众已经进行了一场反抗对马克思《资本论》占统治地位的进化学理解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在一些欧洲国家涌现出一批工厂委员会,这导致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议会主义”(councilist)的观点。如卡门·西里安尼主张



的：“工厂委员会(Factory councils)将成为一种新意识建立的物质与组织基础，而且在无资产阶级的情况下，为工人管理社会做技术和精神上的准备”(1982: 338)。虽然这没有变成现实，但并未减少这种潜在共产主义传统的重要意义，甚至今天仍是如此。

工人阶级在哪里？

当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趋向衰落，并且习惯于一个冰冷的非资本主义——但也几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之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重新确认基本原则。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把这种无产阶级救世主义传播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包括几乎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地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体系中，类似信仰仍然存在，无产阶级仍然是关键角色。拯救之路仍然经过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正如在任何神学体系中，许多错综复杂和精心设计的尝试力图保持理论与现实的一致。关于“革命联盟”的性质与革命和后革命国家类型的新构想大量存在。激烈的争论、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实际的战斗，出现在所有这些神学的细微差别之中，直到1989年“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崩溃。

一个被认为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参与革命的程度。毕竟，如果其所谓的代理人，无产阶级，哪里都不能找到的话，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于是，詹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进行了一项关于20世纪主要革命的社会学调查，探寻其中工人阶级的构成并得出结论：“在所有的案例中，革命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因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深刻地影响了革命组织的思想与实践”(1978: 40)。从俄国，

到中国 and 越南,到古巴,佩特拉斯发现了无产阶级的代理人都忙于推翻这些革命历史研究的所有证据。当证据实在无可辩驳时,佩特拉斯转而说明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着”实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尽管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工人阶级的问题是“复杂而辩证的”(同上:57),但这个架构却站得住脚。

正统马克思主义机制得以保存,是因为其形成了关于工人阶级和革命的稍许神秘的观点。例如佩特拉斯主张,“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工人阶级在革命发展中的战略重要性,首先来自于它在本质上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更强大的能力”(1978:63)。然而,这种能力的源泉从未得到检验,更不用说被证实了。当工人阶级的自主活动甚至不能被最具同情心的观察者所察觉时,政党就被推动去“代表”无产阶级。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的趋向得到了充分展示:

导致革命变革的**系列事件肇始**于包括政党组织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形成阶段。**接下来**是阶级和政治斗争。在斗争中,革命力量积聚起来,革命政党扎根于群众之中,赢得群众的支持,**最后**,夺取了权力。(Petras, 1978: 37。着重点为引者加)

哦,生活是如此简单……

另一困扰西方马克思主义多年的争论是,到底谁真正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应该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式认可。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谁将确切地成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代理人,那么工人阶级的构成是至关重要的。为任何脱离真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阶级贴上



“小资产阶级”(petty bourgeois)这个标签,深刻表明了为无产阶级纯洁性而斗争的走向。我们将会接受其他非无产者为民主而斗争,但当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开始时,他们或许变成我们的敌人。工人阶级的界限不仅仅是一些深奥的社会学争论,也被视为革命计划完整性的关键。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有的一元的资本主义概念,恰恰与这种目的论的阶级观相匹配,即认为阶级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步的主体。

这个看似是奇异的,但却十分关键的辩论,出现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定义上,后者被视为超出了无产阶级的范围。在了解福柯之前,尼柯斯·普兰查斯建构了一个解释阶级的详细框架,并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纯粹是由生产和从属于体力劳动的工薪阶层构成的(Poulantzas, 1975)。生产性劳动者创造了剩余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者,例如国家工作人员、服务行业人员或行政管理人员,都由这种来源支付工资。尽管当娱乐业从业人员与学校教师被资本雇佣时,马克思自己已经把他们当作生产性的,但普兰查斯比马克思本人更为“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只有从事实物商品生产的那些人才能被看作是生产性的。撇开这种区分的强烈道德内涵不谈,我们一定会质疑这种辩论的整体性质会让人联想到多少个天使可以在一个针尖上跳舞。尽管这种争论在1968年后的时期内大行其道,但工人阶级本身似乎正在乎消失。

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告别工人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1983)是这方面标志性的事件。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工业社会学家,尤其是在法国,已经全神贯注于传统工人阶级的“稀释”(dilution)和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的出现。

高兹把这些理论性-政治性阐述带入了它们的逻辑结论中。对高兹来说,从1968年起越来越明显的“社会主义的危机”,只是马克思主义神话中“无产阶级的危机”的一种反映。他认为:“多样化的熟练工人——生产性劳动和因此而来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的可能主体——的消失,也导致了能够掌控社会主义计划并能够将其转化为现实的阶级的消失”(1982: 67)。由于严格地囿于马克思主义的预设,高兹也陷入了这一困境。他最终主张一种没有任何贬意的“后工业乌托邦”(the post-industrial utopian)(参见 Frankel, 1987),这种“后工业乌托邦”既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又是非常不现实的。

在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观的映象的主张中,后工业乌托邦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工人确实是根据资本的需要而在社会劳动分工中被分配的。工人组织,比如工会,反映了其成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角色而非挑战这一角色。正如高兹所说,“在与资本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承担着资本本身所赋予它的身份”(1982: 39)。更高的工资需要与早期社会主义要求消除“工资奴隶制”(wage slavery)大不相同。然而高兹现在或以前要求“废除工作”似乎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种对工作条件恶化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式的下意识的(knee-jerk)反应。这并没有反映出世界范围内上百万的人试图进入有偿工作圈子的强烈愿望。对他们来说,这种呼喊将会显得极端离奇。可能无可争辩的是马克思主义神话中的无产阶级现在已经离开舞台,即使它曾经在舞台上存在过。

随着传统工人阶级在革命的潜力中迅速衰落,在1968年后的一段时间内,一些左派转到别处去寻找革命的主体。传统工业工人阶级的



“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导致一些人转向晚期资本主义的技术人员/工程师/电脑专家。或许这是在技术白热化中形成的新的、反资本主义的先锋。其他人,或许通过参与性观察,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了革命的优点和不良后果。也许学问将会与资本主义的限制相冲突。但最深远的转变朝向了第三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如果西方的工人阶级已经变得软弱与腐化,那么第三世界瘦弱与饥饿的农民将会包围城市,并且带头走向希望之乡。然而,一些人甚至把第三世界工人看作一种“工人贵族”、被收买者与改良者,他们把在棚户区的“边缘人”幼稚的革命热情,视为“革命”工程的可能救星。

后工人阶级主体(subject)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一些左派呼吁停止“放弃阶级”(Wood, 1981)。传统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观点的选择性愿景(alternative visions)被指责为“策略破产”,特别是高兹,他因为“绝望的忠告”(同上:15)而被痛斥。面对被后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的“历史与政治的随机性”,伍德斩断了它重返基本原则的路径。坚持认为“工人阶级是潜在的革命阶级”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被视为一种形成上学的观点,而工人阶级并没有产生革命运动的事实只不过是置之不理。我们只是被告知,工人阶级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最直接的“客观利益”,这是带有“战略性的社会权力”的实现这种变革的社会力量(同上)。这一叙述的要点是提醒人们,当历史事件挑战思想体系的一致性和充分性时,思想体系退至盲目的教条主义是多么常见。

如果我们避开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工人阶级的争论的细节,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更为普遍性的问题。似乎甚至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者,如高兹,也在与他们批评的那些相同的话语地带上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寻找革命的主体似乎是问题所在,而不是这一角色的候选者适合与否。此外,工人阶级构成的所有争论方,似乎都困扰于寻找阶级结构,而不是更有效地构思作为过程的阶级。与社会“体系”和阶级“主体”的语言相反,吉布森-格雷汉姆(Gibson-Graham)呼吁:“需要从这些约束性的而又享有特权的局面中解放阶级政治……[和]将社会理解成一个复杂的非统一体,阶级在其中将呈现多重的与多样化的形式”(Gibson-Graham, 1996: 58)。我们现在更能够将资本主义设想成离心的和碎片化的,将阶级过程设想成不平衡的、多样化的发展。这不是一个过分单纯化的“超越阶级”的景象。

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

如果前面的部分已经详细分析了一些相当奇特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观点,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检视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与所有的本质论不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诸如拉克劳和墨菲,⁷³强调当代社会斗争的多元化和政治的偶然本质(contingent nature)。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张:

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是社会主义的整体概念。这个概念依赖于工人阶级本体论的核心性,依赖于革命(大写字母R的⁷⁴革命[Revolution])在从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转变的决定时刻中的作用,以及依赖于使政治时机无意义的一元同质的集体意志的虚幻前景。(Laclau and Mouffe, 1985: 2)



普遍主体——无产阶级——朝向其不可阻挡的命运前进的思想，没有经受住后结构主义者或 1989 年巨变之后现实世界中事件的批判。

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话语已经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效应。尽管其批评者宣称“阶级的死亡”，但原教旨主义仅呼吁停止“放弃阶级”，而私下里为工人阶级的瓦解而哀悼。事实上，我们可以质疑吉布森-格雷汉姆的这个观点：“已经死亡的或瓦解的，是对工人阶级及其任务的虚构，这个虚构是作为一种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霸权概念的组成部分而产生的”（1996：69）。我们现在更加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社会斗争的多元化。种族、性别、性、宗教、残疾和区域都处于这一地带，它们与阶级同在并与阶级相整合。现在没有一个社会转型的核心地点或场所。存在多重压迫，而反抗的地方也无处不在。转型的能力并没有掌握在一个神奇的无产阶级手中——或者任何其他单独的主体手中——而是分散在全社会。

当然，这些主题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和平、生态和女权运动——开始明确表达出来的。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变迁已经明显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类型。旧的分配冲突正在被新的对认同与社会质变的关注所取代。对经济的重视被对文化的重视所取代。“新”的社会运动被看作是一种对产生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对抗形式的回应。关于这些运动的内部活动方式，大卫·斯莱特（David Slater）认为，“在内部的决策制定中高度重视高水平的参与，寻求合作关系，尊重社会差异以及人际关系的社会文化‘含义’，联合形成另一种新社会运动中创新的关键构成要素”（1984：7）。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什么程度上这些实践已经蔓延到了更传统的劳工运动中。

我们必定能够发现,在过去十到十五年中,一些“社会运动工会主义”(social movement unionism)的迹象,与“新”社会运动的主题与情绪是更为合拍的。在半边缘(semi-peripheral)国家,比如巴西和南非,并且甚至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工会主义”(new unionism)实践与策略的繁荣。关注内在联合(inner-union)的民主程序、性别平等和“质”而非“量”的策略,如今已经更为常见了。旧的盛行的国家中心战略现在已经更为常见地与一种市民社会的取向相匹配。工联主义者不仅更倾向于接受工人阶级有两种性别,而且更倾向于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种族弃之一旁。在某种意义上,工人阶级的实践,不管如何地不均衡与偶发,已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正统内自命“代表”的先入之见。

如果一种因素可以说已经破坏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这一因素将是性别。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指出:

“阶级”、“劳动后备军”、“工资劳工”等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范畴,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特定的人被分配至不同的地方。它们没有解答这种问题:为什么女人在家庭内外都附属于男人?为什么不是男人附属于女人?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比如资本,是忽视性别的。(Hartmann, 1986: 8)

一旦批评的闸门这样打开,像一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几乎不存在仍旧免于女权主义颠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我们对工人阶级的形成、起作用的父权制、劳动过程和赋有性别的公民身份的理



解都改变了。我们再也不可能忘记,如罗斯·巴克森达尔(Ros Baxandall)和合著者们强烈地提醒我们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经典之作《劳动力和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1974)中写到的那样:“工人阶级是有两种性别的”(Baxandall et al., 1976)。

然而,马克思主义即使加入女权主义批判,也经常是以一种片面和歪曲事实的方式来进行。这种问题的一个例子是,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花费相当大精力参与的所谓家务劳动的争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试图把妇女的家务劳动置于资本主义领域之内,而且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规范它。马克思主义者的焦点并不是女性的压迫,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务劳动的确切作用。这类盛行的问题是,75 家务劳动是生产还是不生产(unproductive)剩余价值,或者与生产、不生产剩余价值无关。承认妇女的家务劳动是工作,无疑向前迈进了一步,但然后质疑这种工作严格说来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却是一种倒退。即使马克思主义一再努力,它的倾向仍然是囿于一种生产主义的逻辑之中。阶级仍然被归结为生产(尽管是在“归根结底”意义上),而生产关系之外出现的意识和行动的形式几乎不被察觉。

在最近几年,全球化的主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工人阶级的批判研究。马克思本人,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的笔记中,对这一过程已经有了一些闪光的直觉:

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

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Marx, 1973: 408—10)①

在近几十年,除了其他关系之外,经济关系已经从一种国际维度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维度。这是一个在劳动领域中影响深远的整合过程。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一样,资本已经扫除了任何国家的界线。资本主义已经渗透(这个词的使用是经过斟酌的)进遍及全球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处于新的“全球工厂”的工人们再一次变成纯粹的商品。在民族国家的生存被认为成为问题的时代,民族国家主义的(nation-statist)斗争场域逐渐缩小。

与全球化同步,资本已经跨进了一个由信息(见 Castells, 1996)和知识所主导的新技术时代。这导致了劳工与资本二者关系的一种有利于资本的历史新定义。随着资本获得了灵活性与适应能力,加速了传统工人阶级的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劳动者及其组织越来越僵化,从而在整体上不能适应新的秩序。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

劳工联盟是单方重组战略的主要障碍。但由于它们不适应代表各种新型工人(女人、年轻人、移民)在新工作场所(私人部门、高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393页。



技术产业)工作和以新的组织形式(全球规模的网络企业)发挥作用,而被削弱了。(Castells, 1996: 278)

看起来,“新”社会运动的教训吸取得太迟,或者惯性与正统性的恶劣影响占据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已经普遍对这些趋势做出了各种回应。一种倾向只是抱怨“自由自在”的跨国企业与劳工之间不平等的游戏场所。另一种思想的方向是无视眼前的证据,宣扬“失业未来”的凄惨景象(Aronowitz and Di Fazio, 1994)。然而也有这样一个迹象,即一个新的后结构主义者对工作与工人的理解正在出现。例如,凯瑟琳·凯西(Catherine Casey)支持一种“离心工作场所”(decentred workplace)的新构想,这种构想是通过新的信息技术超越国界分散工作的能力而创建的(1996: 195)。此外,她认为,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随之而来的工作重组“正以更为复杂的方式来分离工作场所”;与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很盛行的办公大楼或制造工厂相比,我们工作的场所,正在变成一个更为分散的地点(同上:195)。随着网络开始战胜等级制,新的离心工作场所在企业内部也产生了内在影响。

如果我们现在将阶级看作是分散的,那么这未必意味着阶级作为一种过时的现代主义现象的结束。否认无产阶级享有特权的代理人身份(不管我们如何定义它),并不意味着反对工人的斗争。我们确实需要承认,这种或那种斗争好战的党派意识,并非与社会主义同义。我们确实需要理解,阶级不仅在工作场所中形成,而且有一种关键性的文化构成部分。我们也需要不断重视工业化北方的工人与贫穷的南方工人

之间、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分野,重视各种伪装的种族主义脓疮。工作领域的分离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事实。这并不能被任何开倒车和(再)中心化的一种神秘的无产阶级的企图所抵消。相反,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正在建构。这一理论建构始于离心的社会本质,它理解,甚至欢迎多样性,它的目光朝向未来,而不是朝向过去。



77 第五章 不幸福的婚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

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备受关注的時候，女权主义的理论地位与政治影响不断增长，这可能不是一种巧合。尽管马克思主义在“妇女问题”的标签下，试图包含甚至驯化女性，但女权主义正在确立自己的行动议程。本章在简略回溯女性的“经典”婚约之后，考察了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未果的(attempted)“婚姻”。随着19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对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审视，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被证明并非是一个健全的混合体。新后现代女权主义成了女性的(或许也是男性的)激进工具。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仅以男人为中心的思想模式，但是正如我们将考察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以男性自我为中心，这可能足以使之无资格去作为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合理的指南和方案。本章区别于其他章节的一个方面是，这次马克思是沉默的伙伴，而恩格斯走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性别研究的最前沿，获得成功的程度至今仍为马克思学学者(Marxologists)所争论。

恩格斯与家庭

人们试图在马克思成熟的作品中寻找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妇女地位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充足基础(见 Vogel, 1983),但总体看来,人们公认马克思将“性别”(连同宗教、科学、战争与其他“非中心”论题)委托给了他的伙伴恩格斯。如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在1983年缅怀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一卷书中指出:“他对这个问题[性别]的讨论,如今被普遍认为是分散的,不充分的,也是不令人满意的”(1983: 78; 199)。如实说来,马克思也不能被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所“谅解”,他那个时代几乎不是“前女权主义的”时代。把马克思视为他那个时代的单纯产物,甚至也是对他的一种伤害,因为当时马克思的分析活力在其他领域是如此明显——他剥去了资产阶级常识的自然主义假象。在更往后的时期,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思潮将力图运用马克思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阐发的范畴,明确地阐述一种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性别关系的系统学说。目前,我们需要考察的是,恩格斯——一个工厂主,稍稍有些非传统,就个人而言比马克思更为“自由”——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Engels, 1990)中阐释的关于性别问题的观点。这个基础文本是通过家庭来研究女性的。

成书于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几乎立即成为经典。在社会主义传统中,该书成为研究家庭同时也包括“妇女问题”的权威文本。本质上,恩格斯试图从理论上阐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及国家的出现)和女性服从于男性之间的关系。他的主要的经验性来源是路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该书出版于1877年。恩格斯使用的表达方式之一孕育了涉及整个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争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Engels, 1990: 131)^①。这被许多当代社会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誉为一种深刻的洞见，它将关注点转向社会再生产的社会与物质方面，而生产主义者的叙述中常忽略这一点。然而，人们仍然抱有这样的成见：相对于男性的生产领域，再生产(生育)领域则是女性的领域。这种成见不但使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围和方式持久化了，而且在这一点上也开创了一个悠久的二元论传统。莫伊拉·麦科纳基(Moira Maconachie)直截了当地说到：“这种将家庭从社会生产中独立出来，并把女性限制在家庭生活领域的观念上的二元论，对女权主义毫无用处”(1987: 107)。历史与社会的变革被视为发源于“男性”生产领域。

从这种观念可以逻辑地得出，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来自于她们不断进入生产领域。对恩格斯而言：

79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Engels, 1990: 262)^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② 同上书，第162页。

这种陈述不但困扰于一种粗浅的生产主义的逻辑——为什么工厂劳动应该从一切中解放所有的人？——而且其仍持有一种性别假设，即女性“天然地”负责家务劳动。在社会分裂为社会阶级方面，并没有这一过程的任何位置。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恩格斯这种自信的断言被令人讨厌地重复，去为他们生产主义的逻辑和他们未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解决妇女解放问题作辩护。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南斯拉夫政府官员最终清晰地阐明了这一刻意的盲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确定了妇女不平等地位的根源并不在于他们受男人的压迫……因此唯一实现妇女解放的途径……是革命斗争的道路”（转引自 Molyneux, 1981: 177）。

恩格斯的人类学阐述主要来自于摩尔根。根据这种阐述，恩格斯把转向父系氏族制度作为性别关系的转折点。这为私有财产的出现和阶级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至于性别关系，对恩格斯来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1990: 165）^①。对恩格斯来说，母系与妇女至上权力在集体经济中的下降是以前的状况（the status quo ante），但这绝非毫无争议。“男人狩猎”的神话已基本不可采信。基本上，恩格斯在性别关系上持有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并且假定女性对家务和家庭是有责任的。上述阐释进一步降低了妇女在（当代人类学认为的）家庭是如何演变的这一广泛历史中的作用。它也把性别不平等与对抗的阶级社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而后者被视为妇女从属地位的唯一“物质”基础。对恩格斯来说:“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同上:181)^①。

80 如果我们认为恩格斯至少认真地重视了性别问题,而非像马克思那样没有关注这一问题,那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仍然存在严重的局限,即使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初步概述。我们已经提到了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叙述中的生产主义的偏见。这种偏见因为经济决定论而更糟,这种经济决定论无疑部分的是但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见第一章)。在恩格斯对于劳动中性别分工的阐述中,也存在一种强烈的自然主义的张力。尽管这里无疑有恩格斯所考察的技术的(“物质的”)方面,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围绕劳动性别分工在社会中建构的等级性别关系。如麦科纳基所说:“自然化的妇女与男人的家庭关系,使我们看不到一种战略的可能性,即男人与女人间任务的任何交替的可能性,这使得现行的家庭惯例似乎尤其不可改变”(1987: 11—12)。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女人在家庭领域之外的作用。他也没有解释,与劳动力再生产(孩子的养育,社会化,吃饭,穿衣,诸如此类)相关的社会活动特定领域的出现,是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相关联的。

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恩格斯与马克思关于性别问题的讨论,我们能够集中有效地探讨两个问题,即家庭和雇佣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释了一种根植于社会劳动分工的家庭概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念。这种劳动分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来说,“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Marx and Engels, 1976a: 44)①。由此在社会中出现的“自然”劳动分工也仅仅是家庭内部自然劳动分工的延伸。然而,不断增长的需要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并且家庭越来越依附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继续作出了普遍的理论概括:“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同上:43)②。在目前情况下,重要的是,这种自然与社会之间设定的强烈的二元论,在诸如《资本论》等成熟的马克思著作中已经被明确地克服了,但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研究性别关系时,恩格斯选择近乎逐字地去再现它。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仍保存了乌托邦的、甚至女权主义的激烈言辞的地方,与家庭的未来相关。然而,在一个公认灵光闪现的段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消灭单个分开的经济是 81 和消灭[Aufhebung]家庭分不开的”(Marx and Engels, 1976a: 76)③。然而,在《起源》中,恩格斯倾向于赞美无产阶级的家庭美德到了一种不必要的程度(unwarranted extent)。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婚姻是一件很简便的事情,恩格斯对于各种双重标准的论述是雄辩的;而对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③ 同上书,第117页。



来说，“古典的专偶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推动力了”（Engels, 1990: 179）^①。恩格斯认为，在工人阶级之中，“个人和社会的条件”起决定性作用，并且“个人性爱”是至上的。对于一个处于恩格斯立场的男人，这种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家庭观甚至是不能原谅的，例如，因为他应当熟知当代对家庭暴力的谴责。在这个问题上，他在某种程度上委婉地提到“自从专偶制引入以来，它作为原来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暴力的稍许残余”（同上：181）^②。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将随后把女性的从属地位辩解为资本主义的一种不幸的“残余”。

坦率地说，在雇佣劳动问题上，马克思只是假设了雇佣劳动者是男性。在《资本论》一书的许多地方，马克思提到了女工及其状况。马克思尤其关注引进机器所带来的影响，即使资本主义转而雇佣“廉价劳动力”如妇女、儿童和技术不熟练的工人。《资本论》中一些最为精彩的段落论述了社会对女工的歧视，马克思不断呼吁更好地“保护”她们。然而，焦点常常是“典型的”男性工人，伴随着马克思的典型谴责：“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Marx, 1976: 402）^③。因此，不但男工人位于马克思描述的中心，而且他似乎确实无可非议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 页。

② 同上书，第 74 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1 页。

(考虑到关于该主题的现代知识)被工业中雇佣的大量女工震惊。另一方面,与其他论题相关,在他将企图解构已经确立的智慧和的地方,马克思屈从于“常识”的概念和认识。这也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应用性别盲点范畴的典型,这种范畴默认了一个男性至上社会的戒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劳动中性别关系态度的核心是“家庭收入”(family wage)的概念,在此男性工人被看作是获取足够的工资以维持家庭。在关于机器的采用如何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Marx, 1976: 517)^①的讨论中,马克思接着描绘这种情况如何“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同上: 518)^②。马克思仅仅假定,直到女人和孩子也沦于资本支配下之前,养家糊口的男性已经获得的收入足够维持一个家庭。他也简单假定,这将贬低男性的工资,这是一种存在于许多后来“非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斗争背后的思想。“家庭收入”问题——更多的是话语而非实践中的现实——是工人运动中一个最深层分歧的症状之一。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和工团主义者以一种简单假定它是以男性领域的方式描绘了劳动世界。女性工人被正当地认为是被召入服务性工作之中的“劳动力预备大军”部分,而当工作不再需要她们时就被解雇回家。

最终,我认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性别问题最为严重的政治批评,是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信条信以为真。这是一种马克思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33 页。

② 同上书,第 433—434 页。



主义创立者未提出挑战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式。例如，他们为什么尖锐批评杜林以模糊不清的真理和正义观念为基础的“伦理社会主义”(ethical socialism)呢？正如巴雷特指出：“既非马克思也非恩格斯认为企图反驳那些支持女权的经典主张是恰当的。沃尔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和密尔(Mill)仍旧没有回答平等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其他论题上的类似论点被抛向哪里”(1983: 201)。当然，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前女权主义者”，但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事业与女权主义的事业如何可能走到一起，或共同走向更美好的社会。直至今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既是对唯物主义地理解性别问题的一种坚实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积极学派中可以目睹其影响——也是其局限性的一种象征。矛盾的是，正如罗斯·考沃德(Ros Coward)所说，这个文本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揭示了“妇女问题借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这样一个成问题的领域的政治理论，同时又是这个政治理论的绝对中心”(1983: 141)。

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

83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性别问题进行了不甚明确的讨论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寻求与“妇女问题”建立一个更为有机的联系。一个关键的标志是由恩格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78年的著作《妇女与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该书的核心是对资本主义体制下妇女所受的压迫进行分析。倍倍尔把妇女的受压迫与金钱关系向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渗透联系起来。尽管主张男女权力平等，但倍倍尔认为男女是根本不同的，妇

女需要保护,尤其是那些工作威胁到她们的女性特质时更是如此。如同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一样,倍倍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治标不治本,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妇女的解放才会成为可能。尽管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存在着疑问(恩格斯似乎并没有在此问题上给人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妇女与社会主义》已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它不仅成为德国的畅销书,而且对诸如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等后来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先锋们产生了一种重大影响。这可能再次表明,即使当社会主义在任何意义上接受女权主义都有巨大的问题时,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妇女问题”是多么重要。

克拉拉·蔡特金不仅在世纪之交的德国成了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毫无争议的领导者,而且对俄罗斯和欧洲的事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她的个人经历使她既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她信奉恩格斯主张的妇女经济独立是解放的先决条件,但她开始认识到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受流行女权主义著作的影响,蔡特金形成了一个有关妇女状况的辩证观点,阶级和性别二者在这种状况中都充分地发挥作用。虽然她不断强调自己在组织工人阶级妇女的活动中的角色并不是与那些男性社会主义领袖相竞争,但实际上她知道沙文主义在那些地区依然盛行。因此,例如,虽然攻击“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和拒绝普选问题中的共同平台,但蔡特金开始走向了一种实践中自主妇女运动(Autonomous Women's Movement)的概念。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妇女运动已经有175 000个成员,他们组织了215 000个女工加入工会;蔡特金的杂志《平等》(*Die Gleichheit*)



有大约有 125 000 个订阅者。

84 依照蔡特金的观点,社会主义妇女在党内的自治对于激发她们的主动性和尽可能地发挥她们的潜能是不可或缺的。利用一度禁止男女混合的政治集会的法律,蔡特金设计了一个社会主义运动中女权主义的议事日程。当 1908 年法律的修订允许女性在政治上与男性参与同一组织时,党的领导人迅速采取行动,解散了他们队伍中单独的妇女组织。作为补偿,党的领导层给女性留出了一个位置——但占据那个位置的人不是克拉拉·蔡特金。但蔡特金仍然保持了对党的忠诚,这种忠诚使她无视把激进主义与分离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有意识的行动。如凯伦·哈尼卡特(Karen Honeycut)指出,党的领导人有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作为男性、马克思主义者和行政官僚,他们致力于修正主义策略和组织的一致性,反对社会主义女性的自治”(1981:41)。克拉拉·蔡特金作为一个女性被载入史册,不但因为她创建并领导了社会主义妇女国际(Socialist Women's International),而且也因为她在 1907 年开创性地设立了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是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合流的一个象征,在今天仍然产生着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转向了俄罗斯。在这里,革命正处于酝酿之中。在 1900 年,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出版了《女工》(*The Woman Worker*)一书,虽然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以倍倍尔和蔡特金的思想为依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唯一有关“妇女问题”的俄语文本,影响巨大。与这两个德国作家相比,克鲁普斯卡娅更关注农村妇女,并且促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相较于大多数男性布尔什维克而

言,列宁写了更多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但他往往只遵循一个基本路线。对列宁而言:

女性占人类的一半,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了双重的压迫。职业女性和农村女性被资本所压迫,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她们首先被剥夺许多权利,因为法律并没有给予她们与男性同样的平等,其次是最为重要的,她们仍然处于“家庭的奴役”之中,继而成为“家庭奴隶”,因为她们过度负担着厨房工作和家庭中最肮、最累、最枯燥乏味的艰辛工作。(Lenin, 1966: 83—84)

也许人们熟悉列宁在与克拉拉·蔡特金的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在性问题上坦率的个人保守主义。

毫无疑问,亚里山德拉·科伦泰是布尔什维克中探索“妇女问题”的主要人物。然而,她并不自称为女权主义者,而且她很多早期政治著作都高声反对女权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妇女运动的⁸⁵四处涌现,俄罗斯的女权主义有了明显发展。相反,布尔什维克妇女团体在这一阶段却不存在。因此,当(第一次)俄国革命在2月23日即国际妇女日爆发时,冲在前面的却不是布尔什维克。女权主义运动不失时机地向临时政府要求普选权。科伦泰严厉指责这些向资产阶级政府要求普选权的“上流社会的淑女们”。她参加女权主义会议,怒斥“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极力主张妇女关注战争和阶级剥削。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彼得格勒地区工农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会上,科伦泰主张妇



女为制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名单投票，而不是为女性平等的女权主义联盟的候选人投票。一位女权主义代表的声明，揭示了女权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距离：“女性在任何地方都遭受压迫，在任何地方都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男人并不能保护我们的利益；他们不懂我们”（转引自 Stites, 1978: 306—307）。

在新政府中，科伦泰接着成为社会福利部的人民委员，她优先考虑的事情是实现女性在婚姻中完全的独立和平等。在科伦泰的影响下，妇女同酬原则被制定，堕胎合法化，非婚生育作为一个合法的范畴被消除了。当然，这些成就在斯大林统治之下被翻转过来。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妇女工作部（Zhenotdel）大力推进了女性事业。这一部门最初是由伊涅萨·阿尔曼德（Inessa Armand）领导，1920年后由科伦泰领导。她告诉爱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妇女工作部的工作是培养妇女的意识和解决性别特殊性的问题，例如母性保健，而不是“女权主义”（Stites, 1978: 332）。实际上，她对妇女的工作，尤其是对东方而言——那里许许多多妇女因为宗法社会不能接受她们新的平等地位而被处死——只能是女权主义的。当然，科伦泰没有停留在政治解放上（如果那也能被看作是“女权主义的”话），而且她在那些激进的工人反对派中起着领导作用，但不久这些反对派就目睹了她从妇女工作部领导的岗位上离职，并最终被流放至挪威任外交官^①。她的离职对于

^① 前苏联时期，官方把一些他们不信任的重要官员调离原岗位，任命为驻外使馆的官员。这意味着对官员的惩戒，被人们称之为“外交流放”（diplomatic exile）。——译者

俄罗斯的妇女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科伦泰在此确实展现了她与其同时代的男性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把她看作是通向20世纪60年代性别政治的一座桥梁。⁸⁶平常矜持的卡尔(E. H. Carr)公开宣称,科伦泰“鼓吹放任的性冲动满足,她主张国家应当照顾这种情况”(1970: 41)。确实,科伦泰的理论和自身例子都被看作是20世纪20年代“性泛滥”或“新道德”的主因。事实是更为平淡无奇的。科伦泰相信母性身份的神圣功能,将婚姻看作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形成的自由联合体,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性爱将占有一席之地,它是情感体验和与日俱增的幸福之源泉”(引自 Stites, 1978: 353)。这绝对不是一个浪荡子的宣言。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神经病学家学会(the Society of Marxist Psychoneurologists)的创始人阿隆·扎尔金德(Aron Zalkind)来说,这已经足以让他去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性行为”的对立理论。这个对立理论可以简单归纳为:“性”和“爱”类似于固定资本,它应该包含在“阶级”活动中,并且不会被轻易挥霍掉。就如同在文化领域中(见第六章),俄国革命的倒退包含相当大的性心理压抑、升华和控制。科伦泰本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探究的一个新领域,而威廉·瑞奇(Wilhelm Reich)等人后来继续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

如果现在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在女性受压迫方面的政策,那么记录肯定是不明确的。背景环境并非总是有利的,几乎所有这些社会都具有物质匮乏和外来侵略或是内部冲突的特征。然而,毫无疑问,至少形式上的性别平等已被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列入主要议程,并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偏见和发展的需要,妇女



被大量吸纳入劳动力队伍之中。当列宁宣称俄国革命导致世界赋予妇女以平等的权力,并且打破了影响她们地位提高的封建宗法障碍的时候,他也并非完全在蛊惑。性别的劳动分工仍然继续大行其道。经济自由没有保障,因此不能为女性解放提供保证。对于这种将要实现的内容来说,正如玛克辛·莫利纽克斯(Maxine Molyneux)指出,“非经济以及经济的机制之复杂结合,一定会形成一个**特定的**斗争对象,在这种结合中妇女的附属地位受到冲击”(1981: 179)。只有还原论的经济主义看到的是压迫只源自经济因素,甚至是源自阶级因素。因此,机械马克思主义的遗产阻碍着妇女的解放事业。

87 国家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遗产是列宁主义的党组织模式,它被赋予了准神秘主义的革命美德。那些强调领导、牺牲和远见的坚定职业革命家们总是男性。更为中肯地说,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天生的男性组织形式。列宁主义的权力政治话语几乎不进行反思,它当然不偏爱任何个人的考量。尽管谈到无产阶级民主比纯粹资产阶级民主更具优越性,但列宁主义政党不是培育民主的学校。这个政党模式也以一种严格的行为(尽管是可变的)等级制来运作,从政治的(国家权力),到经济的(工作场所)、社会的(工作场所)、社区的(例如住宅),再到文化和其他各种各样次要的问题,均是如此。女权主义所做的,是把预见的政治突出出来;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与其目标同样重要。正像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所说:“妇女运动重新肯定了前列宁主义激进运动所承认的观点,即塑造能够保持精神并有助于推动我们迈向未来的情感的价值观和文化的重要性”(1979: 128)。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并

非特别富有成效。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坚持参与有薪工作是妇女解放的路径的观念,但无论如何,他们认为这个目标要服从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经常为了相同的政治选区的选民而竞争,这占了两种流派之间对抗的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必定试图吸纳女权主义的政治,有时候(并不总是)会成为普选权的狂热支持者。社会主义的女性经常必须掩盖起其女权主义,并且不断声明忠诚于以男性为主的党。当所有环境都允许时,大多数社会主义组织仍然深深地保留了家长式的统治行为。正如理查德·斯蒂茨(Richard Stite)谈及关于俄国革命的后果时写道:

男性工人仍然对女性的竞争感到愤怒,并在革命后较长时间里仍旧如此。各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男性领袖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去组织女性。一些人认为组织女性是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而强烈反对;其他人则强烈打击纯粹的女权主义——这是每一个有自尊的社会主义者所不齿的一种运动,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社会主义者均是如此。(1978: 257)

五十年后,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话语的和解才出现。

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

88

当巨大的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向前迈进的时候,与自由和激进女权主义并行的是社会主义(有时候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似乎最初缺乏对激进女权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至少



是性别盲(gender blind)这一观点的反驳。恩格斯、倍倍尔、列宁以及被人们遗忘的蔡特金和科伦泰等人布满灰尘的论著,很难与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s)和舒拉密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s)的推动力与创造力相竞争。然而,一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政治理论与实践逐渐建构起来。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婚姻”(正如在本章的题目中所提到的)成为一种策略。马克思主义通常是主要合作伙伴(lead partner),正如在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在《妇女的地位》(*Women's Estate*)中积极地去“提一个女权主义的问题,却尝试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答案”(1971: 99)。这些马克思主义答案成功的程度,现在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此外,女权主义应该融入社会主义的全部方案似乎也是错误的。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辩论大大推进了我们关于性别压迫的认识。

恩格斯留给现代社会女权主义者的,首先是一种作为自主体系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观念,或者是阶级与性别的观念。这种“二元体系”思想贯穿于大部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话语中。这里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在资本主义创造了工人和阶级的等级体系的缝隙,而性别(种族)确立了谁来填充这些缝隙。父权制的概念开始成为解释男性统治女性的跨历史、跨地域的普遍性建构。在这一理论的一些具体形态中,资本主义被认为在“物质”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而父权制在意识形态上被视为占统治地位。这方面分析的代表是朱丽叶·米切尔所著《心理分析与女权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1974)。在该书中,马克思主义体现为对阶级的解释,而心理分析则成了分析父权制的理论。

另一种具体理论是克里斯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当前社会存在两种生产方式:“一种生产方式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另一种生产方式导致相似的剥削,或者更为精确地说,父权制的剥削”(1984: 69)。依我看,二元体系理论的所有形式都例证了德里达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s)。它们再生产等级制;它们未能质疑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中心逻辑,它的生产主义的偏见和本质上的经济主义。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对二元体系方法的批判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把它抛弃的程度。正如巴巴拉·马歇尔(Barbara Marshall)⁸⁹所说:“人们似乎普遍认同,分析将意识与物质分离是不成功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如此的相互交织,以至于二者融为一体”(1994: 84)。阐发统一的“资本主义父权制”(capitalist patriarchy)概念的作者之一是齐拉·爱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她认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其分析上的分离不切实际。我们知道,恩格斯将父权制(“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纳入到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来解释性别压迫。现在,这已经与资本主义逻辑相结合,因为,对爱森斯坦来说:“资本主义利用父权制,而父权制由资本主义的需求来界定”(1972: 28)。现在看来,父权制完全被包含在资本主义逻辑之中,在一个完美的逻辑中听命于它的职能的需要。在这一阶段,父权制概念本身已经很成问题。对于其起源、意义和作用,几乎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人们也不清楚其是否与资本主义无关,是否以一些不清楚或许是共生的方式相互依存,又或者只是资本“需要”的一个依赖的功能变量。

马克思主义本身关于性别问题的遗产也同样模糊不清,因为他实



实际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是十分稀少的,但他确实留下了“再生产”(reproduction)概念,这在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学说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社会再生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生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如今,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阐述呈现出一种动态、连续的特征。性别问题可以被纳入这一阐释之中,而社会再生产既能够容纳阶级方面,也能够容纳性别方面。现在可以把支配与从属的性别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构成成分。正如艾得赫姆、哈里森和扬(Edelholm, Harris and Young, 1977)所揭示的,在这一新问题的核心部分仍然存在着一种观念上的混淆,因为这意味着社会再生产本身(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此处指家庭经济与社会化)以及人类再生产的生物学方面。妇女参与了所有再生产的三个方面,但这里存在着一种女性之生物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奇怪合并。我们没有获得任何关于妇女在再生产活动中为何起到关键作用的有说服力的解释,生物的方面也总是被人们所忽略。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中,意识形态被视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恰当地拉开了她们与恩格斯经济主义方法的距离——恩格斯经济主义方法是指妇女解放依赖于她们进入有偿的劳动力市场之中。女性压迫比这个更根深蒂固,并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根源。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开始认识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时(见第六章),女权主义者认为,“承认女性遭受的压迫作为社会结构中一种相对自主的因素”是可能的(Barrett, 1980: 31)。批判的女权主义研究的整个新领域出现了,它关注身份的性别构建、家庭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及女性与男性主体所隐藏的问题。从这种文化转向中产生了一

种对性别实际上也是对作为一种话语运动的女权主义的话语建构之更深刻的理解。然而,对于这种推进的工作而言,抛弃作为一种总体框架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必须的,因为它受基础/上层建筑划分的束缚而软弱无力,并且充其量它只承认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相对自主性”。这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为超越正统马克思主义创造条件的又一途径。

随着资本主义性别再生产的理解的发展,注意力自然转向并集中于家庭经济之上,“家务劳动争论”是其产生的一个结果。如果资本主义需要再生产其劳动力,妇女好像在生理结构上可以“适合于”此,因为她们的生育、喂养、制衣、教育、照料与养育,都塑造着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工人。以前人们一直无视家务劳动,而现在家务劳动已经处于最显著的位置之上了。从在政治上与文化上限定物价开始,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范畴讨论家庭工作价值而迈出的一小步。但随后却长期地偏离了正轨,探讨的问题是:家务劳动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剩余价值意义上的生产性的,或者它是否“只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回顾历史,人们曾经十分不必要地力争为女性压迫和资本主义的价值建立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谱系。甚至一直致力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综合的丽丝·沃格尔(Lise Vogel)也承认,“妇女运动中的许多人都将这个争论(有关家务劳动的争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玄学中的晦涩练习”(1983: 21)。我们很难明白,家务劳动的争论如何能够推动对女性压迫的理解(超越造成她们的家务劳动视野),或如何有助于提供克服这种压迫的策略。

当然,在这方面提出的一种策略就是著名的“有偿家务”(Wages



for Housework)^①运动。正如瓦莱里·布赖森(Valerie Bryson)指出的,从这种观点来看,“女性不应该像以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所建议的那样进入有偿劳动力之中,但她们应该要求从家务劳动本身获得报酬”⁹¹ (1992: 238)。人们很易于接受这种分析,虽然它不切实际,但将其作为一种“过渡的”政治纲领却并非毫无价值。也可以说,它只是使妇女的家务苦役永久化,只是试图借助于工资使之规范化。然而,就像生态女权主义一样,它也可以被看成是使资本主义国家陷于窘境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法。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妇女对于延续人类社会作出的贡献——这些贡献一向被人们所低估。它也挑战了这种假定:“女性通过对天然金钱关系的需求,可能对于家务劳动有天生的本性(就像女性电子技工被认为有“灵巧手指”的特性一样)。”在现实层面上,“有偿家务”的观点也揭示了女性今天实际能获得的就业机会类型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分类范畴在这一修辞策略中被颠覆,对于马克思本身来说很可能不是一个问题。

在所有这些关于性别和阶级压迫二者关系的错综复杂的争论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关系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的女性显然想见到某种友好关系的建立,或者至少是友好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而女权主义可以为我们理解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提供批判的视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展示他们理解女性遭受压迫范畴的有用性,而一些女权主义者则试图使马克思主义对于易于被忽视的人类的一半(女性)更有助益。然而,如果在

^① “有偿家务”即付工资的家务,由政府而不是个人给主妇付费。——译者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曾有过“婚姻”，就像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在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指出，这种婚姻“就像英国习惯法(common law)描述的丈夫和妻子的婚姻：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是一体的，而这个统一体就是马克思主义”(1986: 2)。可是女权主义不会公然破坏婚姻，而是寻求婚姻美满。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或许是性别盲，但就女权主义自身来说，更倾向于漠视历史。然而，哈特曼所诉求的——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体系理论，在其中，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被看作相互独立但却互相补充的控制形式——即使是针对他写作的那个时代而言也是不恰当的。

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关系最终变得比一个不幸福的婚姻更为糟糕。例如，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表达了一种不断增长的认识，即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从根本上不但是性别歧视主义的，而且也是性别盲的”(1986: 137)。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就如奥德里·罗德(Audre Lorde)富于诗意地指出的，“主人的房屋不能借助于主人的工具来重建”(Lorde, 1994)。太多男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都完好无损，太多马克思主义与性别问题的结合都带有指派的意味。或许马克思主义建构的“女性问题”现在可以用“男性问题”来替换和理解。男人们切实所失比女权主义进步给他们带来的枷锁更多。遍及西方的父权秩序的危机和(至少是)新兴女权主义影响的常识显示了这些问题的影响是多么深远。甚至发现女性中心主义“理论”缺陷的思想家也用它取代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雌雄同体。对于这个新的女权主义政治学来说：“我们正处于这样的历史时刻，女性必须在创建一种真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抓住领导权，因为她们是更为全面的历史与唯物主义的。”



妇女如今是历史上的革命群体”(Harding, 1986)。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方案是雄心勃勃的。如同迈克尔·巴雷特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本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正如她所称之的)的目标,至少是“将性别关系的运行看作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性别关系在此可能与这个过程相区别或相关联”(1980: 9)。它试图澄清和分析资本主义和女性遭受压迫这二者间的关系。它改变了迄今为止对性别、性特征和家庭的主导的社会主义理解。然而,在它自己产生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新统一话语方面,并未获得成功。迈克尔·巴雷特自己在1988年文章的新版本中,承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分析已经基本失败,并且自身远离了它所代表的最初的政治目标,因为“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论点已经代表了一种基本的立场,将来女权主义的理论工作很可能都围绕它来进行”(Barrett, 1988: xxiv)。女权主义并未被马克思主义所选择(co-opted),而是已经与后结构主义一道,动摇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宗旨。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被破坏了,因此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统一性也被破坏。现在我们必须转而去探究的,是后现代/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新的多元景观。

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见第一章),如果马克思主义彻底充满了现代主义的精神,那么可以说,女权主义也是如此。在其与“传统的”性别角色和不平等观念的彻底决裂中,争取男女两性平等就是“现代的”。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整个社会关系的解体,这种社会关系曾

经被假定为凝固与不可改变的。经典的“第一波”女权主义文本属于这个过程，这些文本既反映又影响了这一过程。现代性也承诺，旧秩序中的专制权威将不再具有支配地位。这将意味着，或者能够使之意味着平等，而非建立在“传统”或宗教法令基础之上的专制主义的权威。女权主义也同样基于启蒙思想和现代政治中心的“普遍理性”观念。此外，女权主义最为突出的是致力于启蒙的“自主”与“解放”观念的运动。在这一背景下似乎很自然的是，女权主义与那些相信“现代性的未完成规划”(哈贝马斯)的政治潮流属于同一阵线，并非与那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属于同一阵线，后者完全质疑现代主义和启蒙精神的逻辑和政治。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定位后现代主义和现在多元的女权主义之间确定的并行与交汇关系。

后现代主义已经有效地挑战了一些基本的和长期存在的二分法，而这些二分法对启蒙精神思考世界的方式是必不可少的。知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不仅强化了女权主义对男性知识的批判，而且认识到所有知识都是解释性的和基于一定立场的。启蒙精神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也是被后现代主义逐渐削弱的，这种削弱是以一种与之并行并强化女权主义对“理性人”(Man of Reason)批判的方式来实现的。后现代主义也已经破坏了自然与文化的现代主义对立，这种对立在启蒙的话语与大众文化中，经常与男人和女人的对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现代主义的中心，科学的理性主义哲学批判，不断注入女权主义对自然和科学的男权主义态度的批判之中。一个后现代女权主义因此将会拥有优势地位去解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是思考和理解世界的一切形式的二元论之基础。正如苏珊·海克曼(Susan Hekman)所



说：“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女权主义将拒绝男权主义的理性主义偏见，但并不是以一种女权主义的偏见去替换它。相反，它将采取的立场是，并不存在一种(男性)真理(truth)，而是有许多真理，其中没有一个真理在性别方面是享有特权的”(1992: 9)。但这种观点难道不会破坏女权主义运动吗？

94 后现代主义不但动摇了真实或谎言的宣称，而且也将削弱诸如“女性”这样的一个统一主题，而这个主题是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女权主义的核心所在。这一来自于一种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视野的“女性”观念肯定是“本质主义的”，因为它假定了一种人的“本质”。对于克莉丝·维登(Chris Weedon)来说，“人道主义的话语假定了在个体的中心有一种本质，这种本质独一无二、稳定、连贯，并且使她成为她自身”(1987: 32)。因此，激进的女权主义诉求一种“女性的本质”(essence of womanhood)，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相信一种统一的、理性的政治意识，这种意识源于女性被排斥，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基于一种被资本主义异化了的真实人性(true human nature)观念。后现代主义反对这些普遍的人类主体，它设想一种流动与偶然的自我，这种自我总是存在着主体性和身份的冲突。后现代主义强调与现代主义统一的均质化的观念不同的分裂和异质化观点。“女性”这个词语掩盖的多样性现在已经几乎被完全认识了，差异性也已经合法化了。20世纪80年代瓦解了的女权主义运动逐渐抛弃了启蒙精神的抽象普遍性。尽管这一女权主义运动曾经获得了巨大成功，或者正是因为其如此成功，才分崩离析。

最终，如果后现代主义是对元叙事的一种批判或者一种怀疑，那么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设计，要被置于何处呢？对于迪·斯

特凡诺(Di Stefano)来说,“如果女权主义认真地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规划设计,那么它就使任何女权主义政治的表象都是不可能的”(Di Stefano, 1990:76)。这涉及到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见第八章)。看起来非常奇怪:据说拥有一种统一自信的主体性的西方白种男人,应当否认女性的以主体为中心的政治的可能性。然而,对于激进的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实践来说,去识别出后现代主义的潜在有利的方面,也是可能的。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解放的宏大叙事包含着潜在的压迫,它们虚假的普遍主义也表现出极度的种族中心主义。由于将依赖性作为其社会理论的主要变量,即使不是唯一的变量,传统女权主义也可能会遭受到其正在试图消灭的二元对立的困扰。后现代主义把女权主义从一种对本质的女性性质的徒劳搜索中解放出来:“它用多元而复杂的社会认同的建设性概念来取代妇女和女性性别认同观念,把性别作为相关因素之一,同时也关注阶级、种族、种族地位、年龄以及性取向”(Fraser and Nicholson, 1990: 34—35)。

如果我们要去寻找女权主义的一致性被粉碎与后现代女权主义出现的一个政治的重点,那么这将会是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爆发。如果马克思主义是性别盲,那么大部分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权主义都仿佛是种族盲。它所指的“女性”似乎是西方的、白种人的与中产阶级的女性。贝尔·胡克丝(bell hooks)雄辩地主张(1991),女权主义运动的起源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它的议程。⁹⁵“只有当我们的陈述赞成主流话语的观点时,才能听到黑人妇女的声音”(同上: 11—12)。如果性别差异被看成是原初的和至关重要的,那么种族差异和压迫就必然被看成



是次要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关于平等的言辞本身也被看作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白人妇女应与白人男性平等，还是黑人女性应与白人女性平等？黑人对于白人女权主义的批评（例如见 hooks, 1994 and Collins, 1991）不仅质疑其虚假的普遍化趋势，而且也关注表述和意识形态的竞技场——在这里，女性形象始终不变的理想类型是白种人。从这个文献中只看到对种族主义的谴责是错误的，这只能再一次突出白人理论家“消解”（working through）他们的种族主义。不过，它应该有助于白人西方女权主义者偏离其霸权基础的中心。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性别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个合法探究的领域。正如钱德拉·莫汉蒂主张的，“20 世纪 90 年代的关键问题在于关注建构、检讨，最为重要的是女权主义话语内差异的制度化”（1992：74）。来自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挑战，对女权主义假设的一致性和普遍性提出了质疑，并且指向了一个更为分化的转型政治。正如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等人指出，人们不再相信女性的“全球的姐妹情谊”（global sisterhood）（Morgan, 1984）。女性被假定有一种跨文化的连贯性与一致性，但她们显然并没有。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长久以来取得进步的路径与西方女权主义大相径庭。种族渊源、乡村与民族主义问题，比支配西方女权主义许多方面的“个人政治”问题更大。因此，黑人女权主义和工人阶级女权主义表明：即使在西方，女权主义也是一个具有许多房间的大厦。这些女权主义的观点并不能简单地被归入标准西方文本中的通用标签之下，诸如“自由”、“激进”与“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不能被如此轻易包容的差异。她们并不仅仅是一个充当一种有益比照的遥远、陌生的“他者”。

西方白种人的女权主义,在起初确实尝试通过建构“第三世界女性”的整体范畴,去边缘化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女性。这种做法使差异均质化,并最终消除之。钱德拉·莫汉蒂非常详尽地展示了“西方女权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著作如何使用多种方法,去证明男人支配与女人遭受剥削的普遍的跨文化机制”(1993: 208—209)。在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常被看作是男性暴力的无助的受害者,在性别、种族和阶级关系上有依赖性,并且附属于家庭和宗教意识形态。第三世界女性处于各种各样的压迫之下,她们被看成是没有发言权、无主动性,几乎没有历史,并常常已经被殖民化。最近一些关于性别、发展和后现代主义之间表面关系的文献已经对这种公然的民族优越感提出了挑战。针对“非西方”人民的家长式统治,在启蒙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毫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家长主义已经渗透进很多西方女权主义之中。然而,如今在第三世界,女性开始确立自己的议事日程,这只能从整体上巩固女权主义(因为能够有一种多样性的统一)。⁹⁶

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崛起,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内部广泛的辩论和裂变过程的构成部分。例如,在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强调“平等”的地方,新的后现代女权主义话语强调“差异”。先验理性(transcendental Reason)的信仰,正让位给一种更多的是在文化上定位的对人们的职位和发展可能性的理解。大规模的关于政治转型的思想和政治规划缺乏可信性,甚至失去了吸引力。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理论广泛的范式转换的部分。然而,仅凭事后之见,人们也很容易地看到新的虚假的两极对立如何被建立,这是一种只得分开的二元对立。琼·斯科特(Joan Scott)雄辩地主张,应该以一种的确建立于差



异基础上的平等的名义,拒绝平等/差异的对立:“对立本身隐含了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依存,因为平等不是差异的消除,差异也不会妨碍平等”(1990:138)。

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伟大的女权主义的口号“个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实际上已经事与愿违,因为新的“认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已经“意味着女性不仅发现她们有很少的而不是更多的共同点,而且发现在妇女的运动中谁拥有最‘真实的’声音的意愿中所形成的一种苦痛的发展”(Whelan, 1995: 129—130)。“从个人的立场说话”的新观念,确实能够变成不去反抗等级制、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和其他压迫形式的借口。从一个美国妇女集体的声明中,我们能够捕捉到一种新的基调:“这种对我们自己受到的压迫的聚焦体现在认同政治的概念之上。我们相信,最为深刻的和可能最为激进的政治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认同,而不是努力终结别人的压迫”(Comabhee River Collective, 1981, cited in Adams, 1994: 345)。这一基调不但相当地容纳了确立20世纪80年代大部基调的新右派猖獗的个人主义,而且重返旧的本质主义,似乎“经验”是明确和透明的事物,“权利”政治将自发和自然地从中流淌出来。

现在,超越“平等”和“差异”等此类对立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从一个后现代的观点来看,“平等”的观念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假定它是正在被处置的平等;而从一个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平等只是意味着被男性规范同化。“平等”并非“无害的”(innocent),并不意味着一个后现代女权主义背离公正。即使那些强调差异以反对盎格鲁血统美国人强调平等的女权主义潮流,也确实力争“一种正义的差异概念,这种概念

被看作是根据人们发现的任何重要的差异去形塑自我的一种平等的自由”(Buck and James, 1992: 7)。从这个观点来看,性的差异并不能被归入一种乏味的性别平等观念之中,或者换一种说法,性别中立并不能导致正义。实践上,诉诸无差别的平等或无差别的差异,都不能满足要求。从各种各样的女权主义(包括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平等无疑需要解构。但是,正如莫伊拉·纪登斯(Moira Gatens)论述的,“把‘差异的女权主义’理解为‘平等的女权主义’的对立面,将会遗失全部重点”(1992: 135)。承认差异的多样性,将会为更为多元化的转型政治打开大门。



98 第六章 上层建筑的复仇：马克思主义与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中，从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依赖的、被决定的和从属的部分（经济作为“基础”），到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甚至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中——的中心位置，文化已经取得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进展。本章从卡尔·马克思本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研究着手，同时强调其留下的不甚明确的遗产。然后，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在俄国革命后企图建立的社会主义文化，包括苏维埃无产阶级文化运动（the Soviet Proletkult movement）。随着文化被用于阶级斗争的战斗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任何歧义都烟消云散了。接下来，转向安东尼·葛兰西，他从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监狱的牢房开始，就放弃了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中的文化主义转向早已开始，并且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影响。最后，本章转向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它们最终使文化摆脱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上层建筑已经开始了它的报复，但是，在当代社会中，这要将批判性的文化研究置于何种地位呢？

马克思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并非庸人,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文化有着很高的欣赏品位和能力,特别是对于文学更是如此:

在他的私人生活中,马克思不断展示文学美化、愉悦和提升人类存在的方式……他和孩子们一起读寓言、诗歌……他用几种语言高声朗读诗歌和话剧……他还用文学中的名字来刻画他的朋友……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和作为著作家和演说家的公众人物一样,马克思也不断地借鉴他所敬佩的前人和当代人的作品。⁹⁹
(Praver, 1978: 415)

实际上,普拉瓦(S. S. Praver)用了444页的篇幅来描写卡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的那种紧密的关系。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当然理解这个富有创造性的过程,他从来没有梦想过将其归结为非人的阶级或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文学品位非常传统,并且他可能不喜欢拉美“魔幻现实主义”(magical realism)作品,但他对文学的态度没有一丝的粗鲁、功利和简化。问题在于,文学,或更广义地说,文化,是否适应于马克思所阐发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更广泛的理解。

适应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文化,属于“意识形态”(ideology)的范畴。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写下了著名的断言:“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



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的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Marx, 1968: 182)^①。这是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并且在它最后宣言式的句子中预言了新的文化政治学的关注点。意识形态在此处并非仅被视为一种简单的错误知觉、幻觉或精明的资产阶级的诡计。然而，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并没有大家一致认同的或统一的版本，而且意识形态在其他一些地方还确实表现为一种对现实有缺陷的认知（见 Larrain, 1983）。但清楚的是，正如在上述段落中，马克思把科学或更广义的知识与意识形态并列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知识概念的真理性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正如它们受到的质疑一样明显。

福柯用几句话就摧毁了错综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争论：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对于我来说，很难去运用，其原因有三。首先，它仿佛总是作为虚假的东西站在可以称之为真理的对立面。现在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在科学或真理的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进行区分，而在于**历史地**审视真理效果是如何在本身既不真也不假的话语中产生的。（Foucault, 1980: 118）

100 当我们在思考自然科学，如生物工艺学，和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密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联系时,科学/意识形态的对仗即使在其自身的措辞上,也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当然,福柯的反对意见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消除掉了所有那些假定享有特权的盛行观点的根基,无论主张那些观点的人是白人、男性或马克思主义者。认识论的驱逐,也许并不像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几乎脱口而出的评论所意指的那样简单。然而,这是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信条的非常有效的批判,即对其科学性要求的批判是非常有效的。

重要的是记住:阿尔都塞已经开始“怀疑艺术是否应该或不应该归入意识形态范畴之中,更准确地说,艺术与意识形态是否为同一事物”(1984: 173)。令人庆幸的是,他的结论是:“我们不把真正的艺术归入意识形态之中,尽管艺术确实有着同意识形态极其特殊的关系”(同上)。这种“真正的”艺术,与“普通或平常的”艺术是不同的,它并不寻求替代“科学知识”,而是帮助我们去“看”或“感知”。根据阿尔都塞所论,我们看到的、所感知或知觉到的东西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正是非大众性艺术的源头。阿尔都塞也赞扬了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他是“才智过人的”)的批判性分析,尤其赞扬这一分析,是文学“巨匠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超出意识形态的羁绊,或走出在一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熏陶着他们的意识形态。在其作为人与意识形态“活生生的关系”的意识形态概念中,阿尔都塞摆脱了机械的马克思主义。他使艺术脱离科学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的愿望,也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阿尔都塞仍然受困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建筑的类比。

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书中,雷蒙·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写道：“任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研究，必须首先思考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假设”(1977: 75)。对于马克思而言，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Marx, 1968: 182)^①。在传统的以理性为中心的策略之中，一方面是经济/现实/物质/基础/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是非经济/非物质/被决定因素。不管马克思希望还是不希望，基础/上层建筑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特别是涉及到文化分析的内容时尤其如此。因此，特里·伊格尔顿——不管从哪方面说他都是一位机械唯物主义者——写道：“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艺术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我们后面会讨论其限制条件)”(1976: 5)。这些条件的问题——正如经济基础“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唯一)决定因素的观点——是那一单独的时刻似乎从来没有到来。

当然，正是阿尔都塞最大限度地推进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并且对恩格斯(而非马克思)经济基础是“归根结底的”决定因素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被马克思常常描述为上层建筑的领域很明显存在着一种“相对自主性”。相反，阿尔都塞阐发了一种“结构决定”、“接合”的概念，最重要的是“多元决定”的观点。“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意指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有着复杂的因果机制，不能借助于任何“基础”归结为单向的因果关系。其后，像保罗·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斯特(Paul Hirst, 1979)一样的阿尔都塞从前的追随者们,抛弃了整个因果关系和自主(自主来自哪里?)的观念。实际上,阿尔都塞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以整体为基础的学说之批判,已经对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性文化研究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文学和电影的研究更是如此。正如巴雷特指出的,问题在于,“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塑,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逻辑结论”(1991: 45)。尽管阿尔都塞抱有“科学的”目的,他介入马克思主义所完成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从第二国际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就文化而言,例如,不再把文化看作是社会生产经济关系的简单“反映”。

很难过高估计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基础/上层建筑”的地形学类比,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可能性所造成的伤害。这不但是经济还原论问题,——经济还原论本身经受不住任何批判性的文化探索的考查,而且这也是把文化从所谓的社会物质生活中唯心主义地分离出来的潜在再生产问题。因此,像雷蒙·威廉斯所言,“作为一种构成社会过程的文化概念的全部可能性,产生特定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可能性很久以前就丧失了,并且在实践中常常被一种抽象的直线式的普遍主义所替代”(1977: 19)。并非如雷蒙·威廉斯那样走向“文化的物质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研究被艺术、风俗、宗教等纯粹的“观念”的观念所束缚与限制。我们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威廉斯所承担的事业与后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甚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机械学说相比,更符合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尽管后者在文学研究领域本身已经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概念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置于何处呢?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这样一种理论,但他零散的构想已经产生了一些十分可怕的结果。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是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据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说,他是一位“在极其不顺利的条件下努力构建一种系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人”(1976: 79)。在他的著作《一种即将灭亡的文化研究》(*Studies on a Dying Culture*)一书中,考德威尔看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所有分支都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危机,从艺术和哲学到生物学和物理学都是如此。甚至他的崇拜者都把他的主要著作《错觉与现实》(*Illusion and Reality*, Caudwell, 1973)视为某种程度上鲁莽和草率地试图创建一种作为源于劳动过程的经济活动的总的艺术理论。对于考德威尔而言,写诗的人不是个体的莎士比亚或华兹华斯(Wordsworth),而是人一类(man-class),或者一种基因类型(genotype)。在他的著作《浪漫与现实主义》(*Romance and Realism*, Caudwell, 1970)中,他转向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见本章的下一节),并且宣称革命的真理阻碍了“同路人”(fellow travellers),甚至指责在苏联像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这样的人“对作家自由的过分焦虑”,他们没有认识到,“对于一种社会转型来说任何必需的方法,艺术也同样需要”(同上: 132)。考德威尔在西班牙同法西斯的战斗中死去,这既象征着斯大林主义的高峰,也象征着低谷。

根据伊格尔顿(1976: 86)和米哈伊尔·利夫希茨(Mikhail Lifschitz)两位学者的观点,另一个“分析马克思的美学观与其一般理论二

者之间关系的强而有力并且新颖的研究”也同样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利夫希茨是一位俄国评论家，他试图指出马克思的矛盾分析法的相似之处：矛盾存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二者之间，也存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其艺术成就之间、技术与艺术之间、科学与诗歌之间、巨大的文化可能性与贫穷的精神生活之间”（Lifschitz, 1973: 106）。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也在于创造一种非异化的普遍文化。对于利夫希茨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艺术发展观是十分明确的：“艺术创造性的衰退同资产阶级文明是分不开的”（同上：99）。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深知新一轮的艺术进步只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开始……只有到那时，所有此时被资本主义压迫的力量才能够解放出来”（同上：114—115）。总的说来，利夫希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说主张，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无产阶级将会解决人类文化发展的矛盾。

103

毫无疑问，正是伊格尔顿自己，试图建立一个最为一致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已是对马克思的明显背离）。对伊格尔顿来说：

理解《李尔王》（*King Lear*）、《群愚史诗》（*The Dunciad*）或《尤利西斯》（*Ulysses*）……不限于解释它们的象征意义，不限于研究它们的文学历史和为它们之中的社会学事实添加注脚。首要的是理解这些作品和它们栖居于其中的意识形态世界二者之间的复杂迂回的关系。（1976：6）



马克思主义文化评论家需要仔细检视产生文化产品的历史条件。这与把一种文学或者文化仅仅看作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同,后者是一种伊格尔顿渴望摒弃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形式。追随卢卡奇的观点,伊格尔顿主张,“在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恰当的形式,而非抽象晦涩的内容”(同上:24)。于是,文学形式的发展,例如小说,可以追溯到意识形态上的转变,这种转变产生了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法,也产生了文化与社会二者间的新关系。最后,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和文艺批评强有力的检讨的结束语:“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不只是一种解释《失乐园》或《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①的新技术。它是我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一部分,这就是它之所以值得讨论的原因”(同上:76)。

无产阶级文化运动

列宁说:“每一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有权根据他的理想自由地创作。但另一方面,我们共产主义者不能只是懒散的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放手让各种复杂的事物自由发展”(Solomon [ed.], 1979: 166)。马克思本人的文化观是自由的,而列宁的文化观则是非常实用的。例如,“当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维持乡村最普通的学校时”(同上),为什么苏联为莫斯科大剧院提供昂贵的补贴?在这种环境下,在俄国革命之后,一种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文化运动的产生是丝毫不令人吃惊的。这种运动的目的是铲除所有资产阶级的

^①《米德尔马契》是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的一部作品。——译者

成分,创造一种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1920年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鼎盛时期,无产阶级文化组织有大约84 000名成员,出版了富有影响力的评论杂志——《无产阶级文化》(*Proletarian Culture*),并在全国范围104
内组织了大约300个写作组织,控制了小城镇中成千上万的业余剧团和剧院。这一运动对“布尔什维克化”文化的影响有多成功?利夫希茨准确地说明了“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一种在更广泛与更高的基础之上的新的艺术复兴,奠定了必要的基础”(1973: 101)吗?如果不是如此,原因何在呢?

1917年俄国革命导致了文化领域的巨大动荡。奥西普·布里兹(Osip Briz)是未来学家中主要的理论家之一,他论述了新艺术如何同资产阶级的艺术彻底决裂,新艺术如何形成崭新的、史无前例的艺术,未来学家如何同无产阶级并肩作战(Struve, 1972: 20)。伟大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将其命运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并极力赞扬这场革命。尽管列宁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讽刺西方的作品和其反官僚的长篇大论,但整体上他更喜欢老派的普希金一伙。除了未来学家之外,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组织是为了培育一种特别的无产阶级文学。它的精神领袖是波格丹诺夫(Bogdanov)。在革命前,列宁还曾经与他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哲学辩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于波格丹诺夫来说,文化行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位苏维埃人民教育(或“启蒙”)委员会委员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i Lunacharsky),尽管同情未来主义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但他在1919年警告极左文化派:不应该对过去的文化持完全否定和替代的态度,并且当其仅是一种艺术潮流时,不应该试图使其为政府说话(同



上：29)。

正是这最后一点——隐含着挑战布尔什维克的霸权——引起了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愤怒。在1920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声明，其中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外衣下，工人在哲学上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观念(马赫主义)，在文化领域中荒谬、腐朽的味道(未来主义)开始获得赞同者”(Vaughan James, 1973: 114)。新的“无产阶级诗人”的技巧和方法是象征主义的派生物，伴随着大量的浪漫英雄主义，但这对于一个处于被包围状态的国家，几乎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正如中央委员会已经使之明确的，未来主义的“颓废者”、“理想主义者”和“脱离社会主流者”似乎正引导着“继续‘独立存在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但如今则是苏联政权的‘独立’”。而托洛茨基本人反对党完全控制艺术，并且也反对特定的“无产阶级”文化

105 概念。然而，托洛茨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的概念是相当机械的，把艺术仅仅作为社会秩序的消极反映，把人民文化的发展推延至未来不确定的时刻，即直到他们“追赶上来”并且阶级已被废除的时候。

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倡议下，1925年形成的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the Russian Association of Proletarian Writers)，致力于俄国文学“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ing)，但与无产阶级文化派不同，它强调需要“向经典学习”。随着俄国农民被强制集体化，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坚持在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对于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重要人物利奥波德·埃瓦巴赫(Leopold Averbakh)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创造出与新的生活方式相一致的艺术，因此在文化领域，和在乡村一样，也要求进行阶级斗争。到1929年，斯大林鼓励俄国无

产阶级作家联盟去吸收“同路人”——那些非共产主义者但却支持共产主义的文化工作者——从而净化文化领域中的“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文学必须为“五年计划”服务。作家变成了“突击手”(shock workers)。直到1932年,这种极端的情况才得以被修正和批判,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被勒令解散了。尽管从表面来看,在文化领域中已经采取了较为温和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类型的政策,但实际上,党的控制力却加强了。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措施中,现在仍然会发生一些不幸的插曲。

尽管列宁在1905年仍处于流放之中,但他已经提出了党的新闻与党的作家需要一个政党路线的问题。这些构想是无条件的:“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无党性写作者滚开! 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引自 Vaughan James, 1973: 104)^①。与一切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妥协相反,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需要“党的文学”。但是这并没有粗鲁地要求对所有的文学艺术进行审查:“[列宁说]安静些,先生们! 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引自同上: 16)^②。列宁是否会同意,现在无可考证,但是在1928年至1929年左右,布尔什维克党利用列宁这些早期的主张,把文化工作者在党的绝对命令之下处于一种

①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② 同上书,第95页。



赤裸裸的从属地位合法化了。到1932年,党的法令“清除掉了”所有现存的工人组织,建立了由国家管理的单一机构,即声誉不佳的苏维埃作家联盟(Union of Soviet Writers)。从此,所有作家在专业上、意识形态上与道德上均在此联盟的控制之下。

106 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接管了文化领域时,它当然需要约束“同路人”的纪律。在1929年,由邱石克(N. Chuzhak)编辑的题名为《事实文学》(*Literature of Fact*)的书宣称,虚构的文学只是“人民的鸦片”,与之相反的是事实文学,后者能够使文学变得“具体化”、“活跃化”与“合理化”(Struve, 1972: 216)。艺术对于鼓舞人心没有任何作用,它仅仅是一种要去学习的技巧。在1939年苏联作家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后来举行了多次会议),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不带任何讽刺意味地宣称:“我不写小说,但如果我想写的话,我认为可以向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学习如何写,而不是向乔伊斯学”(引自同上,1972: 275)。这一时期的口号是“社会命令”(social command),这句口号意味着艺术必须“反映”社会现实并且“激励”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位知名作家,高尔基(Gorky)在这一时期组织了大部头的名为《工厂历史》(*Histories of Factories and Plants*)的一套著作,其中一本“赞扬了”连通波罗的海和白海的斯大林运河的建造,但这条运河建立在强迫普通刑事犯和政治犯劳动的基础之上。当然,这对这种类型事业的创造性与文化自由的影响是巨大的。

随着文学成为国家的婢女,新文化人民委员们的自信也不断增长。在引人注目的苏联作家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新文化的最高领导人日丹诺夫在其就职演说中自豪地宣称:“我们苏维埃文学不惧怕倾向性的指

控。是的,苏维埃文学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在阶级斗争的岁月中,一种无阶级、无倾向性并企图中立的文学,不会也不可能存在”(引自 Struve, 1972: 261)。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已经获得胜利,苏维埃文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最进步的文学。苏维埃文化是“乐观主义的”,因为它同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日丹诺夫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成为“人类思想的设计师”,为人类提供具有启发意义与英雄主义色彩的故事,而不是误导人们走向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这将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哲学——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它“客观地”描绘现实,引导大众去理解历史以及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在1934年,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对创作“国防文学”的需要给予了特殊关注,这种文学鼓吹光荣的红军战斗精神。从那时起,文学开始为人民、政党和军队服务。

甚至对苏联文化恐怖主义的左翼批评家来说,总是如此不明显的是这种趋向控制的深层性心理的蕴含。梅纳德·索罗门(Maynard Solomon)是理解其观点的批评者之一:“不可避免的是,日丹诺夫和拉狄克1934年诉求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恰巧与取消自由堕胎和离婚法相一致,与反对同性恋的严格法律条文相一致,与逮捕大量知识界中的同性恋者相一致——这些同性恋者被谴责与纳粹分子罗姆(Roehm Nazis)①串通一气”(Solomon, 1979: 239)。日丹诺夫主义成为反抗所有“非理性”形式的一个狂热支柱,这种非理性形式意指与“正常人类情感”的任何偏离。不但“妄想狂”、“精神分裂者”和强盗被攻击,而且“皮

① 罗姆(Ernst Roehm),德国纳粹军人,同性恋者。——译者



条客”、“通奸者”、“歌唱团女演员”和(非常有趣的是)“流氓”也是被攻击的目标。因而,毫不奇怪,在1934年的代表大会上,拉狄克恶毒地攻击了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因为作为拥有低劣人生观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精神病人的幻觉”和“心智失常的胡言乱语”——“没有伟大的事件,没有伟大的人民,没有伟大的思想”——他的著作只是“一堆牛粪,爬满了拥挤的蠕虫”(引自 Struve, 1973: 173)。因此,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在世界文化上也烙下了它的思想的痕迹。

当斯大林主义对苏联社会进行严密控制之时,它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文化进行控制。在1946至1949年间相继出台的党的法令意味着:

苏联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国家恐惧之中,对于作家的政治要求如此过分,以至于甚至破坏了文学的宣传价值。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需要忽略掉苏联战后严酷的现实,取而代之的是描绘物质丰富和社会和谐的美好图景。(Hayward, 1983: 65)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已经变成一种国家对文化实现官僚与行政控制的直接手段。即使考虑到冷战时期批评家对苏联国家控制作家的敌对态度,这种情况事实上也是很糟糕的,并且也只是对马克思文化观念的一种拙劣模仿。据说是斯大林自己在参加高尔基公寓中的一个艺术晚会时,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个词语。在这个晚会上,他介入并终结了一种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具有强烈倾向性的现实主义”和

“永恒性现实主义”支持者之间的争论：“如果艺术家想要准确地描绘我们的生活，那么他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不可能不反映生活中引导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这就将是社会主义的艺术。它也将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Vaughan James, 1973: 86）。

当苏维埃文化走向衰落时，它的很多极端的鼓吹者被处决，或作为“托派分子”或“犹太复国主者”或无论什么的代理人被控告，很少有声音来谴责这场文化恐怖运动。许多国外的“同路人”觉得最好是支持事物的发展，无论有何理由。卢卡奇在20世纪50年代确实隐晦地批评了这个政体，这个批评颠覆了马克思不均衡发展¹⁰⁸的观点，声称苏维埃的文化发展不幸地滞后于强有力的经济发展。然而，正如亨利·阿尔冯（Henri Arvon）所说，“卢卡奇立即被强迫收回了他的陈述，并且以一种非常带有羞辱性的方式，因为他被迫把他当时描述的观点归于缺乏对于苏维埃文学的认识而产生的错误判断”（1973: 93）。1946年中央委员会对文学的声明中表明，国家对文化的控制和意识形态对艺术形式与技巧的控制达到了顶峰：“苏联文学的功能在于帮助国家正确教育年轻人……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事物都需要培育……‘为艺术而艺术’，与苏维埃文学是不相干的，并且对于人民的利益和苏维埃国家的利益是有害的”（引自 Arvon, 1973: 91）。

葛兰西主义的转变

从日丹诺夫主义（Zhdanovism）令人尴尬的暴行，我们可以转向由安东尼·葛兰西给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争论带来的新鲜空气。从一种封闭的企图（大部分是成功的），我们转向开放的渴望（最终是成功的）。



与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的所有形态相反，葛兰西开始代表一种开放的、流动的、几乎没有“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他的分散的、难懂的、几乎用隐秘的语言写成的狱中札记并不等同于一种“葛兰西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我不同意芮乃特·赫鲁伯(Renate Holub)(在一部论述葛兰西“超越”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非常有名的著作中)的断言：葛兰西的“研究纲领”是“为了创造一个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1992: 40)。葛兰西产业(the Gramsci industry)^①已经生产出各种各样的葛兰西，但并非所有这样的“葛兰西”都是合理的版本。葛兰西也已切实被用于证明特殊的政治或文化态度。但在所有的“葛兰西”和葛兰西主义中，存在着一种理解，那就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文化，而且对于人们如何生活，如何反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压迫，只给出了一个机械的概念。正如我们很快将会看到的一样，葛兰西马克思主义的可塑性，或许必然地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垫脚石。

109 安东尼·葛兰西与死板地用基础/上层建筑类比分析社会生活的机械马克思主义倾向彻底决裂开来。葛兰西认为：“这种观点是作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假定提出来：每一种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波动都能够被提出并阐述为一种结构的直接表现。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把这种观点作为人类原始的幼稚病来驳斥，在实践上给予痛击”(1971: 407)。在批判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大众手册》(*Popular Manual*)时，葛兰西十分明确地反对后来把马克思思想渲染为“科学的”马克思权威的主张。葛兰西嘲笑那种试图把马克思归结为寻求新“马克思—列

① 指对葛兰西的研究。——译者

宁—斯大林主义”的实证主义“所谓的规律”。必然性和决定论并不是葛兰西所喜欢的术语。尤其是在明确地反对经济主义中，葛兰西提到了布哈林的著作：“在《大众手册》中最为明显的老式形而上学的痕迹之一，在于尝试把一切都还原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或最终的原因”（同上：437）。葛兰西把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最终”起决定作用，恰当地比喻为试图“寻找上帝”的漫漫长路。

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矛盾论的一个方面，即人们熟知的以“肯定的”意识形态观来反对“批判的”意识形态观（见 Larrain, 1983）。对葛兰西来说，意识形态既不是一种“幻觉”，也不是一个经济过程的简单“反映”。相反，它首先是一个斗争的领域，它是政治斗争的基本场所。葛兰西有效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哲学”，它指的是关于世界的概念的有组织的集合；“常识”，他借此指的是特定社会阶级与群体的生活文化。因为意识形态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基础”之上所发生一切的虚幻再现，葛兰西得以自由地去优先考虑思想与文化上的政治斗争。正如米歇尔·巴雷特提出：“葛兰西把现在一般所谓的‘意识形态斗争’看作本身在政治上是有效的和重要的”（1991：28）。他对“常识”或大众文化的理解通常是细致入微的，他承认，尽管这些常识包含着“意识形态因素”（在否定意义上），但它们也包含着很强的“正确判断力”（good sense）。从这个斗争领域中究竟产生出什么东西，首先依赖于特定机制，而不能被事先预定。

毋庸置疑，在由此得出的葛兰西的概念之中，最中心的并且是最有影响力的概念是“霸权”（hegemony）这一概念。葛兰西认为，没有任何统治阶级能够单独依靠强迫来统治。简单地说，对葛兰西而言，“ege-



110 monia”[霸权]指的是社会上赞同的社会与文化组织：“如果统治阶级已经丧失了它的赞同，它就不再‘领导’，而只是‘统治’，单独地行使着强制力，这恰恰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已经脱离了其传统的意识形态”（Gramsci, 1971: 275—276）。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既定的社会群体的霸权，是借助于市民社会中广泛的机构来实现的，例如学校、教堂、新闻媒体，甚至工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概念不但已经同样处理了列宁所关注的国家权力的强制因素，而且也为社会转型的一种文化纲领奠定了基础。如果在列宁的俄国，一种“运动战”（war of manoeuvre）可能是适当的，但在葛兰西的意大利，更需要一种“阵地战”（war of position）。一个主张在类似于壕沟战的政治行动中夺取政治权力，而后者转向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赢得“情感与理智”的细致分析，并强调需要广大群众围绕一个转型计划达成广泛共识。

或许被最为创造性地采纳的葛兰西的思想是有关“民族—大众的”（national-popular）学说。尽管葛兰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阐述了这个思想（见 Forgas, 1984），但这个对仗词一般是指一个统一民族和大众志向的社会“历史集团”（historic bloc）形态。它不仅构成了社会转型的文化政策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一种“后阶级”（post-class）大众民主斗争的更为直接的政治策略的基础。因此，它是资产阶级霸权得以运行的场所，也是大众霸权将被建构的场所。比如说，葛兰西认为，我们需要理解天主教的所有复杂性，而不是希望简单地通过一种世俗的、社会主义的霸权计划清除它。他也明白：“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所扮演的角色是使民族大众文化的落后特征‘霸权化’……并且把它重塑进一种具有真正的群体基础与支持的反动民族形式”（Hall, 1996b: 439）。斯

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吸收了这种关于民族—大众的细致的、开放性的观点。霍尔在他对“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的创造性分析中贯彻了这一观点:撒切尔主义抓住了一些大众的诉求,同时拒绝轻易地选择经济转型的“虚假意识”或“反映”。

根据目前著名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这个研究领域的丰富成果来看,葛兰西是一个分水岭。正如霍尔回忆道,在他对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兴起的解释中,尽管葛兰西属于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他在文化研究中彻底取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研究遗产的程度”(Hall, 1996a: 267)。我们已经看到,在与机械的基础/上层建筑区分的决裂中,在理解政治与意识形态/文化领域的自主性方面,葛兰西已经离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家有多远。已经兴起的新文化范式尤其聚焦于特殊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¹¹¹、他们的“常识”和他们的能动性。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中,意识形态被看成是去“质询”(interpellate)(赞扬或是讨论)一个“主体”,但是,正如理查·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提醒我们的一样,这个“主体”从来不是赤裸裸的:“在一些结构主义的文本之外,单一的、基本的、原始的与无文化的质询的‘孤独时刻’‘从未出现过’。意识形态总在一定背景下发生作用:这种背景就是文化”(1979: 234)。文化研究后来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了制度化与非政治化(见Davies, 1995),但如果它只是提醒我们这一点,那它应当非常有助于对文化和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在其他的繁荣的研究领域——后殖民研究中,葛兰西也是一个关键的人物(见Ashcroft, Griffith and Tiffin [eds], 1995)。后殖民研



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85)^①,该书考察了西方如何把东方建构成知识和统治的对象。《东方主义》揭示了西方文化如何“表现异域文化,最好是精通或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它们”(Said, 1985: 120)。《东方主义》的中心是葛兰西主义的“霸权”概念和知识分子在建构和再生产这种文化中的作用。萨义德发现,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的霸权话语,一个“文化和政治的事实”。尽管意识到“不断提醒文化受到政治的烂泥的污损已是粗暴地反传统”(同上: 210),但在《东方主义》中尤其是在随后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一书中,萨义德已经开始以促进两个领域的紧密合作去填平这个巨大的鸿沟。因其制造了一个过度庞大、整体化的或过度霸权的后殖民话语观念,同时也因为忽略或轻视动力或抵抗,《东方主义》已经遭到了批判。尽管如此,它几乎单独地把后殖民主义带到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新批判性文化研究领域的前沿。

另一个与“葛兰西主义”相关的研究领域是“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这种研究兴起于印度,但也在拉丁美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底层研究小组(the Subaltern Studies Group)来说,葛兰西的底层概念“在南亚社会被视为臣属的普遍特性的称谓,不管这个称谓是根据阶级、种族、年龄、性别和官职,还是根据任何其他方式”(Guha [ed.], 1982: vii)。殖民地的历史总是忽视人民的政治,尤其是底层的活动。底层研究途径强调文化的自主性、真实性和意识,因此这是非常明显的

① 中译本名为《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译者

葛兰西主义传统。尤其是对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而言,底层研究计划已经揭示了,在印度大众文化和反抗意味着英国殖民计划从来也不是真正的霸权(同上)。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批判和扩展了底层研究计划,不但关注于知识-权力的对偶体,而且直接把性别引入了这种批判的研究领域。她的力作《底层可以发言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 1993)关注南亚的底层女性人物,她们的矛盾处境在于被殖民主义和传统父权制来建构与控制。当然,在萨义德和斯皮瓦克那里,福柯日益增大的影响力,使我们的论述超越了“葛兰西主义转向”(Gramscian turn)。¹¹²

从国际上来看,葛兰西的思想在拉丁美洲可能最有政治影响(与学术上的影响相比)。在西班牙对葛兰西更早的接受是部分原因,而且在葛兰西正探索的问题类型和拉丁美洲的现实之间显著“一致性”也是一部分原因。何塞·阿利柯(José Aricó, 1983)和胡安·卡洛斯·波坦蒂罗(Juan Carlos Portantiero, 1988)的著作是把葛兰西引入了拉美进步人士之中进行政治斗争的范例。葛兰西主义的消极革命、历史集团、霸权与市民社会概念指导了整个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探索。拉丁美洲现代化过程的违反常规的、实际上是“后现代的”本质,证明是应用和发展葛兰西的概念的一片沃土。在文化领域,葛兰西的影响也同样重要,例如内斯特·加西亚·坎利宁(Nestor García Canclín)最近论述“混合文化”(hybrid cultures)的有影响力的著作(1995)就体现了这种影响。因为政治实践现在已经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所以我们感觉葛兰西的影响可能会更为强烈。在为发展和民主公民权创造条件方面,文化领域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经常在葛兰西或显或隐的迹象之下,



不断导致形形色色的新争论。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中,对葛兰西主义转向的粗略解释的圆满结束,可能有利于回顾所谓的“文化主义者”(culturalists)和“结构主义者”(structuralists)二者之间的公开论战。就马克思的遗产而言,“文化主义者”(比如汤普森[E. P. Thompson])会把重点放在人民“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之上,而结构主义则会强调“他们没有条件自己创造历史”的因素。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是强调活跃的阶级形成过程和意识动因:“工人阶级并没有像太阳一样在指定的时间升起。它是由其自己造就的”(1970: 9)。但是,结构主义者会指出,在这个阶级文化发展的叙事中,比如工人阶级的规模和构成等,缺乏基本的目标协调。尽管可能通过指出结构与能动性(structure and agency)(换言之,即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明显的“辩证”互动关系来结束这种讨论,但事实是,汤普森(和雷蒙·威廉斯)帮助界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种关键性的缺失。汤普森关注文化、价值观和思想,同威廉斯聚焦于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一道,代表了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极大丰富。同时,结构主义者正在变成“后结构主义者”。这是我们下一节的主题。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

如果葛兰西正式把文化带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语汇之中,那么后现代主义似乎把其置于一种显要位置之上。正如最近亚当和艾伦(Adam and Allan)在后现代主义之后尝试从理论上概括文化时所说,在这个“一切均是后现代”(post-everything)的时代,“‘文化’这个词……似乎

出现在任何地方,它的含义延伸到了这一点,即试图界定非文化事物十分困难”(1995: xiii)。马克思主义,并且还有大部分社会科学,已经忽视了文化,而现在后现代主义者似乎宣告了社会的死亡与文化的统治。因为文化以前是,现在也是一个广泛的、不断包容性的概念,这种概念的不断膨胀倾向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但文化已经在关键的社会分析中赢得了一种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人(比如鲍德里亚[Baudrillard]),他们主张“一切”都是文化。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尤其是与雷蒙·威廉斯和斯图亚特·霍尔这样的人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转向故意地远离政治。然而,这并不足以对后现代文化研究作出“文化主义”和“非政治”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下意识反应(比如卡利尼克斯[Callinicos])既使马克思主义贫困化,又使后现代主义中的反动倾向更为泛滥。

在很短的篇幅内总结后现代文化理论的主要原则,恐怕是不可能的;确实不可能掌握其风格,但一些主要思想是足够清晰的。可能最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暗示着不信任“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比如财富创造或工人革命。以科学为基础的所有进步范式也都被视为可疑的而遭到拒绝。通过拒斥基本真理和总体知识,后现代主义转向了“地方”或局部的知识,这种知识形式强调开放性、非连续性和反思性。后现代主义者也拒绝刻意的中立的表现语言,把其视为典型的现代主义。世界并不仅仅就是在那里存在——“客观现实”——等待被表现。伯恩和拉坦西(Boyne and Rattansi)论述了“一系列的表现危机,其中界定、占有和重构艺术、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语言对象的旧有方式已不再可信”(1990: 12)。对象和语言之间的界线似乎已经消除了,我们现在更倾向



于采用一种对待事物的“视角式”(perspectival)观点。理性(Reason)的普遍性——是马克思作为其中部分的启蒙思潮的基础——似乎已经遭遇到了障碍并消融于相对主义之中。

和文化有关,后现代主义拒绝接受以艺术家创造性的天赋为基础的、独一无二的艺术理念。尤其是鲍德里亚认为,没有什么真实或原创,我们只有仿真,我们只能复制。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通常共有的、存在于“高雅”和大众艺术之间的界线消失了。现实与影像(image)之间的界线逐渐消失了,影像和仿真(simulation)有了自己的生命。这并非都是自由的游戏和异质性,因为后现代主义也解构、质疑和瓦解传统的文化形式,比如它们高度的性别本质。文化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s)被视为掩盖了强势力量的偏袒与偏见。然而,这种颠覆性的因素至少与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指的后现代主义的“知觉模式审美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1991: 124)相匹配。战争、性暴力和饥荒的影像被无耻地作为商品出售给消费者的社会,政治与战争(比如海湾战争)简化为影像。这种美学变成了一种新的主要范式,所有的都是文化,一切都是话语,对现实、压迫和公正的所有感觉都消失了。后现代的文化理论因此能够颠覆其前身,但也可能像任何曾经存在过的意识形态理论一样是片面的。

通过后现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之间搭建桥梁的人物就是葛兰西。在我们目睹马克思主义崩溃之前,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至少在传统的形式中是如此。拉克劳(后来是拉克劳和墨菲一道)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独创性地和动态地研究葛兰西的学说,与阶级还原论决裂开来。拉克劳和墨菲论述激进民

主政治的著作甚至定名为《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1985)^①。正如我们在之前看到的,葛兰西已经阐发了一种非还原论的意识形态概念,同时他的霸权概念从根本上远离了经济主义。然而,他仅仅想当然地认为意识形态是“属于”阶级的,后马克思主义在构建其非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时将挑战这一假设。对葛兰西来说,尽管意识形态和文化并不能被化约或被解释为经济基础,但它们总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来说,是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如米歇尔·巴雷特指出:“葛兰西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是一个关键人物,因为他不仅代表着在马克思主义之内所能获得的最高成就,也代表着理论问题的内在局限”(1991: 63)。这导致拉克劳和墨菲承认“社会的不可能性”(作为一个统一的认识对象)和一种从阶级本质主义向关于性别、反种族主义、和平、生态等“新”社会运动的多元诉求的转变。

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福柯以及葛兰西的影响。福柯从科学对意识形态(*science versus ideology*)转向了知识和权力(*knowledge and power*)。福柯凭借其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和他的特定话语(*discourse*)概念,超越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对福柯来说,话语就是在历史的界限内,去限制我们或促进我们所写与所言的东西。然而,与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不同,他清楚地意识到了非话语的领域。他所做的是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二者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一切都是话语”,但我们不能以一种机械、

① 中译本名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



单线与等级的方式把词与物分离开来。福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极权话语”,它的科学性要求是一种统治的工具。和其他人一样,福柯拒绝宏大的叙事、宏大的理论与伟大的真理,他使我们的注意力朝向地方的、破碎的和底层的知识。文化——在人们如何生活、思考与表达的层面上——对福柯而言处于中心位置。文化抵抗出现在特定的斗争中,因为“人们不应该假定一种巨大和原始的统治状况,即一边是‘统治者’,另一边是‘被统治者’的二元结构……”(1980: 142)。

如果福柯甚至能够对一个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助益的话——就像普兰查斯在他最近关于权力的著作(Poulantzas, 1978)中体现的那样,那么德里达的影响看起来似乎更多的是破坏性,很少有可吸收的东西。德里达曾经公然宣布:“Il n’ya pas d’hors texte。”这句话从字面来看,就是“在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事实上,他所说的正是拉克劳和墨菲要说的,即“社会”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对象。社会作为一个自足与综合整体——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点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德里达不仅揭示了以基本原理和首要原则为基础的思想体系最终如何成为形而上学,而且揭示了“二元”对立为何总能够被解构。德里达认为,世界上并没有直接的、透明的和无媒介的知识。如马丹·萨路普(Madan Sarup)所言,“德里达想要强调思想和意识的文化上生产的特征(与自然上生产的特征相对)”(1993: 56)。意义不可能是绝对的,它总是一定语境下的意义,与相信意义固定的传统观点相反。在此处值得提一下第八章将要阐述的一个问题,即德里达后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主张,不同于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拒绝伦理选择、非理性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政治前景。

在简略地审视了后现代转向中的某些行动之后,我们或许能够回到后现代主义“是”什么这个话题。没有比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k Jameson)1984年那篇有影响力的论文(Jameson, 1991)讨论开始更好的选择了。这篇论文主要讨论的是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对詹姆逊来说,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型表达了该制度的一种更深层的逻辑。市场资本主义的产生导致了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而晚期或消费资本主义已经催生了作为其文化表达的后现代主义。因为商品生产扩大至全社会,并且不断加速,所以审美的创新和实验呈现了“日益重要的结构功能和位置”(同上:5)。这一新的主导或霸权的文化逻辑以“无深度感”(depthlessness)为特征,詹姆逊称之为“多元精神强度”(multi-phrenic intensities),这是指,虽然有破碎的形象和符号的文化狂轰滥炸,个人的身份认同断裂了。意识到他正在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詹姆逊主张,文化不再具有“半自主”的特征,相反,应该“根据爆发去想象它:惊人的文化扩张遍及了社会各个领域,指向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切……这种文化的扩张可以说使文化成为原初和仍未理论化意义上‘文化的’”(同上:48)。

令人关注的是,从此詹姆逊被指责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者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这并不令人惊讶,原因在于,他明确的试图追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消极后果和积极能力的诊断。更容易置疑的问题是他的(公认粗略的)资本主义的分期和他的(相当有魅力的)“黑格尔主义”。然而,据实而言,詹姆逊是根据一种无情的发展逻辑来观察历史,并且在他的叙述中,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契合几乎没有缝



隙。同样,尽管后现代主义(或当代社会)确实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但这不能与一个统一或整体的过去这个黄金时期相对照。说今天发达工业社会是被文化浸透,意味着没有被浸染的另外的过去或不同的社会。詹姆斯正努力去发展一个适合我们生活时代的新型文化政治学,但是
117 仅简单地“揭露”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的这种做法既可能最终被证明过于还原论、宿命论,又可能限制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分裂和不稳定的新纪元中需要去深思熟虑的各种选择。

综上所述,我所希望的前景,是后现代主义的后殖民地时刻,这一时代彻底离开西方中心,并记录下在后殖民地世界中衰落的文化角色。政治重又归于控制之下,滑向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在这个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的混合物中已经没有了位置。正如底层研究小组提出的,西方启蒙传统存在一个空间的相对化,一个欧洲的“大行政区划”(provincialization)。在日益重要的文化领域,文化的复杂性、混合性和调和性现在被看作是重要的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试图解构欧洲文化的主导叙事,而后殖民计划将拆除中心-边缘这种典型的帝国主义话语的二元对立。然而,与某些后现代主义普遍化(甚至欧洲核心地位)的趋势相反,后殖民主义表达了殖民地人民的呼声,并努力颠覆帝国主义话语和物质的影响。通过承认文化形式的多极化,包括那些种族、性别、性行为、宗教和家庭的话语,额外的收获是纠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中的经济主义。

后殖民运动至少是一种潜在的文化抵抗和重建的资源。然而,对它作为一个整体框架有各种严重的反对意见。当殖民主义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地区已经消失,为什么还以它为中心?拉丁美洲是后殖民

地吗？南美呢？对于阿济兹·艾哈迈德(Aijaz Ahmad)来说,在构建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后殖民主义自身承担起了殖民主义的责任(1992)。“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的奇特性,不是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理解中心化,而似乎是重申欧洲的历史时刻,并且把殖民主义从后门带了进来。当然,望文生义地简单使用“后殖民的”的标签去均质化处理“非欧洲”的文化经验,存在一定的风险。然而,如同后现代主义一样,我们需要区分后殖民地理论的各种形态,理解它们的矛盾构成。最终,如阿里·拉坦西(Ali Rattansi)所说:“即使对西方现代性和启蒙的权力/知识复合体进行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中存在着共性,后殖民主义也必须扮演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对立话语(*counter-discourse*)形式,对后现代想象和现代性想象去殖民化”(1997: 494)。



第七章 艰难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民族

对很多作者来说,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巨大的历史性失败。本章力图考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首先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那个时代具有紧迫性的民族问题的关注开始考察。其次是简略地考察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归根结底,这些运动是相互竞争的政治运动,并且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关于“民族问题”的激烈争论不仅仅是学究式的或深奥术语式的争吵。正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方面看到的那样,安东尼·葛兰西在民族主义方面也是一个创新者。但是我们在此强调的重点在于重要却被忽略的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统观念决裂的部分,这部分受到了20世纪之初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的影响。最后,我们转向对全部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传统局限的某些重要的后现代质疑。首先,我们检视在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民族问题观中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其次,我们概述民族问题产生的必然性。一直以来,这一问题被归入一种隐含的(如果不是明显的话)男性中心主义之下。

巨大的历史性失败？

正是汤姆·奈恩(Tom Nairn)强烈地主张,“民族主义理论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历史性失败。也许马克思主义也有其他的失败,并且一些已经被更多地讨论过……但仍然没有一个……像民族问题一样如此重要,如此基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是如此”(1981: 329)。这种宣称已经变成了被非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也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不言而喻的东西。这个断言有时主张或意味着,民族主义是如此基本,以至于如马克思主义一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会发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把握的。它也主张,马克思主义没能理解民族主义,原因在于它内在的还原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它的阶级本质主义——因此,在其中只看到了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攻击路线都建立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某种不可否认的特征上。然而,当我们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民族问题”的相互影响时,可能最好先考虑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具体的人,他们不是抽象的人,他们是政治家而不是社会学家。

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支持民族主义者的统一、自主、独立的强烈愿望,就是支持普遍流行的反对帝国和专制主义的自由”(Benner, 1995: 9)。对于那个时代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马志尼(Mazzini)和赫尔德(Herder)等人而言,民族国家的兴盛与民主制是同义的。1914年或1989年之后民族主义的消极内涵甚至还没有出现在地平线上。实际上,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那里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们对待那个时代各种各样民族问题在政治上的歧视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展示了他们对



待那个时代民族主义的一种规范的方法,把民主作为民族主义的指路明灯,后来国际主义也承担了这一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把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统一一致的实体进行分析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相信事实如此。正如埃里卡·本纳(Erica Benner)所写的那样,如果他们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独特(*sui generis*)现象,而不是把民族运动分析成建立在冲突的社会利益基础之上的独特的政治程序”,他们就不能把握新的民族政治形式与他们所提供的民主政治二者之间的差异(同上:10)。我们现在需要概述的正是这种歧视的、解构的民族主义学说。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统一的热心支持者,但他们并非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他们而言,德国统一是德国民主革命的初步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也同情意大利民族统一的进程:“除了波兰人,没有人曾经遭受到邻国的强权如此可耻的压迫,没有人曾经如此频繁,如此勇敢地努力摆脱压迫他的枷锁”(Marx and Engels, 1977b: 10)。此处我们获得了一种暗示,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来说,支持民族主义的要求并不是无条件的。相反,它与那个时代的大国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主导作用。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既不是共同的语言和传统,也不是地缘与历史的同质性,其本身就足以定义一个民族。相反,首先需要一定水平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且在总体上应服从于更大的需要。因此,例如在德国1848年割让领土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给丹麦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德国的作用是革命性的、进步的,并且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对丹麦进行战争。

在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中,人民已经通过他们为统一和独立斗争,

获得了建立强大的、切实可行的民族国家的权利。这些民族将会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明和进步的旗手。事实上,这是一种民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式。然而,哪个民族能够进入这个圈子仍然依赖于政治环境。因此,在1851年恩格斯能够写信给马克思,“波兰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民族”(Marx and Engels, 1982: 363)^①,而在1864年,他们把波兰人称作“一个被征服的民族,伴随着他们为反对压迫者而持续不断地、英勇地斗争,已经证明了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的历史性权力”(Marx, 1974: 380—381)。因此,统一波兰将会变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力推动的第一国际工人阶级的中心目标。民族自决权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远非是绝对的,并且,在每一个民族的境遇中,更多地是依赖或者是缺乏国际政治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当然,他们是实践的政治家,他们主要是通过行动而非理论的考量来引导民族问题。

与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如德国人相对照,恩格斯尤其发展了黑格尔的“非历史性民族”的概念。对恩格斯来说,“在历史过程中,这些民族遗迹被无情地践踏在脚下,正如黑格尔所言,这些人民的残余碎片总会成为反革命和残余的狂热旗手,直到他们被彻底地根除为止”(Marx and Engels, 1977: 234)。南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没有历史的民族,没有活力,将永远不会实现独立。当然,并不因为他们从本质来说是反动的,这个或那个民族或种族群体就漠然地对待1848年革命浪潮或加入一个反革命联盟。因此,巴斯克人(Basques)会加入与唐·卡洛斯(Don Carlos)的联盟,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



目的仅是去捍卫他们反对西班牙专制主义的民主自治权(*fueros*)。此外,¹²¹“民族生存”(national viability)的概念具有内在的形而上学意义,并且几乎很难符合民主标准。没有哪一个民族群体能够被宣判为历史的反革命垃圾,任何一种民主政治也不能像恩格斯在多个场合中所主张的,“通过最坚决地使用恐怖”来消灭民族群体(同上:378)。

这些历史性与非历史性民族的不成功分类也适合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之外的其他地方民族的著作。在由美国于1845年至1847年间发动的吞并了墨西哥广大区域的对墨战争之后,恩格斯论证说,这是出于“文明”反对“懒惰”与“绝望”的墨西哥人的利益。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文明进步的重要并且幸运的事实”,尤其是鉴于“贝都因人是一个强盗的民族”(Avineri [ed.], 1969: 47)。后来,恩格斯想要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抵抗表现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关于印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殖民主义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既发展了资本主义,同时也摧毁了一个文明——的态度也是十分微妙的。可能更带有一般性:即他们往往把欧洲以外的世界看成一种纯粹的反映,其自身内在的动力远远超越了他们的理解能力。因此,关于拉丁美洲,马克思在论述西蒙·玻利瓦尔这位独立战争英雄的文章中,似乎也同意黑格尔对欧洲大陆的判断:在其本质上是武断、荒谬与非理性的。于是,他不能在拉丁美洲“看到”阶级斗争,只能在玻利瓦尔那里看到法国拿破仑三世的一个第三世界的苍白版本。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似乎已经与历史性与非历史性民族二者之间不恰当的二元对立决裂了。在1867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了“爱尔兰的转折”:“以前我认为爱尔兰与英

国的分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这种分离不可避免”(Marx and Engels, 1971: 143)。马克思现在为爱尔兰所开的处方是独立、保护性关税和土地改革。以一种将来有一天被称为“依附理论”的微弱迹象,恩格斯写道:“每当爱尔兰将要发展工业时,它就会被镇压并重新转换成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同上: 132)。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武力统治已使该国转变为一个工业革命的农业与劳动力的储备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公然支持爱尔兰民族独立的民主运动。他们的立场总结为一种独一无二但却雄辩的警句:“任何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都在锻造自己的枷锁”(同上: 163)。似乎他们承认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和压迫者的侵略的、扩张主义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政治甚至阶级的差异。¹²²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与阶级斗争二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中,爱尔兰似乎代表了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在一场关于独立的爱尔兰地区与第一国际的隶属关系的论争中,恩格斯明确宣称:“在像爱尔兰这样的例子中,真正的国际主义必然建立在一个明确的民族组织基础上,爱尔兰地区的……(作为爱尔兰人)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确立他们自己的民族独立”(Marx and Engels, 1971: 303)。这种支持爱尔兰寻求民族独立的民主权利的响亮宣言,仍然(最终)依据的是其对英国和欧洲革命的影响而不是其自身权利。总体而言,我将同意乔治斯·豪普特(Georges Haupt)的意见:“尽管爱尔兰问题[原文如此]导致了统治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关系的一种原则性立场的定义,并允许赋予民族运动新的功能,但在革命理论之中拒绝毫无保留地概括、整合民族运动,仍然是很明显的”(Haupt, 1974: 19)。因此,看起来,在其民主和革



命的民族学说中,爱尔兰问题不仅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问题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标志着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理解的局限。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问题上留下了什么遗产呢?它可能并不像曾经被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失败”,尽管它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尽管生活在民族主义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却鼓吹国际主义,而且可能夸大或过高估计了其对世界的同质化影响。此外,正如保罗·詹姆斯(Paul James)指出:“马克思著作中像民族主义一样的意识形态经常会被归结为对真正的实在的想象或虚幻的再现”(1996: 69)。和对待宗教一样——马克思关于宗教的名言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常常认为民族主义是蒙在人民眼睛上的面纱,一种掩盖真正阶级斗争的虚假意识。民族主义属于主观的领域,而阶级等级则无论如何都是更为客观性的与物质性的现象。然而,马克思也能够分析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他运用了一种灵活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不会把民族特性归结为其经济基础。即使存在一种衡量民族进步的消极规范的尺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也会存在一种争取民主的一致承诺,作为理解特定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意义的试金石。

123 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

有时人们忘记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是政治对手,可以说二者“同类相斥”。因此,我们应当拒绝这种观点,即认为它们中一个是“科学的”、理性的,而另一个是“原始的”、非理性的。在这点上,我们不妨考虑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作的虽然幽默却是十分中肯

的分析,即关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赞成的民族主义的“错误地址理论”(The Wrong Address Theory)的分析:

正如极端的什叶派穆斯林所认为的那样,大天使加百列(Archangel Gabriel)犯了一个错误,他把本来应该给安拉的信息传达给了穆罕默德,所以说,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倾向于认为历史精神或人类意识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觉醒的消息本来是打算传给阶级,但是由于一些严重的邮寄错误把其传递给了民族。现在,革命积极分子说服这些不正当的信息接受者把信息和这些信息产生的热情,交给正当的与预期的接受者,是十分必要的。(Gellner, 1983: 129)

当然,这种分析严格来说并不精确,但是它能够捕捉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现象所表现出的根深蒂固的不解与敌视。如同第五章提到的“妇女问题”,我们经常发现共产党人试图去发现一些方法,即利用这些方法,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提供一种针对他们并不总是理解的顽固的社会现实的行动策略。

作为多种族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列宁呼吁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他的贡献即所谓的“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权”理论已经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03年,民族自决权已经作为对更具有“民族主义”立场的犹太工人组织——犹太工人联盟(the Bund)——的一种回应,成为布尔什维克理论武器的一部分。1905年的俄国革命,把民族问题更彻底地带到了布尔什维克政治的中



心。列宁对于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民族文化自治权要求以及被他视为对抽象的民族压迫的激进否定,均持反对立场。后一种观点是罗莎·卢森堡和在布尔什维克阵营中她的追随者所主张的。从根本上说,列宁鼓吹被优势的大民族压迫的小民族的民族自决(包括从中脱
124 离)权。然而对马克思来说,他更倾向于认为大的经济体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列宁对民族主义的支持是策略性的,是设计来削弱他确认是“民族牢狱”的俄国沙皇专制体制的。布尔什维克一旦掌握了政权,是不愿意把这些民族自决权付诸实践的。

关于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可以讨论的方面还有很多。我将从汤姆·奈恩的刻薄评论开始(和结束),这种评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所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支持和不支持民族运动的可行办法。它需要一种灵活的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立场(non-position),这将保持其选择的永远开放性。这就是列宁所提供的”(1997: 39)。列宁在他的政治实践中,当然认识到了民族问题的战略的重要性。他甚至在承认民族压迫的特异性问题上,开始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在一个非常有名的段落中,他提到了无产阶级如何“通过把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从而创造出消除民族压迫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有’——而且‘只有’——通过**在所有领域中建立充分的民主才能实现**……包括完全退出的自由”(1970: 130)。国家与社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全面民主化,包括了民族共同体的民主权利。在实践中,俄国尽管被相当程度的民族、特别是文化自决权缓和了一些,但其仍旧是一个“民族牢狱”。

正如在其所有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实践中一样,罗莎·卢森堡力图

拒绝在民族问题上的任何机会主义。对她而言,民族自决的“权利”的意义就像工人用金饭碗吃饭的“权利”一样。这种权利似乎对她来说是空洞的、不表明立场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说法,要不然,如果它暗示着社会主义者对所支持所有民族主义者的愿望负有绝对责任,它也是错误的和误导性的。在欢迎1917年俄国革命的同时,她相信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政策会导致俄罗斯的解体,并且为苏维埃国家积累麻烦。在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中,罗莎·卢森堡提出了由谁来决定一个民族退出意愿的非常中肯的问题:“谁是那个‘民族’? 谁有‘权利’和权威代表该‘民族’发言与表达该‘民族’的意志?”(Davis [ed.], 1976: 141)。在这一点上,卢森堡与她对隐含在列宁主义先锋党观念中的代表概念的批判是一致的。她也对非欧洲人民的观点(在她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中)非常敏感,并且还认识到:“工人阶级对民族主义的文化与民主的内容感兴趣,也就是说,工人们对于确保在民族生活中文化与民主的自由发展的政治制度感兴趣”(同上: 175)。¹²⁵

因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巩固对俄罗斯国家的掌控,所以它的注意力转向了传播革命之上。正统马克思主义指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国——的无产阶级。然而,列宁严重低估了“西方无产阶级对民族和民主价值的深深依附。民族和民主从历史角度来看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它们也征服和赢得了劳动大众”(Claudin, 1975: 60)。在西方遭受挫折的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把其目光转向了东方,并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民族主义在1920年巴库(Baku)举行的东方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First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上开始崭露头角。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领袖通过一个很难被



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讲话，试图说服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的领袖。季诺维也夫(Zinoviev)宣称：“兄弟们，我们呼吁你们进行一场反抗英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同时代表们在空中挥舞着他们的佩剑与左轮手枪，喊着“圣战”、“东方复兴万岁”的口号(Carri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eds], 1969: 173)。它确实是一场复兴运动，正如共产主义在东方带着地方色彩重生一样；它也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冲锋在前的共产党人成了世界历史上的关键因素。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迄今为止对非欧洲国家的人民对世界革命贡献的前景仍持有十分谨慎的观点。比如，在印度和爱尔兰发生的事件通常仅仅依据其对英国产生的影响来理解。民族问题仍然主要是一个欧洲的问题：比如，在奥匈帝国中如何控制各种各样的种族群体。然而到了1922年，共产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已经采取了一种立场，这种立场预示了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要充分认定这种事实：那些代表国家独立的民族意愿的人们可能……是极为多样的，共产国际支持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Degras [ed.], 1971: 385, 1971: 385[着重点为引者加])。随着1928年到1934年短暂的极左转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适应并包容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列宁自己在认识论上进行了突破，以寻找一条冲破苏联的帝国主义封锁的道路。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记着他的话：“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Lenin, 1963: 34)①。

①《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它不仅是被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文明的”民族主义。举例来说，在土耳其，接受苏联的军事和财政援助的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①处决一系列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之后，卡尔·拉狄克(他最早在民族问题上站在卢森堡的立场上)可以冷静地宣布：“我们一刻也不后悔向土耳其共产党说过的话：你们的首要任务……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Carrière d'Encausse and Schram [eds], 1969: 173)。因此，第三世界的共产党人在苏维埃国家政策的利益之下，开始了一个长期的系列“背叛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在变成第三世界“非资本主义”民族发展的促进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二者之间的界线正变得日益模糊，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无论是在信念上或者是出于现实考虑，一场联姻圆满完成了。这里并不打算作一个道德上的批判(尽管这可能是合理的)，而只是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即使不是敌意的)是如何出现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苏联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

当苏维埃共产主义在1989年开始趋向崩溃的最终衰落时，这个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问题开始再一次引人注目。当专制的共产主义盖子被揭开，一种持续关于“原始的”种族与民族认同的图景出现了。一个实际上是很随机的例子是迈克尔·伊格纳捷夫(Michael Ignatieff)的著作《血缘与归属》(*Blood and Belonging*)。在该书中，他认为自由主

^① 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创立者，他领导土耳其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的胜利，使土耳其从封建神权国家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译者



义的文明现在似乎是“与人类的成就背道而驰”(1994: 189)。他描绘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共产主义垮台的图画,——伴随国家结构的倒塌,缺乏管理事件的权威方式,数以百计的种族群体相互倾轧。由于在共产党统治下缺乏本应是非常重要的民主话语和政治调解,结果暴力和武力不可避免。对于伊格纳捷夫而言:“民族主义的言论像野火一样席卷了这些地区,因为其提供给军阀和武装分子一个机会主义的自我辩解词汇”(同上: 6)。根据这些图景来看,民族主义是关于血缘和归属的,并且它是如此的强大、原始和本能,以至于如果被一种谨慎的“自由主义文明”所允许,它就会爆发出来。

127 当前,对民族主义的妖魔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由主义文明”(美利坚合众国?)可能仅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样,都不是一种对抗手段。如果民族主义被视为一种政治和一种话语形式,而不是某种原生浆液,那么 1989 年以后的事件几乎都不是巨变或和惊人的事件。帝国的倒塌注定使民族主义变成一个表达能够把全部社会和经济的
不满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引人注目的工具媒介。现在冲突的民族主义形式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冲突都是关于“血缘和归所属”的。就像埃里卡·本纳令人信服地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理解 1989 年之后的民族主义时说的:“如果极端的民族主义在一些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那么,对大多数这样的国家来说,血腥的民族主义独裁统治的兴起就几乎不是预料中的必然结果”(1995: 232)。民族主义运动并不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民族精神的简单的、直接的反映来运行,它总是在恶意地等待爆发。它们的政治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那个时代所洞察到的,这种环境即使不利于民

族主义,也会赋予它以一种强烈的消极内涵。

总之,共产党人对民族主义的关注在理论上并没有取得丰富的成果。在列宁那里,民族主义最终被认为是朝向社会主义的必然历史征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问题。转向非欧洲的殖民世界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被民族主义驯化了,而列宁主义则变成了一种趋向发展的意识形态。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民族主义被持续低估和误解。这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就能够在1989年广泛地回顾了1780年以来的民族主义:“1945年之后的世界政治从根本上说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发生于其间的各种民族问题突出或扰乱了其主题”(Hobsbawm, 1990:176)。霍布斯鲍姆在不希望给民族主义“涂上红色”方面总是追随着列宁,但是这样一种对世界政治的目光短浅的观点是很难理解的。如果已经存在一种“巨大的历史性失败”,这种失败也不可能是在理论层面,而是在实践层面。因为在实践层面上,一种被认为是行动指导的意识形态会使人们看不到所有形态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在历史舞台上的空前重要性。

鲍威尔的决裂

在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关于民族主义的作品中,奥托·鲍威尔的作品如果被提到的话,从根本上来说,只能与列宁和斯大林对它的尖刻评论相关。但是,科拉科夫斯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把鲍威尔已经被遗忘了的1907年经典的文章《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and Social Democracy)作为“在马克思主义的



文献中关于民族性问题的最佳论著和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Kolakowski, 1982: 255)。由于日益明显的原因,鲍威尔的学说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很难被消化吸收的,但是他确实明显地完成了一种重要的(即使是部分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十分明显的还原论的决裂,这种决裂最近才得到人们的承认(参见 Nimni, 1991)。

奥托·鲍威尔关于民族主义的作品内容是以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为背景的,而社会民主主义必须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活动。鲍威尔成了被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政治潮流的一部分,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包括了活跃在世纪之交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大量理论家(见 Bottomore and Goode [eds], 1978)。他们属于由考茨基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心”(The Marxist Centre)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股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在破产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共产主义潮流中找到了第三条可选择的道路。

哈布斯堡帝国(the Habsburg Empire)的民族紧张状态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团结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几乎直到世纪之交,奥地利操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公开宣扬鲍威尔所谓的“朴素的世界大同主义”(naïve cosmopolitanism)。这种观点仅仅把民族主义作为牵制性的民族主义而加以排斥,并鼓吹一种友善的人道主义信息(Bauer, 1979: 298)。另一方面,捷克工人运动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即使考虑到德国人在哈布斯堡帝国奥地利地区的主导角色,也不令人惊奇。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那样,“最重要的是,这在政治上意味着社会民主党缺乏在多民族国家中对民族冲突的任何共同分析,并且不能在抽象的国际

主义宣言之外提供统一的指导纲领”(Loew, 1989: 19)。

对民族主义的支持是有限的,因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想要保存这一帝国而不是看着它分解成各个民族部分。在整个国家里,民族运动的分离趋势遭到一种改良政治计划的反对。因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经常被说成是“KUK”社会民主党(Kaiserlich Und Koniglich: 帝国的和皇室的),一个奥地利王权的官方称号(Loew, 1979: 20)。在帝国范围内不断增长的民族紧张状态迫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面对民族问题。这与他们的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作出的更好判断相冲突,他认为这个问题太具有爆炸性了。主要是在卡尔·考茨基的激励下,1899年的布隆纲领(Brünn programme)通过允许每个社会民主党的民族成分展现它们自己的文化需求而寻求解决民族紧张状态,而经济斗争则维持在超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考茨基提出奥地利国家的民主转换应当沿着六个民族部分的联邦结构的路线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在其1897年的代表大会中采纳了这一建议。布隆决议主张奥地利依照语言的分布来重建,反对一个要求超出领土的文化自治的少数民族。布隆代表大会的辩论,清楚地展示了民族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各阶层中的多样化概念。塞利格(Seliger)通过讽刺性地指出那些被指控为民族中立的人应当解决民族问题,介绍了这一辩论。他强调:“最重要的是,民族问题不应当被视为权力问题,而应被视为是文化问题”(Bernstein et al., 1978: 187)。代表委员达申斯基(Daszynski)质疑了这一观点,认为“不存在没有经济基础的民族问题”(同上: 195)。鲁塞尼亚(Ruthenian)社会主义者表明了他们的支持意见,但是提醒代表大会,他们的部分人民还生活在奥地利之外的由俄罗斯统治的乌克兰地区:“我们



坚信,只有当每个民族都能够决定它的历史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国际力量才能得到发展。我们知道,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也以民族解放为先决条件”(同上:198)。

在试图解决由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交汇引起的问题时,大部分会议代表强调,民族问题的争议应被视为劳工运动进步的一个前提而加以解决。但少数会议代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不仅认为“我们的活动太注重民族问题了”,而且指出他们经常雇佣工人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提出民族问题(同上:208)。波兰代表团最好地阐述了这一问题:波兰社会主义者会在奥地利工人组织中行动,但是他们也会“不间断地在整个波兰人民中行动,以消除违背波兰人民的严重的民族不公平”(同上:216)。无产阶级斗争不能忽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国家分裂。仅仅有文化自主权是不够的。甚至党的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这个曾经更喜欢忽视民族问题的人,因为说国际主义者也是良好的民族爱国者而陷入了困境。因此,早期对国际主义的抽象支持让位给了对民族主义的有限支持。

130 鲍威尔本人把他的著作的主要力量,视为对民族主义起源于经济发展过程、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阶级联合的描述(1979:19)。然而,他的大多数著作及其引起的争论,集中围绕着他所提出的“民族”定义而展开。简而言之,“民族就是通过共同的命运结合为性格共同体的人类整体”(同上:142)。民族被认为是“命运的共同体”,它的特点来自于人们为生存而劳动以及分配劳动产品(社会分工)的各种条件的漫长历史。在把这一概念嘲弄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形式之前,我们应当注意,鲍威尔反复批评了“把民族视为人们的一种神秘精神的民族精神主义”

(同上: 130)。他也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民族的心理学区理论。他对民族的界定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前提,这一前提设定的“任务是理解民族现象,在它的历史的独特性的基础上解释所有组成它的特性的内容,每一个民族的个体性以及把它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的方面,也就是说指出每一个人的民族性是与他相关的以及在他之内的历史因素”(同上: 14)。他总结说,只有通过承担揭示民族各组成部分的任务,我们才能消解民族实质的假象,而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观通常会屈服于它。

对于鲍威尔来说,最重要的是,民族是历史的产物。这在两个方面是正确的:首先,“就其物质内容方面来说,它是一种历史现象,因为在它的每一个成员中起作用的充满活力的民族性格是历史发展的残余物”,其次,“从它的形式结构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历史现象,因为在一个民族中多样的广泛的圈子通过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被联系在一起”(Bauer, 1979: 144)。简而言之,“性格共同体”(community of character)产生的方式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定。性格共同体不是一个永恒的抽象概念,而是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鲍威尔把民族性格看成是专属一个特殊十年的东西,而不是可以追溯到历史起源的东西。它也不能被看成是它自身的解释,而是被视为需要被解释的某种东西。国际主义不能简单地忽略民族特点,而必须指明它们如何成为历史进程的结果。

鲍威尔也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民族未来的新观点。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各民族间的民族差异和对抗正在日渐消失……无产阶级政权会使它们消失得更加迅速”(Marx and Engels, 1976c: 503)。然而,对于鲍威尔来说,社会主义会导致“民族的日益分化……越消除它



们的特性,它们的特征就越明显”(Bauer, 1979: 116)。对于鲍威尔来说,社会主义会导致真正的民族自治,大众会被融合进民族文化共同体之中,因此民族“精神上”的分化会很自由地兴盛起来。民族的文化历史,迄今为止统治阶级的历史,自此以后被大众所占有,大众会让民族性格自由发展。这意味着“国际组织的任务能够并且应当在民族多样性之中促进国际统一性,而不是消除民族特殊性”(同上: 21)。工人的国际组织不能在不考虑民族多样性以及文化传统特性的条件下诉求斗争的方法。考茨基非常谦恭地惋惜道,第二国际是争取和平的工具,而鲍威尔则更加现实地认识到,即使在和平时期,对于国际主义来说,当大国的既得利益处在危险之中时,它也不是一种有效的工具。鲍威尔当然寻求工人阶级的国际联盟,但是他认为“我们仅仅能够击败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当我们发现了国际阶级斗争的民族内容时……我们必须彻底击败民族主义”(Bauer, 1978a: 184)。

尽管今天鲍威尔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几乎完全被遗忘了(Nimni, 1991 是一个例外),但是在那个时代它是一个激烈争辩的主题。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中被公认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专家,重申正统观点是他的任务。考茨基首先指出,“鲍威尔没有充分地考虑到语言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1978: 149)。对于考茨基来说,语言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最恒久的因素。鲍威尔非常有说服力地回应说,他完全把民族看作是隐藏在语言的传递、转型和限制后面的一种“文化共同体”(Bauer, 1978a: 176)。考茨基继续争辩说,鲍威尔著作的主要缺点是“极大地夸大了民族要素”(Kautsky, 1978: 166)。对于考茨基来说,这只是鲍威尔的问题,他不理解无产阶级不是主要定位于民族主义而是

定位于国际主义。考茨基看到了无产阶级朝向国际文化而不是民族文化的渴望,特别是国际贸易正导致一种世界语言的产生。对于这些抽象的概念,鲍威尔针锋相对地对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交织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的评价。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鲍威尔试图在其自身的基础上应对民族主义:“战争的艺术教我们不要避开对手,而是把战争带到他自己的国家”(Bauer, 1978a: 184)。与把世界语的发展看作是工人的国际团结的关键相比,这似乎是一种更有成效的策略。132

可能今天鲍威尔作品中最相关的部分就是他对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关系的思考。在一段引人注目的话中,他写道,“民族主义的仇恨是一种转变了的阶级仇恨”(Bauer, 1979: 259)。鲍威尔特别提到受压迫民族的心胸狭隘的小资产阶级,这些民族受到了人口变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其他社会变化的影响。但是这一点更带有普遍性,并且鲍威尔非常清晰地展示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如何纠缠在一起。比如,在捷克工人的事件中:“使他[原文如此]变成奴隶的是德国;德国同时也是保护财产所有者而把无产者扔进监狱的法庭;每一个死刑的宣判都用德语书写;军队中每一次镇压饥饿和手无寸铁的工人罢工的命令都用德语下达”(同上: 296)。“非历史民族”的工人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朴素的民族主义”以与大国无产阶级的“朴素的世界主义”相匹敌。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真正的国际政策才能发展起来,这一政策克服了双方的偏差并且认识到了所有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特殊性。尽管鲍威尔宣扬,在争取把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为获得权力的最好方式的斗争中,需要工人阶级的自治,但他也争论说,“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族自治对于证明工人阶级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政权中被迫进行



阶级斗争的合理性是必不可少的”(同上: 314)。他指出,这不是一个“国家保持”(state-preserving)的回应,而是对于试图把所有人民变成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来说的一个必需的目标。

133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鲍威尔的著作代表了一种与经济主义的重要的决裂:政治和意识形态不再被认为仅仅是对严格的经济过程的“反映”。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运行的真正背景使它对文化多样性以及复杂的社会经济进程特别敏感。鲍威尔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著中含蓄地拒斥了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基础进化论。在其实质贡献方面,鲍威尔在丰富而又细致的历史分析中提出了一个作为历史进程的民族概念。民族不再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相对的、历史性的现象。这使得鲍威尔能非常坚决地与马克思-恩格斯“非历史的”民族立场决裂,而“非历史的”民族这一范畴仍然被当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使用。正如我们在葛兰西关于民族-大众(national-popular)的更加有影响力的学说那里看到的一样,我们在鲍威尔那里发现他迈出了非常受欢迎的一步,这一步超出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把民族和民族主义持续理解为“问题”而不仅仅是人类状况的一种整合因素的观点。

后现代问题

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现代性不仅设置了它的范围,而且决定了它的界限。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能提到后现代的民族主义,文化管理在此取代了旧的宏大叙事。传统变得非常微弱,而且是自我意识所“发明”的东西,保罗·詹姆斯写到了“新的民族主义如何具有脆弱性”(1996: 36)。围绕着军事以及体

育运动的情况,大众媒体创造了“民族性”的直接性,但这在我们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并不能克服我们与民族的过去的距离。正是这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解帮我们进入了一个询问的新领域。人们有多种多样的身份,这些身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有时是相反的方式来质询他们。作为现代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对一个与后殖民时代相适应的民族主义理论来说那有什么含义呢?民族主义也受性别问题的影响。在这样一种话语中,性别形象与性别角色是绝对重要的,但是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并不包含性别学说。这里我简单地论述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中关于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权主义(或性别盲)的内容。

艾利·柯迪利(Elie Kdeourie)在他关于民族主义的保守宣言中至少是直言不讳的,当时他“声称民族主义是欧洲19世纪初发明出来的一种教条”(1960: 28)。对于柯迪利来说,这个教条或话语的每一个组成要素都可以找到它的欧洲源头。非欧世界的民族主义仅仅是一个苍白的模仿,无法独立存在。有很多方式可以解构这一系列的论断。我们从通过考察民族主义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欧洲起源这一特点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能止于绘制一张勾勒出了大陆线条以及给每一区域涂上不同颜色的地图。我们在地图中部看见了欧洲,而它在“南部”的殖民地则确切地见证了帝国主义的时代——例如,瓜分非洲。¹³⁴当然,这张地图上呈现出来的固定的东西是一个社会结构。马克思主义倾向于赞同关于世界特别是关于民族主义的相关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因此,即使当殖民地的各民族正把自己从殖民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们仍认为他们正在运用启蒙的概念性工具这样做,不论是表



现为自由主义还是表现为马克思主义。

汤姆·奈恩的具有两面性的民族主义观点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尽管是非常特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常被引用。在追溯了民族主义在欧洲的起源之后,奈恩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它如何以巨变和反应的同心圆的形式从西欧的源头开始传播:通过中欧和东欧,拉丁美洲,然后贯穿其他大陆”(1981: 340)。奈恩把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抵抗斗争译解成“残酷的世界主义的现代主义者与情绪高昂的民族保卫者之间的战争”(同上: 340)。现在,奈恩从把欧洲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理解成毫无问题开始着手。这些民族被看作是有着能动性的历史主体,他们“追求”一些东西,他们“动员起来”,他们甚至具有非理性的“本我”(id)。在非欧世界里,民族主义通过分散、渗透呈现出来,他们很少理解真实的帝国主义世界。尽管奈恩的理论有不可否认的探索以及一些不完整的洞见,但是当深入把握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时,他的理论就完全倒塌了。在此,他极其怪诞地将新教徒定居者建构为真正受压迫的民族群体。

本·安德森(Ben Anderson)将民族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 1983)的观点不仅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而且在其对话语领域的持续关注和对还原论的排斥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安德森超越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把民族主义看作意识形态和虚假意识的观点,用韦伯式语言强调了其“神圣的”角色。语言、文学以及新闻在想象我们所谓的“民族”这一实体时非常关键。然而,正是这同一个启蒙精神创造了欧洲的现代性和民族主义,而且也造就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因此,正如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夸张地问安德

森：“如果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不得不从某些已经被欧洲和美国创造出来的能够被他们使用的‘标准’形式中选择他们所想象的共同体，那么他们还能想象什么呢？”（1996：216）。我们似乎回到了黑格尔，对于他来说，欧洲民族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主体，而世界其他地区只是欧洲主旋律的傀儡或苍白的反映。例如，欧洲焦点仅仅能够在这些方面看到世界其他地区，而不能看到大部分的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包括伊斯兰主义）如何建立在它们与欧洲的根本不同的基础上，而不是对它的主宰者的主题的模仿的基础上。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国际话语而存在，并不意味着它在非欧世界中以一种单纯派生的方式，承载着它所意指的所有消极含义，成长壮大。这种后殖民世界的混和物也意味着它的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就此而言，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置换、破坏和颠覆等现代话语表现出来。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在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官方历史中事情已经被“抹杀”或“掩饰”的程度，它“标志着人民-民族在初期的、没有方向的以及完全不平等的反抗试图统治它的武力斗争中的努力”（Chatterjee, 1986：170）。对民族主义话语的批判不应当使我们忽视它所培育并激发的大众斗争。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后殖民世界中仅仅是西方的一部分。底层斗争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民族的、种族的、地区的、宗教的以及其他形式，而且一种寻求全球影响的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解这些斗争形式，而不仅仅是竭力“启蒙”他们，重申一种“真正”的阶级斗争。

如果民族主义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特征，那么它通常也是一种深刻的男权主义。对于一种经常把民族解释为女性的自然追求，而把民



族战争看作是男性的自然追求的话语来说,民族主义的分析家似乎对性别问题出奇地不感兴趣。只是最近才产生了对民族主义、战争和公民身份的性别问题的极大兴趣。一本重要文集——《民族主义和性别》(*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的导言把我们引向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即,和性别一样,民族是一个关系的术语,它的特性来自它内在于一个差异系统中”(Parker [ed.], 1992: 5)。民族和性别由它们所不是东西所塑造,正如它们是由它们“所是”的东西所塑造一样。民族的特性和性别的特性是通过差异构成的,因而它们是关系术语。民族的概念也是内在地含有性别因素的,比如把女性的传统形象作为民族的象征。民族叙事和文化认同也总是含有性别因素的。不仅是法西斯主义,即使是在大部分的民族主义中,保卫民族的任务都是被分配给男性的。尽管强调男性在这场任务中的团结一致,但民族主义是强烈的异性恋主义,它把“妇女和儿童”定义为具有被动角色的受害者。

136 女性现在正被写回到民族主义斗争的历史中。古曼·贾亚瓦迪那(Kuman Jayawardena)对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论述(1986)完成了双重任务,不但揭示了女权主义不是简单的后殖民世界的输入品,而且也把女性带到了在这些国家中争取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的核心位置。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一样相信“作为女性,我没有祖国”的西方女权主义,将会发现某些这样的历史读起来并不舒服。在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很多女性已经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民族主义的斗争,并且感受到了民族的共性,而没有在这些运动中放弃作为女性的斗争。她们并不特别在意这并不符合欧洲女权主义所宣称的某些姊妹情意模式。女性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也具有矛盾关系,资本主

义现代化一方面为朝向更大的平等而前进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与重新肯定和重建传统的社会习俗的相反运动,以抵消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

女性在民族主义的社会再生产中起重要作用的角色有很多。安斯亚斯和伊瓦-戴维斯(Floya Anthias and Nira Yuval-Davis)开创性地指出了女性在民族或种族的发展进程中的具体而关键的角色,包括:

1. 作为种族或民族集合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生产者;
2. 作为这些集合体的界限的再生生产者;
3. 作为这些集合体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再生产的关键因素;
4. 作为种族/民族差异的指示者。(Anthias and Yuval-Davis, 1989: 7)

vis, 1989: 7)

尽管认识到“社会再生产”这一术语的功能主义的含义,前三条指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进程。在这些进程中,女性在民族主义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对我而言,正是最后的要素在解释所有民族话语的性别维度中最有影响力。大部分的国家正是通过女性的形象展示它们自己的。女性通常是民族的标志,体现其作为所谓想象共同体的品质,同时也被限制在实际的政治共同体的边缘并作为无权的公民。

一个新的探索性别、民族和政治的复杂相互关系的方法将会贯穿于阈限(liminality)观点的发展之中。这一阈限观指向可知的和不可理解的之间的差别。从阈限的视角来看,身份与忠诚最好是不确定的。¹³⁷我们可以想象种族的、区域的和社会的阈限。在她对该问题的分析中,



安妮·诺顿(Anne Norton)提到了“女性在国家结构中起到的阈限性的与决定性的作用”(1988: 79)。对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把这一分析延伸到建构民族和民族主义十分重要。女性在创造民族主义中是受限者,因为她们对于民族来说是次要的(比如缺乏公民权),但是她们也会以象征性的人格体现民族。女性被国家政治排斥在外与她们作为民族的主要标志的角色相匹配。性别和民族的交叉关系的模糊性和矛盾性——同时是中心和边缘,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按照安妮·诺顿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即“阈限性的政治意义在于[它]能把软弱转变成力量”(同上: 76)。当前围绕着含有性别因素的公民身份概念而展开的辩论和运动,就是沿这一方向前进的。

最后的部分揭露了民族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唯物主义理论把民族主义还原为仅仅是物质(经济)基础的附带现象,仅仅是意识形态或虚假的意识。现在我们更倾向于把民族主义理解为米歇尔·福柯所谓的“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即“无论何时人们能够在一系列的陈述之间描述这样的散布系统,无论何时人们能够在客体、陈述类型、概念或者主题性选择之间定义一种规则(次序、关联、位置和功能、转换)”(Foucault, 1970: 38)。从这个角度来看,发现这些试图探索与通常先出现的“坏的”(也许是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相对立的“好的”(也许是公民的)民族主义的理论的有限性就非常容易了。正如克莱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所主张的,“民族认同与忠诚的积极与消极的表现是由民族主义的共同话语塑造的”(Foucault, 1970: 38)。很多社会冲突具有民族的形式,很多不满是以民族主义的言辞表达出来的。把民族主义理解为表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形态的话语构型,使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这并不是说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理论(比如,原始的理论),而是说它需要一种多焦点的方法。这种多焦点方法在今天开始于新的全球主义,并且根本上包括一种性别焦点以及一种后殖民视角意识。



第八章 大洪水之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1989年以后(大多数)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无疑加深了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危机。经过这次大洪水般的政权瓦解之后,马克思主义还可能留下什么呢?本书最后这一章的第一节探讨了对1989年事件的不同反应和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新的全球化后现代世界的价值所在。例如,当今许多评论家主张,全球化不过是《共产党宣言》预言的实现。第二节追溯诸多过往,探讨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所提出的理论挑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以马克思处理宗教问题的相同方式来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把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作为真实问题的意识形态表现。这个僵局以及其他有关的困境放在最后一节讨论,该节基本上支持或假设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更适合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是否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或者什么其他主义,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现在似乎打开了一个新的视域,这个视域有可能重建推动马克思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动力。

实践的挑战

紧接着由“1968年事件”为代表的对于社会秩序的挑战以及1973年之后的资本主义稳定性危机,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和积累体系开始了一个转型过程。这使资本主义西方进入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或信息化的社会。国家社会主义或东方共产主义没能完成这次转型,并且几乎在1989年全部不体面地崩溃了。二十年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化与一种似乎不可避免的保守革命(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全球新自由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种不容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新世界秩序。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甚至对于那些总是批判“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这是对于东方政治制度的委婉称呼)的人而言,其含意是深远的。因此,霍布斯鲍姆说:“我们所见证的不是关于运动,政体和经济这种类型的危机,而是它们的终结。我们当中那些相信十月革命是打开世界历史未来之门的人,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1991:117)。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至少由列宁和他的每位继任者贯彻执行的形式,无疑是失败了。的确,别无选择。

“1989年事件”所代表的,像发生于之前的“1968年事件”一样,远远不止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正如大卫·海尔德(David Held)写到,对于诸如1989事件的讨论,是关于“现代性本身的形式和特征的争论:当代世界的构成过程和结构”(1992:14)。弗朗西斯·福山的书宣称“历史的终结”(1992),尽管这种断言是有争议的,但它确实捕捉到了时代的某种气息。即使极端保守的乐观主义者和激进的悲观主义者很快就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新纪元的变革仍在继续。当然,历史是不会



终结的,但是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看起来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在阻止人类通向“美好生活”的进程中,苏联社会主义看起来与法西斯主义一样是个噩梦。西方世界已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它的必胜信念,例如在海湾战争中,确实令人震惊。但是,新世纪秩序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不会用很长时间就会开始明白:这一胜利或许的确是一种毒酒,新矛盾将会暴露出来,对资本主义的自满构成挑战。

马克思主义左派对于“1989年事件”有许多的反应。对于那些有组织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左派政治团体来讲,这场危机代表着一种机会。人造的苏维埃神已经倒下,现在可以重新确立起真实的信念。不幸的是,在现实世界里,人们通常不注意区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236个种类。另一种反应是发展出了一种严重的政治健忘症,它直接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从迎接新时代和接受一种批判性的但更自由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看起来“1989”许可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身和自由市场的奇迹之间的眉目传情。几乎不需要谈论这两种立场之间的二元对立。对于我而言,我赞同佛瑞德·哈利迪的论点/想法:“经过长期和痛苦的历史迂回,共产主义的传统,现在可以回到它的原点,即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挑战的地点”(1991: 99)。现在我们回到了马克思当年对身处于其中的新生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探索的地方。如果没有“共产主义传统”的话,马克思在千禧年前夕会有什么话要说?

现在有必要描绘1989年后美好的新世界真正的样子,以便尝试确定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理解它。世界这一概念无疑在概念上膨胀了,但在全球化争论的文献之外,人们一致认为,通过哈维(Har-

vey)所称的时空压缩,世界已经“缩小”(1990:240)。当今民族国家通过多种连接和流动相联系,这种连接和流动代表了与“旧”资本主义在性质上的分离。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在其起源上趋向多因果的逻辑,但是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确实看起来与对它的理解相关。马克思当然懂得资产阶级社会如何向全球化过渡以及全球化,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如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Marx and Engels, 1973:71)^①。甚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笔记本中,马克思更精确地预见到:“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Marx, 1943:408)^②。

如果全球化是过去二十多年资本主义结构调整的背景的话,那么它的机制对于马克思来说甚至更加熟悉。这次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是放松管制和拆除凯恩斯主义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设立的社会契约。资本主义的结构调整和全球扩张是建立在速度和效率、灵活性和适应性基础上的。对于曼纽尔·卡斯特来说,“简而言之”,新的资本主义秩序基于三管齐下的策略:“在劳资关系方面,深化资本主义的追求利润的逻辑;提高劳动和资本生产率;[和]促进全球化的生产、流通和市场”(1996:19)。马克思不会对这一判断感到惊讶。事实上,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活力充满了赞扬和钦佩,同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平等也深恶痛绝。卡斯特在他论当代社会性质的三卷本鸿篇巨制(1996,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142 1997, 1998)中所描绘的图画,正好凭借其在知识和信息方面的优势,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长期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作出的预测相吻合。

1997年,《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发表了主流经济学家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一篇不寻常的文章。该文认为,冲击世界的“下一个伟大思想家”非卡尔·马克思莫属(Cassidy, 1997)。在对资本主义活力的诊断上,或许他一直是正确的。例如,据《纽约客》报道:“‘全球化’是20世纪晚期的时髦词语,包括从江泽民到布莱尔在内的任何人都把这个词挂在嘴边,但是马克思在150年前就预测到了其产生的大部分后果”(同上:11)。卡西迪甚至认为,马克思最有争议的思想之一——“贫困化理论”——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是,根据卡西迪的观点,“或许在马克思学说中最不可磨灭的贡献是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讨论”(同上:13)。即使从跨国公司总部的平板玻璃窗子中来看,世界的景色也远不是安静的。资本主义可能已经将其影响范围波及到全球,我们眼前也没有其它切实可行的选择,但它仍然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制度。和马克思(他们新发现的先驱)一样,全球化的真正的缔造者逐渐认识到全球化的下降趋势和随后日益增加的社会压力。

如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球秩序能够依据马克思的《宣言》讲得通的话,那么谁或什么将要对抗它呢?原有的追溯到法国大革命的左、右政治之间的区别似乎没有意义。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诺伯托·波比奥(Norberto Bobbio)写了一部热情洋溢的畅销书,坚定地捍卫作为一项政治区别“左与右”之分(1996)。尽管在上个世纪正是个别国家的“社会问题”导致了社会主义,但对于波比奥来说,今天正是“国际社会问题”(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构成了

社会变革运动的基础。当然,所有可得到的数据都指向了民族国家之间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深,这与自由贸易者的信仰是不相容的。现在有一种全球性的权力、财富、特权和控制的等级制度,其范围和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相互依存的虚夸辞藻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新的依附性”,这甚至使20世纪60年代首创的拉美依附理论的理论家们——例如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见 Cardoso, 1993a)——感到震惊。

尽管全球化编织着其横跨全球的资本主义的网络,但它所排斥的和包括的一样多。对于包含在新的全球化良性循环中的每一个国家和工人来说,也存在更多遭受着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正如琼·罗宾逊¹⁴²(Joan Robinson)所喜欢说的那样,如果有什么比剥削更坏的,那就是它没有被剥削。卡斯特用他所称的宇宙比喻(cosmic metaphor)——即“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来描述包括/排斥的新秩序(1998:162)。在新的全球后现代秩序下,人民和领土成为纯粹的“过剩需求”(surplus to requirements)。没有能从这些在其密度上集中了所有破坏力的黑洞中逃脱的东西,“这些破坏性的能量从其多样化的信息来源中影响着人类”(同上)。“第四世界”遍及全世界,其中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横跨整个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如非洲)。“第四世界”明确证明了马克思所了解的资本主义在今天仍然存在着。因此看起来,即使传统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但产生它的条件依然存在,并且它寻求世界更加公正和平等的任务还刚刚起步。

可以说,“另一个”分界线存在于男女之间,这一分界线构成了当代朝向于社会变革运动的基础。20年前,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反思认识到,“性别问题”比阶级斗争更能导致更为伟大的革命,因为阶级



斗争那时似乎正在逐步减少，“只要”妇女能够“像一个阶级”那样行动。问题是，这些男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发现一种“女权主义生产方式”，以此确保一旦资本主义父权制被推翻后历史仍向前发展。曼纽尔·卡斯特曾经是理解新社会运动的一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他可以宣称，妇女意识在过去20年来迅速传遍全球，代表了“最重要的革命，因为它深入到社会的根源以及触及到我们是谁的核心。它是不可逆转的”(Castells, 1997: 135)。在这方面，全球化已经产生了吸收广大妇女有偿就业的双重积极影响，并允许在全球传播女权主义的激励思想。女权主义的文化政治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主义解放方案，不管“父权主义的终结”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否会实际上发生。

理论挑战

如果我们从1989年后退十年，令人关注的是，当时正值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的共产主义潮流的高涨时期(记住阿富汗，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迫在眉睫，特别是在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似乎逐渐失去生机(尽管其在西方学术界的声誉日益增长)，因为它本身没有在1968年后像资本主义一样成功的进行改造。对马克思主义要求激进衣钵在理论上遭到的挑战，主要来自在后现代主义大旗下松散地积聚起来的观点、理论和运动。回想起来，正是阿尔都塞架起了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新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和政治思潮的桥梁。不仅那些持“马克思主义需要利用后现代主义的洞见”(Callari and Ruccio, 1996: 27)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后现代转向的正统反对者如埃伦·梅克森·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也认识到了这一

点。伍德严厉攻击了路易·阿尔都塞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恰恰因为后者“成为主要的理论渠道，凭借这一渠道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等诸如此类的思潮”(Wood, 1995:8)。我们现在转向对这一旅程的考察。

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是晚期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他被认为是真正接受“后现代”术语的少数理论家之一。他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独行其是的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发表的论阿尔及利亚的文章，进一步展现了他的后现代主义。他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未能把握阿尔及利亚局势的特殊性，只是把它看作是对俄国革命的简单重演。对利奥塔来说，这不符合当时僵化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纯粹形势”(pure situation)。对他而言，阿尔及利亚不仅象征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脱节，而且确认了其意识形态的腐朽。根据最近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利奥塔在殖民问题上和涉及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方面，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利奥塔开始走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此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正如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所说：“人们接受后现代主义仅仅是在利奥塔在几年的时间里结合具体的政治局势精心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缺点之后”(1996:3)。问题的关键是，与德里达和福柯一样，利奥塔介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新的理论和政治并没有从天而降。

为了描述后现代的挑战，从利奥塔的1979年的文本《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Lyotard, 1984)开始研究可能是适当的。



144 在该书中,利奥塔从技术和社会的变革方面描述了后现代时代,这些技术和社会变革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会是不熟悉的。不过,他超过这个实质性的焦点来对现代性的局限性进行认识论上的分析。利奥塔质疑启蒙精神把知识看作科学的、全面的、进步的、普遍的、理性的和客观的观点。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概括为“对所有元叙事的怀疑”(同上:xxiii)。他所说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是指所有那些建立在绝对的或普遍的真理基础上的论说,例如财富的创造(亚当·斯密),生物进化(达尔文),当然不可避免地还包括工人阶级领导的人类解放(马克思)。随着知识的解构和世俗化,我们到达一种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正如不断地追求“更深刻的”真理遭到拒斥一样,基础断言也被抛弃了。没有什么观点享有特权,一切都是暂时的,再现是徒劳的,而未来是不确定的。在一切事物都破碎和流动的时代,命运已毫无意义。至少,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成了艺术与人文中的普遍氛围。

对后现代主义的分类和诊断不都完全是令人信服的,但重要的是不要以为在黑夜里所有的猫都只是黑色的。我发现在探究这一领域中有两种有价值的区分,一是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者和肯定的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区分(Rosenau, 1992: 15),二是保守的后现代主义与反抗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分(Santos, 1995: 92)。鲍德里亚应该是一位后现代主义怀疑论者,他不仅对具有分裂、混乱、无意义特征的时代做出消极诊断,而且实际上也沉迷于其中。肯定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接受对现代性的批判,但是对当前时代充满更多的希望,而非(例如)回避伦理和政治的各种选择。保守/反抗的区分也有类似的要旨,但对于索

萨·桑托斯(Sousa Santos)来说,反抗的后现代主义比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的北美肯定的后现代主义呈现出更为极端的倾向。对他来说,反抗的后现代主义:

在本世纪末比其他任何思潮更好地表达了社会变革的观点。我一直呼吁的解放的后现代主义知识旨在对这一变革所需的进步选择进行投资、发明或改善。这是一个知识的乌托邦,它使政治乌托邦成为可能。(Santos, 1996: 92)

我们从鲍德里亚那里出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曾经在一次著名的声明中宣布,海湾战争只是一场媒体奇观。

西方教科书通常忽略的另一个后现代主义方面,即它与后殖民主义¹⁴⁵的关系问题。正如一本后殖民主义研究论著选读的编辑所说:“后现代主义的重大方案——对欧洲文化集中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体叙事的解构——与取消帝国话语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后殖民主义方案非常相似”(Ashcroft *et al.* [eds], 1995: 117)。在某种程度上,后现代主义导致了一种政治的审美化,而后殖民主义则导致了美学研究的政治化。更确切地说,也许,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北大西洋知识界的特权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即使后殖民主义也已经成为西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学术职业。然而,特别是当我们把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地的政治学相结合时,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话语活动来试图分裂和动摇西方的本体论的安全。欧洲中心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内部充满生机,这解释了许多第三世界激进分子敌视它的原因。然而,从广泛的



历史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似乎至少为后殖民的“他者”留出说话的空间。

不存在一种单一或简单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学,因为没有单一的后现代主义:它的政治观点与“运动”一样是多样化的、易变的和矛盾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肯定的”或“反抗的”后现代主义者中间识别出某些主题。福柯(不一定是后现代主义者)已经强烈地主张从宏大、总体性、竞争性的政治学转变为更适合当今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微观政治学上来。费里克斯·瓜塔里在倡导微观政治学时更进了一步:微观政治学将建立“一整套表达和实验——关于儿童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同性恋者的、囚犯的或任何不适应社会者的表达和实验——所有这些表达和实验都致力于渗透和进入统治秩序的符号学”(1984:184)。在更一般的水平上,反抗的后现代主义者称颂多样性,鼓励政治多元主义和在底层鼓动支持激进民主。后现代政治强调自主权和认同,拒绝“解放”的总体规划。正如埃内斯托·拉克劳(也不一定是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现在我们接受了我们的有限性和它所开启的政治可能性。这是我们的后现代时代开始着手的潜在解放性话语的起点。或许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处在解放的末端和自由的开端(1996:18)。”

146 后现代主义者都同意尼采对“超越善与恶”的危险的虚无主义信念,这是一种只能导致糟糕结局的相对主义。但是,这种异议又有什么关系呢?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者不相信有任何代表形式(例如,对他人政治利益的代表)或价值判断形式(如左翼—右翼,好—坏),所以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政治不可知论导致他们拒绝所有变革的总体规划,所以他们最终支持维持现状,并开始看到可尊重的权利中的相当多的优

点。考虑到虚拟的历史终结和真理的缺乏，鲍德里亚所称的“冷嘲的超然”(ironic detachment)被认为是一种进步的政治立场。虽然如此，但我们仍不能忽视(例如)(某些)女权主义者(们)富有成效地介入了后现代主义。我们也不能像在旧时好或坏的日子里那样，退缩至拒绝所有压迫的非阶级场所。新的社会运动确实产生了一种后现代知识和政治实践类型，这种类型迫使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思考在当今一种激进的社会理论和政治学可能呈现什么样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从我们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易变思想中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希望从后殖民视角来强调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维度，是它对当代人类状况固有的混杂性的关注。没有比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阐释得更好的了：

《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赞美混合、杂质、不纯，这一变化来自对人类、文化、思想、政治、电影、歌曲的新的和意料之外的结合。它在种族混杂中感到高兴，在纯粹的绝对主义中感到恐惧。混杂、大杂烩、一点点这样的东西和一点点那样的东西，是**新事物进入世界的方式**。(Rushdie, 1991: 394)

后现代主义的反进化论帮助我们思考表明后殖民世界特点的激进的异质性和混合性。后现代产生的问题(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不生活在一个后现代时代)，有助于我们理解通向并超越现代性的复杂的非线性的各种路径。我们生活在混合、混淆的时间性——构成整个后现代主义部分的次要的前现代性——中，而一种没有基础主义的激进政治学需



要把握这一点。当然,在超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本体论和政治的安全保障进程中是有风险的,但尼采的幽灵不必阻止我们前进的脚步。

147 马克思主义者对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转向/气氛/精神的反应是什么?有一个共同选择的尝试,特别是体现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84)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中。对于詹姆逊来说,后现代主义最好被理解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姆逊有些滥用欧内斯特·曼德尔(1975)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期之嫌,他把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发展同资本主义新阶段联系起来。他的文化分析确实是惊人的,他在想象上把艺术形式置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内。对于詹姆逊来说,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是直接的,他认为“整个世界同时又是美国的后现代文化[是]对美国军事和经济统治整个世界的全新潮流的内在的和上层建筑的表达”(Jameson, 1991: 57)。尽管我们承认詹姆逊对理解后现代状况作出的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我们认为:第一,在他把后现代主义吸收/引进传统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的尝试中存在着某种概念上的粗糙之处;第二,他自身特有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对旧的基础—上层建筑二元论的接受,为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思考新事物提供了一种贫乏的基础。

更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如卡利尼克斯(1989)和特里·伊格尔顿(1996)猛烈地反击了后现代主义。在一种良好的社会学还原论模式中,卡利尼克斯认为:“最好是把后现代主义话语看作社会性流动的知识分子的产物,这些知识分子处于由西方劳工运动的退却主导的社会环境之中”(1989: 170—171)。卡利尼克斯和伊格尔顿(以一种更诙谐的方式)基本上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对1968革命没有实现其承诺而感

到失望的激进知识分子的产物。这是一个从“失败的神”到唯美主义的转折。伊格尔顿理所当然地认为，“许多后现代主义及其对时髦理论的追逐助长了政治文盲和历史忘却”(Eagleton, 1996: 23)。好的做法是：使后现代主义历史化，揭露它的一些黑暗的政治事实和使有时不切实际的言论相对化。然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产生一种替代方案的反应——在这种论辩性的争论中——仅仅是一种老生常谈的重新表述。我们知道，社会阶级“仍然不容忽视”；我们明白，文化不是“一切”；我们也理解，后现代主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是否至少提出了一些正确的问题。

摆脱僵局

148

从上述的论述中判断，在后现代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似乎存在一个僵局。在那些认为“1989年事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灾难与那些认为它代表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极好机会的人之间，也存在某种类型的僵局。最后，在我们所生活的全球化的后现代时代，似乎也存在困境，只有世纪末色调文学才对此有所反映。不是为了“超越”，而是为了面对这些紧密交错的僵局，我将阐发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概念。对这个方案进行提示的正是德里达，他曾经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事实上，正是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和他的解构主义学说，毁灭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论。然而，德里达继续对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进行重新评价。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与时髦的做法相反)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仍然同时既必不可少又在结构上存在不足：马克思主义存在仍然是有必要的，但它必须



变革并适应新的条件和新的思维……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变革和拓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相一致的”(1994: 58—59)。

德里达拒斥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依据一种外部的、普遍真实的命题去诉求合法性,因为他认为这仅仅是循环论证的和自我指涉的。基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这些思想体系仅仅植根于自我构成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似乎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不过,对于德里达来说,“当教条的机器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机构……处在不断消逝过程之中时”(1994: 13),我们没有理由不重新考虑马克思作为解构主义第一人的地位。这种学说或哲学——德里达不会称之为方法——主张通过对文本的内在颠覆来揭示其矛盾和假设。然而,它既没有从外部有效性的角度来这样做,也没有寻求提供一种更好的文本。思想体系被认为是基于二元对立的(好或坏,真实或虚假,自然或文化,男人或女人,等等),其中假设一方优于另一方。一方是原始的,另一方是派生的。因此,德里达的方法有点过于简短,它的内容如下:“两方中的一方控制另一方……为了解构其对立的一方……是在特定的时间内推翻这一等级结构”(Derrida, 1981: 41)。不足为奇的是,这种149 方法可以用于动摇隐藏在种族或性别不平等和阶级剥削背后假定的等级制度。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并没有试图简单地消除二元对立,而黑格尔唯心主义方法则试图这样做,可以说很多马克思主义也试图这样做。相反,解构涉及逆转和替代。它不接受徒有其表的解决方案,而且——基于差异总是在场——怀疑没有差异的共产主义社会,认为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暴力才能维持。德里达反对将目的和手段统一起来,他认为

这是由于我们对封闭的形而上学的需要。他质疑公认的真理观念，不相信有最终不可改变的解释。因此，不同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解构不打算揭露“错误”，因为那样就假设了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解构把我们引向了文本的边缘，它要求我们寻找被排除在外者、被压制者、无名者。因此，按照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对德里达的介绍，解构试图“找到充满希望的边缘文本，揭示犹豫不决的时刻，用积极的信号杠杆撬开它，颠倒固有的等级结构，只是为了推翻它；拆除以便重组那些总是已经被铭记的东西”（1976：xxvii）。那么，马克思主义对解构主义的这种图谋如何回应呢？

对于特里·伊格尔顿来说，“许多自诩的新的解构主题只不过是重复了一些最常见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题”（1996：17）。推崇多元化和异质性、反对总体化知识与倡导不确定性，的确可能是自由主义的优点。然而，也有许多社会理论家和政治理论家正在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的交叉地带进行研究。因此，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的“关键性的结合”（注意，不是婚姻）（1982）。马克思和德里达都是形而上学的尖锐的批评者。德里达帮助纠正了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线性进化论和对社会主义终极革命的天真信仰。解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有利条件，这个有利条件不仅仅是反抗性的，而且可能导致一种政治转型。就德里达本身而言，他现在接受了“一种肯定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救世和解放承诺的思想”（1994：71）。与某种后现代虚无主义不同，他认为这种解放的承诺是“不能解构的”。一个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认为马克思总是这样做——不会在下个世纪的社会斗争



和政治斗争中缺席。

150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与解构理论的批判结合可能有一些优点。到现在为止,这似乎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更为敏锐,因为它不是基于某种“真理”的错误观念(无产阶级,或其他阶级)和(坦率地说)一种朝着共产主义机械发展的不可靠观念。在一个更务实的层面上,它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仍有许多东西要学习的各种后结构主义领域,而且带进了一种政治转型可能会从中产生的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学中。解构理论也因这一遭遇而有所改变。正如比尔·马丁(Bill Martin)在与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对话中所说:“关键是要深化解构理论,通过批判一切使只是学术性的观点的解构理论从而变得更为强大”(Martin, 1995: 10)。除了将解构理论远离北美的文学教授,马克思主义也使它更加排斥“经济”、“民主”等传统术语,这些术语通常不包含在解构主义的话语中。在本质上,从现代主义的总体化牢笼中提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对渗透于大部分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心照不宣的、理所当然的自由主义,也许是一副有用的解药。

如果可以想象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后现代社会主义是怎样的呢,或者仅仅是一种矛盾的修辞法?它肯定是一个混合体,但那将与我们生活的整个后现代时代一致。彼得·贝尔哈兹阐明了需要“一种后现代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分化的、怀疑的、务实的,并谋求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一直谈论的文化和权力的结合”(Beilharz, 1994: 105)。基本的压力是,现代性已经耗尽了它进步的潜能。事实上,这种潜力在我们过去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国家里并不多见。因此,如果社会主义在现代性的阴影下成长,那么它就不可能

对后现代问题涉及太多。使用昔日的工具解决当今的问题,无非是庸人自扰。野蛮或(后现代的)社会主义在当今仍处在地平线上,与当时罗莎·卢森堡所见到的情况一样。在今后几十年无疑将涌现出来的新的政治变革,将几乎肯定不会称为社会主义。作为思考新的民主替代野蛮的一个临时标签,后现代社会主义也许是探究正在开启的可能性视域的一种简便方式。

新的离散的、混合的后现代的社会主义,可能从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原始的和富有成效的结合中学到一些东西。女权主义开始明确地作为一种现代派的话语,大体上现在也仍然是现代派的话语,共享(或力图共享)启蒙的价值。然而,启蒙理性主义的普遍性话语不允许(大多数)妇女像后殖民地人民一样沐浴在它温暖的光芒之中。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各种各样的女权运动内部开始出现了一种从对平等的虚化辞藻到差异话语的运动。从此,与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并行和交叉的繁育变得十分明显。新的定位政治、立场认识论和认同政治登台露面。福柯适合于女权主义(例如,McNay, 1992),并且与拉康的辩论开辟了新的层面。当然,德里达将有助于消灭男/女等级。即使是“妇女”这一范畴,作为女权主义政治当然的中心,也是被揭示为是一种不稳定(即使不是虚假的)范畴。依据女权主义的方案,所有这些事情——特别是其社会主义形态——都是令人兴奋的,而且也是危险的。¹⁵¹

卢斯·艾戈瑞(Luce Irigaray)(不)恰当地问道,后现代主义是否事实上不是父权统治“最后的诡计”(1985)。正如妇女(和后殖民的人民)正在发现他们的声音一样,后现代主义适当地宣告了主体的灭亡。也许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面不得不搁置,而旧式的启蒙美德(即使在理论



上是可疑的)被重新发现。然而,后现代女权主义的理由(对于我来说)是相当令人信服的。我们无需“大量吸纳”诸如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等一些后现代的主题。德里达允许我们将男权中心主义批判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融合起来。苏珊·海克曼严谨地论证了涉及女权主义的德里达思想的革命性特点。她认为:

因此,德里达对女权主义的贡献,就在于他对二元逻辑的替换和对差异的新铭记。西方思想的二元逻辑代之以一种替代逻辑(supplementary logic),这种替代逻辑使用“妇女”概念来推翻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女权主义解构理论意味着一种对西方思想和实践的根本的结构调整……这种话语以不同性别的声音说话,它是这样一种话语:没有中心,既不是男性的也不是女性的,但也不能消除男性或者女性。(Hekman, 1980: 175)

这个质询或干预的方式对于想象的后现代社会主义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后现代社会主义需要做的事情之一是除掉邪恶的资本主义。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让自己把资本主义变成无空隙的、坚不可摧的怪物。吉布森—格雷汉姆阐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强烈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信仰一种真实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则是某种由既定的社会现象构成的不可还原的事物(1996: 24)。因此,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话语中,资本主义被看作是全能的、完全具有说服力的、自我复制和动态的,它把身份赋予我们所有

人并给所有的社会生活带来意义。要是资本主义真的是“纸老虎”或“泥足怪物”的话，会怎么样呢？或者，上升到理论层面，正如吉布森—格雷汉姆所说，“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界定为不同于自身的事物——换言之，界定为没有本质的或内在的同一性的事物——（无限）增加了相异性的可能性”（同上：15）。这种女权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与话语理论方法相联系的批判，允许我们注意，（例如）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渗透进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的阳刚形象，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解构、被挫败、被转移或被颠覆。

难道我们明智的、务实的和现实主义的后现代社会主义不需要乌托邦来激励吗？德里达欣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救世信息，那么为什么不是类似于福柯的异位（heterotopia）的事情呢？为什么不是去创造一个新地方，而是替换我们栖居的地方，从中心转移到了边缘？正如博温托·迪·索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所说：“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开启由新的激进方案规划的新的可能性视域去重新设计未来”（Santos, 1995: 479）。如果我们的现状是以犹豫不决为标志的，我们的将来也将如此。在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之后，没有一个新社会的蓝图。然而，一系列的可能性近在眼前。南方、不平衡的发展、全球化和就此而言的帝国主义仍是变革成功的主要参数。其他人将探讨这个非乌托邦的乌托邦的性别问题和环保问题。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不得不说的话和贯穿于他的“青年时期”到成熟阶段的平等主义道德准则，很可能构成这个蓝图的一部分。历史真的没有在1989年结束。

参考文献

Adam, B. and Allan, S. (1995) 'Theorizing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B. Adam and S. Allan (eds), *Theorizing Cul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que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UCL Press.

Adams, B. (199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Greening of Development Theory', in F. Schuurman (ed.), *Beyond the Impasse: New Directions in Development Theory*, London: Zed Books.

Adams, M. L. (1994)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On the Face of Identity in Feminist Politics', in M. Evans (ed.), *The Woman Question*, 2nd Edn, London: Sage.

Ahmad, A. (1992)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Verso.

Althusser, M. (1984) 'A Reply on Art in Reply to André Daspre', in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Anderson, P. (1976) *Consideration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Verso.

Anthias, F. and Yuval-Davis, N. (1989) 'Introduction', in N. Yuval-Davis and F. Anthias (eds), *Woman-Nation-State*, London: Macmillan.

Anweiler, O. (1974) *The Sovie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Aricó, J. (1988) *La Cola del Diablo. Itinerario de Gramsci en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Puntosur.

Aronowitz, F. and Di Fazio, W. (1994) *The Jobless Fu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ronson, R. (1995) *After Marxism*, New York: Guildford Press.

Arrighi, G., Hopkins, T. and Wallerstein, I. (1989) *Antisystemic Movements*, London: Verso.

Arvon, H. (1973) *Marxist Esthe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shcroft, B., Griffiths, G. and Tiffin, H. (eds) (1995) *The Post-Colonial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Avineri, S. (ed.) (1969)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New York: Anchor.

Bahro, R. (1978)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Verso.



——(1984) *From Red to Green*, London: Verso.

Bailey, A. and Llobera, J. (eds) (1981)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alibar, E. (1992) 'Foucault and Marx: The question of nominalism', in T. Armstrong (ed.), *Michel Foucault, Philosoph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The Philosophy of Marx*, London: Verso.

Baran, P. (196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dern Reader Paperback.

Barrett, M. (1980)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London: Verso.

——(1983) 'Marxist-Feminism and the Work of Karl Marx', in B. Matthews (ed.), *Marx: A Hundred Years 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8)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London: Verso.

——(1991)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Marx to Foucault*, Cambridge: Polity.

Bauer, O. (1978a) 'Observaciones sobre la cuestión de las nacionalidades' (Bemerkungen zur Nationalitätenfrage, *Die Neue Zeit*, 1908).

——(1978b) 'El obrero y la nación (Der Arbeiter und die Nation, *Der Kampf*, 1912) in Calwer et al., *La Segunda Internacional y el Problema Nacional y Colonial (segunda parte)*, Cuadernos de

Pasado y Presente 74, Mexico; Siglo XXI.

——(1979) *La Cuestión de la Nacionalidades y la Socialdemocracia* (Die Nationalitäten en frago und die Socialdemokratie, 1907). Mexico; Siglo XXI.

Bauman, Z. (1976) *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 London: Allen & Unwin.

Baxandall, R., Ewen, E. and Gordon, L. (1976) 'The Working Class Has Two Sexes', *Monthly Review*, 28(3).

Beilharz, P. (1992) *Labour's Utopias: Bolshevism, Fabianism,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ostmodern Socialism: Romanticism, City and State*, 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Benner, E. (1995) *Really Existing Nationalisms: A Post-Communist View from Marx and Engels*, Oxford: Clarendon.

Benton, T. (1992) 'Ecology, Social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A Reply to Reiner Grundmann', *New Left Review*, 194.

Benton, T. and Redclift, M. (1994) 'Introduction', in M. Redclift and T. Benton (eds), *Soci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Berman, M. (1983)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Bernstein, E., Belfort Bax, E., Kautsky, K. and Renner, K. (1978) *La Segunda Internacional y el Problema Nacional y Colonial*



(*primera parte*), Cuadernos de Pasado y Presente 73, Mexico; Siglo XXI.

Bernstein, H. (1993)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deleux, R. (1985) *Communism and Development*, London: Methuen.

Bloch, E. (1970)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Bobbio, N. (1996) *Left and 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 Cambridge: Polity.

Boggs, C. (1995)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From Crisis to Decline*, New York: Routledge.

Bookchin, M. (1980—1981) 'Review of A. Gorz's Ecology as Politics', *Telos*, 46.

Bottomore, T. and Goode, P. (eds) (1978) *Austro-Marxism*, Oxford: Clarendon.

Boyne, A. and Rattansi, A. (1990)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By Way of an Introduction', in R. Boyne and A. Rattansi (eds), *Postmodernism and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Braverman, N.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ewer, A. (1980)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tudy, London: Routledge.

Brundtland, H.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yson, V. (1992)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Buck, G. and James, S. (1992) 'Introduction: Contextualizing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in G. Buck and S. James (eds.), *Beyond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Citizenship, Feminist Politics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London: Routledge.

Calhoun, C. (1997) *Nationa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Callari, A. and Ruccio, D. (1996) 'Introduction: Postmodern Mater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t Theory', in A. Callari and D. Ruccio (eds), *Postmodern Mater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t Theory: Essays in the Althusserian Tradition*,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Callinicos, A. (1989) *Against Postmodernism: A Marxist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Camilleri, J. and Falk, J. (1992) *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 Aldershot: Edward Elgar.

Cardoso, F. H. (1993a) 'New North/South Relations in the Present Context: A New Dependency?', in M. Carnoy et al., *The*



New Global Econo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b) ‘Desafios de la Socialdemocracia en América Latina’, in M. Vellinga (ed.), *Democracia y Política en América Latina*, Mexico: Siglo xxi.

Carlassare, E. (1994) ‘Destabilizing the Criticisms of Essentialism in Ecofeminist Discours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5(3).

Carr, E. (1970)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of 1924—1926*. Volume One. Harmondsworth: Penguin.

Carrière d’Encausse, H. and Schram, S. (eds) (1969) *Marxism and Asia*, London: Allen Lanes Penguin.

Casey, C. (1996) *Work, Self and Society after Indust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Cassidy, J. (1997) ‘The Next Big Thinker’, *Independent on Sunday*, 7 December.

Castells, M. (1996)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97)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I: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1998)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II: End of Millenium*, Oxford: Blackwell.

Caudwell, C. (1970) *Romance and Re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Illusion and Reality: A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Poetr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Chatterjee, P. (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96) 'Whose Imagined Community?', in G. Balakrishnan (ed.), *Mapping the Nation*, London: Verso.

Claudin, F. (1975) *Th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Comintern to Cominform*, Harmondsworth: Penguin.

Cleaver, H. (1979)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Brighton: Harvester.

Cohen, G. A.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Cohen, S. (1980)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19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P. (1991) *Black Feminist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Commoner, B. (1973) *The Closing Circle: Confronting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Cape.

Coward, R. (1983) *Patriarchal Precedents: Sexual and Soci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Daly, M. (1979) *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 Boston: Beacon.

Daniels, R. (1969)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ommunist Opposition in Soviet Russ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Davies, I. (1995) *Cultural Studies and Beyond: Fragments of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Davis, H. B. (ed.) (1976) *The National Question: Selected Writings by Rosa Luxemburg*,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Degras, J. (ed.) (1971)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s vol 1*, London: Frank Cass.

Delphy, C. (1984) *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London: Hutchinson.

Derrida, J. (1981) *Posi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Spectre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London: Routledge.

Di Stefano, C. (1990) 'Dilemmas of Difference: Feminism,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L.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Dyker, D. (1992) *Restructuring the Soviet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Eagleton, T. (1976)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Methuen.

——(1996)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Oxford: Blackwell.

Eckersley, R. (1992)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Towards an Ecocentric Approach*, London: UCL Press.

Edelholm, F., Harris, O. and Young, K. (1977) 'Conceptualising Women',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9/10.

Eisenstein, Z. (1979) 'Develop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Z. Eisenstein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Engels, F. (1990)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the Light of the Researches by Lewis H. Morgan', in Karl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6,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Enzensberger, H.-M. (1974)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 *New Left Review*, 74.

Escobar, A. (1984) 'Discourse and Power in Development: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Relevance of his Work in the Third World', *Alternatives*, 10.

Esteva, G. (1992) 'Development', in W. Sachs (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nd Power*, London: Zed Books.

Featherstone, M. (1991)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



ism, London: Sage.

Fitzgerald, E. V. K (1986) 'Not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mall Underdeveloped Economy in Transition', in R. Fagen, C. D. Deere and K. L. Coraggio (eds),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Third World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Forgas, D. (1984) 'National-popular: Génealogy of a Concept', in *Formations: of Nations and People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1980) 'Truth and Power', in C.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Brighton: Harvester.

——(1984) 'What is the Enlightenment?' in P.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London: Penguin.

Frankel, B. (1987) *The Post-Industrial Utopians*, Cambridge: Polity.

Fraser, N. and Nicholson, L. (1990) '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 An Encounter between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L.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Furedi, F. (1986) *The Soviet Union Demystified: A Materialist Analysis*, London: Junius.

García Canclini, N. (1995) *Hybrid Culture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Garé, A. (1995)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Routledge.

Gatens, M. (1992) 'Power, Bodies and Difference', in M. Barrett and A. Phillips (eds), *Destabiliz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Cambridge: Polity.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Gibson-Graham, J. K. (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Blackwell.

Gilbert, A. (1981) *Marx's Politics: Communists and Citizens*,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Glenny, M. (1990) *The Rebirth of History: Eastern Europe in the Age of Democracy*, London: Penguin.

Glucksmann, A. (1980) *The Master Thinkers*, Brighton: Harvester.

Gorz, A. (1980) *Ecology as Politics*, London: Pluto.

——(1982)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Lost In-*



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 Pluto.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By Q. Hoare and G. 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The Revolution Against “Capital” ’ in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Gray, J. (1995) ‘Among the Ruins of Marxism’, in F. Mount (ed.), *Communism*, London: Harvill.

Griffin, S. (1978) *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 New York: Harper& Row.

Grundmann, R. (1991) *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Clarendon.

Guattari, D. (1984) *Molecular Revolution: Psychiatry and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Guha, R. (1988) ‘Preface’, in R. Guha and G. C.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ha, R. (ed.) (1982) *Subaltern Studies*, vol I,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 S. (1996a) ‘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D. Morley and K. H.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b)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D. Morley and K. H.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Halliday, F. (1991) 'The Ends of the Cold War', in R. Blackburn (ed.), *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Verso.

Harding, N. (1971)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1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Harding, S. (1986) 'What is the Real Material Bas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in L. Sargent (ed.),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London: Pluto.

Hartmann, H. (1986)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L. Sargent (ed.),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London: Pluto.

Harvey, 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Haupt, G. (1974) 'Les marxistes face à la question nationale: l'histoire du problème', in G. Haupt, M. Lowy and C. Weil (eds), *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 1848—1914*, Paris: Maspero.

Hayward, M. (1983) *Writers in Russia: 1917—1978*, London: Harvill.



Hekman, S. (1992) *Gender and Knowledge: Elements of a Post-modern Feminism*,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1992) 'Liberalism, Marxism and Democracy', in S. Hall, D. Held and T.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Cambridge: Polity.

Hildyard, N. (1993) 'Foxes in Charge of Chickens', in W. Sachs (ed.), *Global Ecology: A New Arena of Political Conflict*, London: Zed Books.

Hirst, P. (1979) *On Law a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Hobsbawm, E.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Goodbye to All That', in R. Blackburn (ed.), *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Verso.

Holub, R. (1992) *Antonio Gramsci: Beyond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Honeycut, K. (1981) 'Clara Zetkin: A Socialis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Women's Oppression', in K. Slaughter and R. Kern (eds), *European Women on the Left,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Political Women, 1880 to the Present*, Westport: Greenwood.

hooks, b. (1991) *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4)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Ignatieff, M. (1994)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London: Vintage.

Il Manifesto (1979) *Power and Opposition in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ies*, London: Ink Links.

Irigaray, L. (1985) *Speculism of the Other Wom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ackson, C. (1994) 'Gender Analysis and Environmentalisms', in M. Redclift and T. Benton (eds), *Soci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James, P. (1996) *Nation Form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Abstract Community*, London: Sage.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Janmohamed, A. (1995) 'Refiguring values, power, knowledge', in B. Magnuo and S. Callenberg (eds), *Whither Marxism? Global Crise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Jay, M. (1988) *Fin-de-Siècle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Jayawardena, K. (1986)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Zed Books.

Johnson, R. (1979) 'Three problematics: elements of a working-class culture', in J. Clarke, C. Critcher and R. Johnson (eds),



Working-Class Cultur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Hutchinson.

Kautsky, K. (1978) 'Nacionalidad e internacionalidad' (Nationalität und Internationalität, *Ergänzungshefte zur Neuen Zeit*, 1908) in R. Calwer, et al., *La Segunda Internaciónaly el problema Nacional y Colonial (segunda par te)*, *Cuadernos de Pasado y Presente* 74, Mexico; Siglo XXI.

Kay, C. (1989) *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Kay, G. (1975)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A Marxist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Kedourie, E. (1960) *Nationalism*, London: Hutchinson.

Kolakowski, L. (1978)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1: The Found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2: The Golden 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ornai, J.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Oxford: Clarendon.

Laclau, E. (1996) *Emancipation(s)*, London: Verso.

Laclau, E. and Mouffe, C.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Lane, D. (1974) 'Leninism as an Ideology of Soviet Development', in E. de Kadt and G. Williams (eds), *Sociology and Devel-*

opment, London: Tavistock.

Larrain, J. (1983) *Marxism a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Lecourt, D. (1976) *Lysenko: Histoire réelle d'une 'science prolétarienne'*, Paris: Maspéro.

Leftwich, A. (1992), 'Is There a Socialist Path to Soci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13(1) (Special Issue: 'Rethinking Socialism').

Leibman, M. (1986) 'Reformism Yesterday and Social Democracy Today', in R. Milliband, J. Saville, M. Liebman and L. Panitch (eds), *Socialist Register 1985/86*, London: Merlin.

Leichteim, G. (1970) *A Short History of Socialis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Lenin, vol I. (1963a) 'Self-determination',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0,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3b)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Collected Works*, vol. 20,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6)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a)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V. I. Lenin,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vol.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b) ‘Six Theses on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in V. I. Lenin,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vol. 2,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c) *Questions of National Policy and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Lévy, B.-H. (1977) *La barbarie à visage humain*, Paris: Grasset.

Lewin, M. (1973) *Lenin's Last Struggle*, London: Pluto.

——(1975)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in Soviet Economic Debates*, London: Pluto.

Lifschitz, M. (1973) *The Philosophy of Art of Karl Marx*, London: Pluto.

Lipietz, A. (1992) *Towards a New Economic Order: Postfordism, Ecology and Democracy*, Oxford: Polity.

Loew, R. (1979) ‘The Politics of Austro-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18.

Lorde, A. (1994) ‘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 in M. Evans (ed.), *The Woman Question*, 2nd edn, London: Sage.

Lukács, G. (1970) *Lenin: 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London: Verso.

Lukács, 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Lyotard, J. 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Libidinal Economy*, London: Athlone.

Maconachie, M. (1987) 'Engels, Sexual Divisions and the Family', in J. Sayers, M. Evans and N. Redclift (eds), *Engels Revisited: New Feminist Essays*, London: Tavistock.

Mandel, E. (1975) *Late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Manzo, K. (1991) 'Modernist Discourse and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Theor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6(2).

Marshall, B. (1994) *Engendering Modernity: Feminism,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Martin, B. (1995) *Humanism and its Aftermath: The Shared Fate of Deconstruction and Politics*,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Marx, K. (1968)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3a)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b) *Grundriss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1974)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Political Writings, vol. 3*, London: Penguin.

——(1975)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76)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Marx, K. and Engels, F. (1971) *Ireland and the Irish Questio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and——(1976a) ‘The German Ideology’, in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and——(1976b) *Collected Works*, vol. 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and——(1976c) *Collected Works*, vol. 6,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and——(1977a) *Collected Works*, vol. 8,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and——(1977b) *Collected Works*, vol. 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and——(1977c)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K. Marx,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Political Writings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and——(1978) *Collected Works*, vol. 1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and——(1982) *Collected Works*, vol. 38,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and——(1987) *Collected Works*, vol. 2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cNay, L. (1992) *Foucault and Feminism: Power, Gender and the Self*, Cambridge: Polity.

Mengisteab, K. (1992) 'Responses of Afro-Marxist States to the Crisis of Socialism: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13(1).

Mies, M. and Shiva, V. (1993) *Eco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

Mitchell, J. (1971) *A Woman's Estat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Mohanty, C. T. (1992) 'Feminist Encounters: Locating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in M. Barrett and A. Phillips (eds), *Destabiliz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Cambridge: Polity.

——(1993)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in P. Williams and L.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Harvester-Wheatsheaf.

Molyneux, M. (1981) 'Women in Socialist Societies: Problem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K. Young, C. Wolkowitz and R. McCullagh (eds), *Of Marriage and the Market: Women's Subord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 CSE Books.



——and Steinberg, D. L. (1995) 'Mies and Shiva's Ecofeminism: A New Testament?', *Feminist Review*, 49.

Morgan, R. (1984) *Sisterhood is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Anth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Nairn, T. (1981)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97)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London: Verso.

Nietzsche, F. (1964) *Complete Works*, vol. 2,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Nimni, E. (1991)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Theoretical Origins of a Political Crisis*, London: Pluto.

Norris, C. (1991)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Norton, A. (1988)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adgett, S. and Patterson, W. (1991) *A History of Social Democracy in Postwar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Pannekoek, A. (1978) 'Lucha de clases y nación' (Klassenkampf und Nation, 1912), in R. Calwer et al., *La Segunda Internacional y el problema Nacional y Colonial (segunda parte)*, Cuadernos de Pasado y Presente 74, Mexico; Siglo XXI.

Parker, A. (ed.) (1992)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Parsons, H. (ed.) (1977) *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Westport: Greenwood.

Pepper, D. (1993)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ism in Britai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4(3).

Petras, J. (1978) 'Socialist Revolutions and their Class Components', *New Left Review*, 111.

Plumwood, V. (1988) 'Woman, Humanity and Nature', *Radical Philosophy*, Spring.

Polan, A. J. (1984)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Portantiero, J. C. (1983) *Los Usos de Gramsci*, Buenos Aires: Folios Ediciones.

Post, K. and Wright, P. (1989) *Soc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Poulantzas, N. (1975)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Praver, S. S. (1978)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eobrazhensky, E. (1979) *Crisis of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ed. D. Filtzer, New York: Sharpe.

Rattansi, A. (1997) 'Postcoloni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Economy and Society ,26(4).

Redclift, M. (198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Contradiction*, London: Methuen.

Rosenau, P. M.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wbotham, S. (1979)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Organizing for Socialism', in S. Rowbotham, L. Legal and H. Wainwright, *Beyond the Fragments: Feminism and the Making of Socialism*, London: Merlin.

Rushdie, S. (1991) *Imaginary Homelands*, London: Granta.

Ryan, M. (1982) *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 A Critical Articul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achs, W. (1993) 'Global Ecology and the Shadow of 'Development'', in W. Sachs (ed.), *Global Ecology: A New Arena of Political Conflict*, London: Zed Books.

Said, E. (1985) *Orient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Salvadori, M. (1979)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London: Verso.

Santos, B. S. (1995) *Toward a New Common Sense: Law,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Sarup, M. (1993)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Harvester.

Schmidt, A. (1971)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Scott, J. (1990) 'Deconstructing Equality-versus-Difference', in M. Hirsch and E. F. Keller (eds), *Conflicts in Feminism*, New York: Routledge.

Shanin, T. (ed.) (1983)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London: Routledge.

Shiva, V. (1988)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1993) 'The Greening of the Global Reach', in W. Sachs (ed.), *Global Ecology: A New Arena of Political Conflict*, London: Zed Books.

Sim, S. (1996) *Jean François Lyotard*, London: Prentice-Hall/Harvester.

Sirianni, C. (1982) *Workers' Control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The Soviet Experience*, London: Verso.

Sklair, L. (1994) 'Global Sociolog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M. Redclift and T. Benton (eds), *Soci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Slater, D. (1984) 'Social Movements and a Recasting of the Political', in D. Slater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Amsterdam: CEDLA.

Smith, S. A. (1983) *Red Petrograd: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1917—191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lomon, M. (ed.), (1979) *Marxism and Art*, Brighton: Harvester.

Spivak, G. C. (1976) 'Translator's Preface', in J.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P. Williams and L.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Wheatsheaf.

Stalin (1973) *The Essential Stalin: Major Theoretical Writings 1905—52*. London: Croom Helm.

Stedman Jones, G. (1983) *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ites, R. (1978)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rasser, J. (1978) 'El obrero y la nación' (Der Arbeiter und die Nation, 1912) in R. Calwer et al., *La Segunda Internacional y el problema Nacional y Colonial (segunda parte)*, Cuadernos de Pasado y Presente 74, Mexico; Siglo XXI.

Struvé, G. (1972) *Russian Literature under Lenin and Stalin*,

1917—1953 ,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Thomas, P. (1991) 'Critical Reception: Marx Then and Now', in T. Carv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E. P. (1970)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Vaughan James, C. (1973) *Soviet Socialist Realism: Origins and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Vogel, L. (1983)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Warren, B. (1980)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Watts, M. (1995) 'A New Deal in Emo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 crisis in development', in J. Crush (ed.), *Power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Weedon, C.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Weiner, D. (1988) *Models of Nature: Ecology,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helan, I. (1995) *Modern Feminist Thought: From the Second Wave to 'Post-Femin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White, G. (1983)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An Overview', in G. White, R. Murray and C. White (eds),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Macmillan.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od, E. M. (1981)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95)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oung, I. (1986)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y', in L. Sargent (ed.),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London: Pluto.

索 引

(条目后数字指英文本页码,即本书边码)

- Althusser, L., 路易·阿尔都塞, 16, 17, 18, 100, 101, 111, 143
- Bahro, R., 鲁道夫·巴罗, 28—29
- Balibar, E., 艾蒂安·巴利巴尔, 1, 18, 63
- Barrett, M., 米歇尔·巴雷特, 77—78, 92, 101, 109, 115
- Bauer, O., 奥托·鲍威尔, 128—132
- Berman, M., 马歇尔·伯曼, 2, 41
- Bernstein, E., 爱德华·伯恩斯坦, 7, 11
- Bukharin, N.,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47, 48, 109
- Capital*, 《资本论》, 3, 4, 5, 43, 81
- Cardoso, F. M.,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10—11, 141
- Castells, M., 曼纽尔·卡斯特, 75, 76, 141, 142
- Chernobyl, 切尔诺贝利(乌克兰北部城市), 27, 35
- Communist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 2, 41, 42, 43, 61, 62, 138, 140
- Cuba, 古巴, 14, 51, 54, 57, 69



- deconstruction, 解构, 20, 149
- dependency, 依附, 44, 48, 52, 54, 56, 57, 121
- Derrida, J., 雅克·德里达, 1, 6, 19, 20, 56, 88, 115—116, 148—152
-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The*,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46, 47
- Dialectics of Nature, The*, 《自然辩证法》, 21, 24
- ecology, 生态(学), 39
- Enlightenment, 启蒙, 31, 39, 56, 93, 94, 96, 117, 139, 151
- Eurocentrism, 欧洲中心主义, 10, 29, 58, 71, 111, 117, 118, 133—134, 135, 145
- Foucault, M., 米歇尔·福柯, 5, 19, 55, 115, 137, 151
- German Ideology, The*, 《德意志意识形态》, 8, 23, 63, 80
- Gibson-Graham, K., 吉布森—格雷汉姆, 72, 73, 152
- Gorbachev, M., 戈尔巴乔夫, 13
- Gramsci, A., 安东尼奥·葛兰西, 17, 68, 108—112
- Hobsbawm, E.,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15, 127, 139
- Kautsky, V., 卡尔·考茨基, 7, 11, 25, 47, 128, 131
- Kollontai, A.,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 83, 85, 86
- Laclau, E., 埃内斯托·拉克劳, 17, 72, 73, 114, 115, 145
- Lenin, V. I., 列宁
- Logocentrism, 逻各斯中心主义, 56, 148, 151
- Lucács, G., 捷尔吉·卢卡奇, 2, 5, 25, 103, 108
- Luxemburg, R., 罗莎·卢森堡, 28, 124—125, 126, 150

- Lyotard, F.,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18, 143—144
- Mandel, E., 欧内斯特·曼德尔, 27, 47, 147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9
- May '68, 68年五月风暴, 16, 17, 18, 71, 138, 147
- Mohanty, C., 钱德拉·莫汉蒂, 58, 95
- Mouffe, C., 墨菲, 17, 72, 73, 114, 115
- Nietzsche, F.,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18, 23, 32, 33, 39, 146
- Origins of the Family*,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78—79, 81
- postcolonialism, 后殖民主义, 13, 58, 111, 117, 135, 145
-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39, 58, 93, 94, 97, 112, 113—117, 133, 144—147
- Poulantzas, N., 尼柯斯·普兰查斯, 19, 70, 115
- Proletkult, 无产阶级文化, 103—105
- Shiva, V., 范达娜·希瓦, 31—32, 38
- Stalin, J., 斯大林, 5, 13, 49, 51, 85, 105, 106—107
-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9, 13, 14, 33, 35, 38, 44, 49, 55, 95—96, 117, 126, 135, 145, 150
- Thompson, E., 爱德华·汤普森, 8, 62—66, 112
- Trotsky, L., 列夫·托洛茨基, 16, 49, 104, 105
- Weber, M., 马克斯·韦伯, 5, 8
- Williams, R., 雷蒙·威廉斯, 100—101, 113
- Zasulich, V., 查苏利奇, 4, 12, 42
- Zetkin, K., 克拉拉·蔡特金, 83—84



译后记

本书作者罗纳尔都·蒙克(Ronaldo Munck),现就职于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是国际化、跨文化主义与社会发展研究机构的领导者和战略负责人,英国利物浦大学社会学访问教授,当前主要研究全球社会运动在规制全球资本主义中的作用问题。迄今为止,蒙克已经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当前的拉丁美洲》(*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全球化与劳工》(*Globalization and Labour*)、《拉丁美洲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后现代的暴动》(*Post-modern Insurgencies*)、《批判的发展理论》(*Cr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全球化时代遍及全世界的劳工》(*Labour Worldwid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等20多部著作,为西方学术界广泛关注。主要议题涉及欧洲发展、全球化和劳工问题。其教学足迹遍及欧洲、美洲与黑非洲(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马克思在21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Marx @ 2000 —— Late Marxist Perspectives*)是一本由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于1999年的著作,至2004年就再版了三次。之所以选取本书作为翻译的

对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在蒙克的笔下,马克思与当今社会问题是如此贴近,让人们迫切地想知道,如果马克思今天仍然健在,他会有着怎样的所思所想,会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

是的,在新的世纪里,是否一切都会告别过往,走向崭新的起点?尤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在形式上仍处于同等地位,而在实践中却出现资本主义的压倒性优势之时,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该如何以自我的视角审视自身困境与自我价值?蒙克立足于马克思的视角,审视千禧年来临时的人类面临的诸多重要问题,包括生态主义、民族主义、工人阶级、现代化等问题。这些视阈是极其重要的,而蒙克给出的判断更具价值,那就是:马克思及其思想,在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变化时,仍然有话要说,仍然有话可说。当然,马克思只能在一百多年前的逻辑困境中来回应这些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迷宫中,哪些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哪些是后继者的思想?这些问题仍然是重要的。发展马克思的具体行为可能是一种悖论——即这种行为本身即是对马克思能量的一种消解,对其核心领域的远离。那么马克思主义发展范式问题就值得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反思。这要求回到马克思本身以深刻认知来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能做任何跳跃或截面。蒙克的视野是他企图重塑鲜活的马克思本人的视角。但这在何种程度上是马克思本人的,或许是蒙克的马克思——像许多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一样,这就要靠蒙克的文本的诉说与解读者的思维能力来确认了——这既不是权力性的,也非政治性的。

翻译工作是艰辛的,需要两种文化的相互映证。至于在何种程度



上,在自我文化视域中传递了蒙克的深刻洞见,在何种程度上注入了自我文化与人格个性的东西,作为译者的我们,仍未有清醒的认知。但本著作允许每一位阅读者都能够依据自身的视野而对马克思产生不同的反应。一些人在追随着肤浅的消费主义时代时,可能更倾向把马克思看作是日趋衰微的。另一方面,一些人希望看到的是,借助于探究当前的困境,马克思能够重新焕发生机。无论读者喜欢与否,蒙克无疑把原有的范式重又纳入现代人们的视野之中了。

本书译者的专业均为政治学,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有限,为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非常感谢译稿审稿人铁省林教授,可以说,他的辛苦劳作对于我们的翻译工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感谢远在美国的朋友 Edith,作为一名基督徒,她的热忱与坚贞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独到见解,使我们获益良多。要感谢研究生高千、梅少粉、陈平、崔洪菊和王瑞,他们在繁忙的学习之余校对了部分书稿。感谢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基金的资助,感谢本书责任编辑花蕾先生的辛勤劳动。当然,书中舛误与不当之处,完全由译者负责,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译者

2011年1月

内容简介：

本书系统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思想，反击了马克思主义不能恰当地解决环境问题这一广泛持有的观点。为了表明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定导致有害的生态后果，本书回应了环保理论家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批评，解释和重建了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特别是指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与生态上可行的生产发展并不冲突。



ISBN 978-7-214-06630-5



9 787214 066305 >

定价：30.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马克思在21世纪 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作者=(英)蒙克著

页数=250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3

SS号=12782281

DX号=000008081804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

000008081804&d=310887BC209EA6B894C91B2F54C543D0&fenlei=

010801&sw=%C2%ED%BF%CB%CB%BC%D4%DA21%CA%CO%BC%CD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走出迷宫：马克思主义的轨迹

第二章 红与绿：马克思主义与自然

第三章 苏维埃加电气化：马克思主义与发展

第四章 掘墓人的局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

第五章 不幸福的婚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

第六章 上层建筑的复仇：马克思主义与文化

第七章 艰难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民族

第八章 大洪水之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封底